

“精英” 与 动乱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编
中国 教 育 报 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FDG

封面设计：燕子

ISBN 7-107-10574-4

G·1774 定价2.90元

PDG

“精英”与动乱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中 国 教 育 报 社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精英”与动乱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中国 教 育 报 社 编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装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字数188,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107-10574-4

G·1774 定价 2.90 元

前 言

今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在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不是偶然的，既有国际大气候，也有国内小气候，而知识界一些自诩为“精英”的人竭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起了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为有助于广大青年学生、教师认清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性质，认清那些“精英”们的真实面目，更好地认识和总结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经验教训，我们编辑了这本《“精英”与动乱》。

本书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的文章揭露和批判了“精英”们是如何在这次动乱之前明目张胆地制造舆论、策划活动，为动乱作酝酿和准备的。第二部分的文章是给一些“精英”人物画像，看看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本书收集的这些材料撕去了这些所谓“文化精英”、“社会精英”的伪装，还其多年来竭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风波中或策划于密室或赤膊上阵的真实面目。第三部分的文章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深入地揭露了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发生的动乱真相。

这本书揭发出来的材料十分丰富，读后会使人们警醒，冷静地思考一下过去，也冷静地思考一下未来。

本书截稿时，还不时有新的有关材料见诸报刊，限于时间与篇幅，恕不能一一收入。本书如果能对大家认识“精英”真面目和认清这场斗争性质有所帮助，我们就如愿以偿了。

编者

目 录

前言

一、动乱前的酝酿和准备

一个制造动乱的“沙龙”

——北大“民主沙龙”干了些什么？……郑彦(1)

为什么要制造“蛇口风波”……辛文步(8)

制造“蛇口风波”实质是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教育报邀请教育界部分人士

座谈“蛇口风波”(摘要)……《中国教育报》(23)

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殇》的“新纪元”新仁(31)

方励之张显扬们早就提出要搞“动乱”……赵前(38)

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动乱及反革命暴乱……吴戈(42)

一部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

——评严家其的《首脑论》……钟海(50)

二、“精英”素描

方励之的反共卖国行径……中国科技大学 甄海(64)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王昭(79)

李淑娴有一颗什么样的“中国心”……周彤文(76)

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叶光(81)

动乱“精英”严家其……李建生(93)

吾尔开希真面目……石青(102)

吾尔开希在美国扮演了什么角色？……魏谷(109)

动乱“记者”戴晴…………… 卞 岩(113)

从“轰动效应”到动乱中大曝光

——苏晓康言行简析…………… 卞平新(125)

三、动乱真相

关于这场动乱的十个为什么?…………… 梦 省(132)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 忻华实(135)

《世界经济导报》风波真相(摘要)…………… 韩禹水(148)

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

——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 任玉清(154)

这算什么“民主”

——从北大八位呼吁复课的教师遭遇谈起

…………… 北京大学 施义武(162)

且看胡委员怎样自圆其说…………… 孙 理(166)

谁在公然煽动推翻合法政府?

——评严、包两先生的文章…………… 梦 省(169)

非法组织“高自联”…………… 高岩文(173)

武汉长江大桥被堵截真相…………… 张 扬(186)

上海动乱真相…………… 施 岩(192)

赵紫阳的“亚行”讲话与山西省城的政

治动乱…………… 秦 城(214)

一场闹剧

——“浙江省政府降半旗”事件真相…………… 钱崇芳(220)

一起“最轰动”的谣言制造者自曝内幕…………… 诸 炎(223)

煽动动乱和暴乱的“北京之音”

——看! 人民大学非法学生组织广播站

干了些什么…………… 郑 义(225)

-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对外广播站”在暴乱中扮演了
什么角色……………一名知识分子(230)
- 看“谣言政治”是怎样害人的
——“清华人之声”广播台的拙劣表演……………时 录(234)
- 动乱中的大漩涡
——北京大学50天素描……………北京大学 严仲文(239)
- 南京动乱中的一场闹剧
——江苏“高自联”导演的“北上民主长征”
真相……………鸣 泉(252)
- 毒化校园的舆论 煽动动乱的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大字报见闻录……………关 清(259)
- 一幕“追悼”闹剧……………《武汉晚报》(269)
- 为活人佩黑沙……………《北京晚报》(272)
- 在美、台、港反动势力庇护支持下叛逃分子
猖狂进行颠覆我国政府活动……………新华社(273)
- 反革命颠覆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成立
……………新华社(276)

一、动乱前的酝酿和准备

一个制造动乱的“沙龙”

——北大“民主沙龙”干了些什么？

郑彦

《中国教育报》编者按 方励之、李淑娴、王丹等人组织的所谓北大“民主沙龙”，虽然未经学校批准，却居然能够在学校畅通无阻，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并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思的。

我们的高等学校应该成为抵御资本主义思想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强阵地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摇篮。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高等学校工作的领导，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科学管理和学籍管理，整顿学校秩序，端正校风学风，形成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

良好道德风尚和政治环境。必须坚决取缔宪法和法律明确不予保护的大、小字报，取缔未经批准的非法社团和“沙龙”活动，决不允许为蓄意制造思想混乱和进行政治煽动的人提供讲坛。要下最大决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入、持久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把高等学校办成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1988年5月4日，正当北京大学师生欢度校庆90周年之际，方励之、李淑娴跳将出来，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就在这天下午，由方、李和刘刚（被通缉的“高自联”头目之一）一手策划的“民主沙龙”乱哄哄地开了场。方励之、李淑娴首先登台。方胡说什么“不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法”，因为“现代化不分国界”；李淑娴则极尽其煽风点火之能事，大谈“中国的布鲁诺”，叫嚣“甘愿作一粒沙子，为后人铺就一条自由之路”。还有人认为方励之提出的“知识分子要入党，要改变党的颜色”这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不够劲，索性提出“要重铺一条铁路，重造一列火车”。“民主沙龙”一开场，就充满了政治色彩，火药味十足。

从这天起到1989年5月12日，一共举办了17次“民主沙龙”，主要由王丹等人主持，方、李充当军师。从已掌握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方励之、李淑娴、王丹等人如此卖力地举办“民主沙龙”，就是要为日后制造动乱，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舆论，网罗人马，进行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一)

名为“民主沙龙”，其实并非真是为了民主。这从他们邀请参加者的标准可见端倪。

王丹公开要求学校给他们“邀请著名学者参加的自由”，“保证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一律准许被邀请”。李淑娴也与王丹一唱一和，说什么“一个学者，一个人，只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他就有演讲的自由。他是中国公民，就应该有权利被邀请。”可是“沙龙”的另一名组织者却说：“有人提出请曲啸那种人来这里，我们认为没必要。”

那么，他们究竟要请哪些先生呢？王丹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讨论的本来就是政治问题，当然要找一些有思想、有创见的先生来。”一年来，他们请的主讲人，除了臭名昭著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外，还有包遵信、任晓町、戴晴、吴祖光、许良英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甚至未经正式外交程序，就邀请了某国驻华大使和夫人。

这些人在“沙龙”里肆无忌惮地兜售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货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全面攻击四项基本原则。

谈到共产党领导时，王丹狂妄地叫嚷：“大概要摸摸老虎屁股了。”更有人公然喊出：“应该成立反对党”。他们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理论”。狂叫：“要实现民主，关键在于改变中国的环境。”他们诬蔑“中国的领导人不讲人权”，公然为反革命分子魏京生鸣冤叫屈，说他“是有为的年青人，是人才，应当爱护”。他们极力鼓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声

言要“办自己的报纸、杂志，传播民主思想”。他们攻击党的新闻政策，胡说什么“今天报纸的审查制度超过国民党统治的时候”。提到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人更是咬牙切齿。参加这个沙龙的一个头面人物恶狠狠地说：“这两件事，一望而知，荒谬绝伦。”这些人还喋喋不休地叫嚷：“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是领导阶级，起主导作用”。

鲁迅说过：既捣鬼，就有术。这伙道貌岸然的文化人，经过几年来紧锣密鼓地筹划，终于嗅出了一点异常的政治空气，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了。他们撕去仅有的一点遮羞面纱，猖狂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宣扬的“学术讨论”是假，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真；他们高喊的“民主”是假，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共和国是真。他们哪里是什么“文化人”、“精英”，分明是一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急先锋。而“民主沙龙”则成为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的阵地。

(二)

“民主沙龙”的组织者深知，要达到某种目的，仅仅满足于“制造舆论”，进行“思想发动”是不够的，于是，他们又频繁进行了筹建组织的活动。

今年4月5日，王丹在“沙龙”蛊惑说：“所有知识界，都感到今年要有事情发生。我希望在目前这个时机，大家都团结起来。”还说：“如果大家都窜腾得比较欢，这个进程就推进了。”李淑娴进一步说明：“大家都是这个态度，也就没关系了。”

其实，他们的组织活动是伴随着“沙龙”的出笼而开始的。“沙龙”一开张，王丹就成为方励之、李淑娴的座上客。方、李对王十分赞赏，甚至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忘吹捧王丹几句。而王丹则言必称“方老师”、“李老师”如何如何。

当然，他们的组织活动绝不仅限于少数头头之间的来往。为了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他们处心积虑，耍了不少花招儿。

去年下半年，王丹等人筹备成立“当代中国国情研究会”，要求学校给予他们“独立活动的自由”，理所当然地未被批准。年底，王丹又打出某一学生社团的旗号，要成立这个社团的“当代社会问题部”，聘请张显扬、于浩成、许良英、吴祖光、戴晴等25人为顾问，拉大旗，作虎皮，又遭学校拒绝。学校还多次派人找王丹谈话，指出他的活动违反校规。但他对学校的帮助教育置若罔闻，更加猖狂地活动。

今年4月初，为争取“民主沙龙”成为合法组织，王丹在学生中掀起一场签名运动。4月3日，王丹在北大三角地贴出有56个学生签名的给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一封信，要求学校支持“民主沙龙”，开辟“沙龙”活动地点，并且事先通知一些港澳记者，企图借海外传媒给学校施加压力。

对此，学校仍未同意。王丹等人恼羞成怒，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沙龙”。王丹气势汹汹地鼓动更多的师生用签名的方式支持他们。李淑娴也再次跳到前台，明确表示她“很支持这件事”。对签名的学生表示“非常地尊敬”，并要亲自出马，“登门拜访校领导”，使“民主沙龙”合法化。

4月19日，学潮已经发生。这天晚上，他们又举行了一次“民主沙龙”，重点讨论成立组织的事情，当场推选出由

王丹、封从德、熊焱等七人组成的“北大自治学生会筹委会”，企图取代合法产生的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

经过这样一番紧张的活动，他们确也拉起一支队伍。“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如王丹、刘刚、封从德、杨涛、熊焱、郭海峰等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都成为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目和骨干分子。

(三)

“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沆瀣一气，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发难。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他们以为时机已到，便加紧煽动、策划，终于制造了一场触目惊心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事发后，他们互相打气，互相呼应，接触愈加频繁。方励之、李淑娴不断给王丹等人耳提面命，包遵信、陈明远、任晓町等更是多次到北大讲演。

5月12日，所谓“学运低潮”时期，他们又举行了第17次“民主沙龙”。包遵信在“沙龙”大放厥词，说什么“4.27这个日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将会大书特书”，“它的规模和深远影响都超过了五四”，明确提出“4.26社论应该推翻”。他还煽动说，一听到学生上天安门游行，“当时就特别兴奋起来”。为了给学生打气，他还胡说：“4.27”在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说“4.27”的意义在于“标志长期以来封建家长制的专制统治在中国应该结束了。”

当时不少青年学生对动乱开始失去兴趣，感到迷惑、疲惫，包遵信的这一派胡言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天下午，王丹等3人在北大贴出“绝食声明”。次日，

北京几百名学生开始绝食。严家其、包遵信、苏绍智等人又导演一出首都知识界大游行的闹剧，声援绝食学生。可以看出，“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配合得是何等默契！

善良的人们是很难预料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的。但事实却使我们清醒：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则将国无宁日。同时，须臾不能放松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因为他们一刻都没有睡觉，还会利用各种形式，伺机向我们进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倒是应该感谢“民主沙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7月25日）

为什么要制造“蛇口风波”

辛文步

高等学校的许多领导同志和教师，在学习邓小平同志最近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时，回顾近年来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状况，联想到1988年初刮起的那场震动全国、甚至波及到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所谓“蛇口风波”，他们提出：

一个极为平常的“青年教育专家与青年座谈会”，为什么竟成了全国新闻报道的热点进而掀起那样一场轩然大波？

曲啸、李燕杰、彭清一同志在座谈会上到底说了些啥？

“蛇口风波”的实质是什么？

围绕这些问题，记者最近收集、翻阅了有关这场“风波”的报道材料，并走访了曲啸等同志。记者愿与广大读者一起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探究刮起这场风波的深层原因。

“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报道摘录

关于这个引发“风波”的座谈会，不少报刊作了报道。座谈会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1988年1月13日，正在深圳讲学的曲啸、李燕杰、彭清一等同志，应蛇口区邀请，前往蛇口浮法玻璃厂参观。晚饭后，他们忽然看到“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的海报。尽管曲啸等事前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安排，但从礼貌考虑，仍

然走进了蛇口招商大厦9层会议室。

座谈会由蛇口区团委的一位副书记主持。出席座谈的有曲啸、李燕杰、彭清一等四位同志和蛇口的近70名青年。

一个临时告之而又没有确定主题的座谈会，究竟怎么个开法？曲啸等同志在会上应该说些什么？时间不允许他们考虑，只好听命于会议主持人。

座谈伊始，主持人点名让曲啸、李燕杰、彭清一谈谈到深圳、蛇口参观访问的感受。

第一个发言的是李燕杰。他将解放初期到深圳见到的情景同几十年后的今天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了比较后说，深圳给他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可以概括为“美的山河美的人，美的风光美的心”。

曲啸接着谈起他们到深圳、蛇口参观，感受最深的是特区的巨大变化……他说，深圳不是与社会主义祖国断了线的风筝，而是在社会主义航线上腾空飞起的雄鹰。当场一位青年站起来问他，内地的市民、青年对深圳到底是什么印象？曲啸说，内地有不少人向往深圳。来深圳的大多数人是希望到这里来一展才能的创业者、建设者，他们当中多数人已成为特区的骨干。也有些人是因为这里待遇高、生活好，考虑如何满足个人享受。这种人如果能遵纪守法，用自己的劳动去挣钱，也是政策允许的，无可非议。但是不能否认，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为此，他们不择手段，甚至损人利己。曲啸认为，这极少数人就是“淘金者”，他们与特区提出的“开拓、创新、献身”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一位青年不同意曲啸对“淘金者”的看法，他说，我们来

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如个体户开餐馆，他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也给国家上交税金，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另一位青年说，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

彭清一接着说，美国是美国，怎么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特区同日而语呢？美国姓资，搞的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同我们的特区有本质区别，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来建设中国的特区。我们要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曲啸发言时，还有一位青年站起来说，说蛇口只有中国特色是拔高了，因为在很多地方外国特色倒能体现出来。比如蛇口的建筑风格、上班环境、工资体制，包括商店里的商品陈列，倒是体现了外国的特色。另一位青年补充说，有中国特色就说有，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要编出一个中国特色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你们谁能说得出来？

一位青年说，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蛇口很多青年在独资公司工作，这个地方说话还比较自由，山高皇帝远嘛！我骂你们几句，也没有人会管我，我的香港老板更不会“炒我的鱿鱼”。

曲啸问，你说我们的思想在蛇口没有市场，你说我们是什么思想？

那位青年说，我想你们是希望蛇口青年带着对祖国的爱，为蛇口创业的思想来工作，并为此感到骄傲。这不符合蛇口人的实际。

在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的问题上，双方展开了争论。

曲啸说，我们希望青年对祖国有深厚的爱，你能申明你对祖国没有爱吗？

这位青年说，要看这个爱怎么表达，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应当是虚的、假的、空的。老实说，蛇口青年都知道，你们是空头的、虚无缥缈的。我们讲实际，我们自己劳动了，劳动成果自己享受，大可不必想着我现在是为了国家，为了什么什么。希望你们把这里真实的东西带回去，敢在内地讲出来。

彭清一接着说，明天我在深圳作报告，想在大会上讲你的话。你叫什么名字？这位青年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另一位青年说，我久仰曲啸、李燕杰老师的大名。你们闯荡江湖，四处游说，你们到这里来宣传，但在独资、合资企业里的工人没有人会听你们的。我们就是为了赚钱，什么理想、信念、为祖国做贡献，没有那回事，报纸上的宣传有几句真话？

在谈到我国的经济情况时，曲啸说他看到街上跑的尽是外国汽车，感到我国科技水平与生产能力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心里很难过。他希望青年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把我国经济搞上去，这也是历史赋予青年的重任。

一位青年说，你难过什么吗！自己没车又造不出汽车，买外国的有什么不好？我再奉劝你们一句，不要把那一套政治宣传搬到蛇口来，在这里没有市场。

历时两个小时的座谈会气氛活跃，对话双方互提问题，各抒己见，没有出现台上讲、台下听那种作报告式的严肃场面。但是看得出来，在许多问题上，对话双方的见解不尽相同，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座谈会将结束时，李燕杰说，相互间有不同意见不要紧，但彼此是有启发的。会议主持人在讲话中称赞座谈会上那热烈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一位青年代表几位发言的年轻人表示赞同，并高兴地说，参加这个会感到很荣幸。

风波是怎样刮起来的

这样一次座谈会，有没有报道的必要？如果报道，出发点是什么？确立什么样的报道主题？

最早刊登这个座谈会消息的当地的一家报纸负责人，事后对中央一家大报的一位记者说，当初并未打算报道这件事，因为争论在蛇口的确很寻常，不值得。

按照这位负责人的说法，这个座谈会并不值得报道，但事实上却又报道了，而且连篇累牍，文章一篇比一篇大，调门一篇比一篇高。到底为什么？这位负责人在同中央一家大报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坦率地说明了原由。

他说，不想报道座谈会是当时的想法。但在会后第二天，曲啸在深圳市演讲，专门用一段话来“贬损”蛇口青年，电视也放了，以后又冒出那份“不那么光彩的材料”，我们才感到不能沉默，要维护蛇口青年的声誉。报社两位年轻记者正好参加了座谈会，提出了报道设想，才开始报道出来。

1988年2月1日，蛇口的那家报纸在头版报眼位置发表了“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的消息。不难看出，这条新闻的出现，不是由于座谈会本身有什么重要新闻触发了记者的新闻灵感，而是由于在座谈会外发生的被认为是“贬损了蛇口青年”的曲啸在深圳的演讲和一份仅供领导参阅的内部材料，激怒了新闻界的

某些编辑、记者，成为这场风波的导火线。

最近，曲啸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谈到上述问题时说，大家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我们同青年之间有不同意见存在是正常现象。但是对于错误观点，要旗帜鲜明，对就说对，错就说错，这才是对青年人的真正爱护。

关于材料问题，记者最近走访了当事人、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育研究所教师郭海燕。她说，那份材料是我写的，与三位老师无关。作为旁观者和见证人，我认为如实反映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是我的权利和义务。促使我写这份材料的直接动因，是会上会下个人的作法引起了极大的疑虑。一位座谈会的主办人在会上显得异常兴奋、活跃。当个别青年发表与曲啸老师不同的观点时，他从9楼跑到1楼，对我所的同志说：“僵到那儿了，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第二天他见到我时十分神秘地说：“昨天我和记者谈了很长时间，他们要写东西攻曲啸，你告诉李老师，千万别沾他们（指曲啸、彭清一）包！”当时还有知情者透露，蛇口方面在暗中录音，并马上要整理出材料，供新闻界“披露”。这一系列做法，引起了我的怀疑，这次座谈会的主办者到底要干什么？正是出于这种疑虑，我起草了一份反映座谈会真实情况的材料，交给了共青团深圳市委。除此以外，我没有向任何新闻单位或个人散发过这份材料，也没有任何一位与会者能说出这份材料有什么失实之处。照理说，通过正常渠道，向有关方面提供一下座谈会的情况，包括个别青年人的错误观点，有助于领导部门了解情况，进一步做好工作，这种做法是无可非议的，不能称之为整什么黑材料、打小报告等。

然而，从以后报道的情况看，这场风波的起因远不止此，

而是有着更深层的令人深思的东西。

1988年3月28日至4月25日，蛇口的邵家报纸连续刊出三篇被称为从理论上深入剖析这场“观念撞击”的文章：《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蛇口青年与曲啸等同志还有哪些分歧》《“神的文化”是对人的全面窒息——李燕杰、曲啸与蛇口青年的争论引发的思考》。

从这几篇文章见报起，曲啸、李燕杰等与蛇口青年的座谈是“陈腐观念与现代意识的交锋”，是“传道、受业、解惑”和“我说你听、我打你通”那种“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终结”等论调不胫而走，传遍全国。

这些报道在广袤的内地激起一圈圈波澜，并迅速冲击到广州、天津、南京、安徽、四川、北京等地。这些地方的许多家报刊先后刊出“李燕杰、曲啸在蛇口遇到青年挑战”、“挑战给青年留下思考”等文章。有几家报刊还召开座谈会，对风波问题进行专门讨论。见诸报端的消息或文章的调子，基本上都是向蛇口那家报纸一边倒的。

在“蛇口风波”刮了半年多的1988年8月，中央一家大报派记者采访有关方面人士，写出《“蛇口风波”问答录》一文，并辟专栏，对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探索。同其他报刊相比，这家报纸双方意见都登，似乎给人以客观、公正、让读者充分开展民主讨论的印象。但实际上，这篇《问答录》把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四位同志作为一方，而把其他9位同志作为另一方（其中包括四位根本没有参加座谈的当地行政部门和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形成发言者共同批评李、曲、彭的九比四的局面。之后，在一些报刊上，曲、李等被冠以“教师爷”的贬称而屡遭谴责。而“教师爷”

的称谓就是首先出自《答问录》中一位蛇口权威人士之口。这种名为倡导探索问题，实则具有非常鲜明的倾向的报道，其动机和效果是不言自明的。

《答问录》在这家报纸和它的海外版刊出后，进一步在人们思想深处引起波澜。有人把它称之为了一颗“重型炸弹”，将这场风波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除全国数百家报刊就此发表文章外，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的一些著名人士，也纷纷撰文参与对“风波”问题的讨论。

去年7月，一位理论界知名人士在蛇口那家报纸在京召开的座谈会上鼓动说：“蛇口是小地方，但报纸可以起大作用。报纸发行到几十万份的时候，就比到你那个地方开会、参观的作用大多了。”“关于蛇口青年的争论，我看很有意思。”《新观察》总编辑戈扬说，我感到蛇报是张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报纸。这张报纸不但要面向中国，而且要面向世界，我愿意给他做发行员，到处发行，叫看它的人越来越多。果然，这家报纸先后数次用整版篇幅刊载了有关“蛇口风波”的报道。

今年1月，一本20余万字的《蛇口风波》文集面世。3月，上海一家刊物发表一篇15000余字的长篇通讯《“蛇口风波”始末》。直到今年5月8日，蛇口那家报纸还用了一个整版刊登于浩成写的文章《人民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篇上万字的文章，是由“蛇口风波”引发、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而作的。

记者在翻阅报刊关于“蛇口风波”的大量报道中，常常为一些超出讨论问题范围、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甚至指桑骂槐、讽刺挖苦的言词而感到震惊。

蛇口那家报纸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说：“那些以圣哲自居的‘人物’，不仅自以为是，还要以势压人，仗势欺人，以为自己天生来就是教训人的，一旦听到不同意见，马上暴跳如雷，斯文扫地，以权势代替真理。这样的‘对话’，已不是在探讨真理，而是在进行权势的较量。”

蛇口那家报纸的另一篇署名文章说，曲啸、李燕杰到处演讲、做报告，宣扬的还是一种“神的文化”、“榜样文化”。在他们的报告中，让人感到他们有一种弗洛依德所说的“自恋倾向”——把这种榜样潜移默化到自身，似乎全体听众、全国青年只有像曲啸、李燕杰那样看待祖国、党、人生，才算是爱国青年，才算做到“五讲四美三热爱”了。

今年5月8日，蛇口那家报纸还以“小心这类‘嘴码子’”为题，批判什么“狗的哲学”。文章说，一些五花八门的教育家走南闯北，救火般地到处“弘扬真理”，那精辟的语句，那哲理的火花，确实能激起一片掌声，但深究一下，那些令人激动的话有些不过是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宣扬一种“狗的哲学”而已。

记者读了这样的报道，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些文章与其说在探讨问题，不如说在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舆论，出现这种现象能说是正常的吗？人们不禁要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实质是鼓吹和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 思想政治工作

改革时代，社会变动中的思想交锋在所难免。照理说，蛇口那个座谈会上的意见分歧算不了什么，然而新闻舆论界

有些人就此大作文章。他们提出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与蛇口青年的意见分歧，是“两种深层价值观的冲突”，“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从经济向文化的深入，从中西文化对比向价值观念直接冲突的深入”，“是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总之一句话，“是传统观念的沦落与现代意识的崛起”。

这些带有结论性的见解，给在这场风波中的某些新闻舆论宣传进一步作了注脚。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报刊所反对、批判的是哪些传统观念，他们鼓吹、宣扬的又是什么样的现代意识呢？

争论突出地反映在对“淘金者”的看法上。曲啸在座谈中曾说，有人来深圳的目的，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要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他认为这样的人就是极少数的“淘金者”。

在《“蛇口风波”问答录》中，蛇口一位同志表示对曲啸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他说，“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是“现代意识”。同一篇报道还引用蛇口一位青年的话说：曲啸他们在这里谈“淘金者”肯定没有市场。他很赞赏蛇口那家报纸说的：“蛇口的一切都是‘淘金者’的血汗浇铸的。”还有一位青年说，青年教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应该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战栗不应赞扬。在目前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鼓吹那种无端占用他人劳动的“左”的残余。

天津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更明确地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归结为“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两种深层价值观念的冲突。他在蛇口那家报纸上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说，传统观念以“社会”作为社会自身发展的基础，要求每个人无条件地服从。由于大多数人难以达到，往往产生空洞的说教和普遍的虚假，而且由于个人缺乏自我发展的动力，社会也发展不了。现代的个人本位则首先鼓励和肯定个人的发展，以此作为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基础。蛇口争论的“淘金者”问题，正是两种价值观冲突的反映。他甚至说，个人利己动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历史发展；完全“利他”的动机将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以“淘金”开始的历史纪元，确立了个人本位主义，才有商品经济、法治和民主政治。

蛇口那家报纸在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中，还公然说什么：“在商品经济社会，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前进的有力杠杆……须知，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性，人类社会正是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追求自身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读了这样的报道，记者很自然地联想起近几年来我国广泛流行着的一个口号：“一切向钱看。”这个口号，是一位被严家其在《思想自传》等书中称誉为“中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和“自然辩证法王国的国王”的理论权威所提倡的。这位理论权威说：“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近几年来，有些年轻人只认钱，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能捞钱就好，根本不讲“主人翁”、“责任感”，也不讲“集体主

义”、“爱国主义”、不谈“为人民服务”，甚至连“国格”、“人格”都不要。这种拜金主义腐朽思想的滋长，同这位理论权威提倡的“向钱看”的口号所起的恶劣作用难道没有关系吗？

从社会的价值导向上来看，共产主义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对立，最根本的就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立，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对立。宣传个人本位和个人主义，就是要强调一切事情以个人为中心，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从而漠视、放弃以致否认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从而引导人们走向资本主义。这次从学潮到动乱再到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不少情况都说明，个人主义思想对青年的腐蚀和毒害，是非常严重的，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

蛇口那家报纸一方面支持并宣扬一些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而在另一方面却极力贬低、诋毁先进模范人物的榜样作用。它在一篇题为《神的文化是对人的全面窒息——李燕杰、曲啸与蛇口青年的争端引发的思考》的文章中提出：“榜样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中国还没有一个社会学家、教育专家从这个角度写过一篇论文。然而却有众多的道德家、教育家在各种讲坛宣扬着榜样，放大着其形象和辐射力。”文章还说：“就对青年而言，能够穿越几场政治运动并仍叫得响的榜样恐怕要数‘雷锋’了。当然，雷锋也是死后才树立起来的。自从毛泽东为雷锋题了全国学习的词以后，对雷锋的宣传可谓旷日持久”，“雷锋已成了‘神’——至善尽美、通体纯净、完整无暇了。”“这座神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其要害在于这个价值标准是超现实的，无法企及的。”“这种人格理想只能造就成批的伪君子，表面是这种人格，背地里大相径庭。在我们

周围，可以看到这种向‘神’看齐的人，他们也明知无法变成神，但却可通过这种虚伪获得实惠——党票、官职、权力。”

为了给自己的论点寻找“根据”，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把戴晴、严家其的观点抬了出来。文章说：“作家戴晴与政治家严家其不久前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对话，以‘中国不再是龙’为题，深刻地触及了这一‘神的文化’问题……在这种龙的文化面前，属于‘龙的传人’的只能是恐惧、崇拜、服从，进而产生奴化思想、马屁意识和创造性、批判力的丧失。”

雷锋是“神”吗？不是，他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的代表伟大的时代精神的人。他有作为人的普通平凡的一面，同时，又有作为英雄典型的伟大崇高的一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在向共产主义目标迈进的征程上，需要雷锋式的榜样力量去点燃千万青少年理想之火。在人们心目中，雷锋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楷模；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中，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同公而忘私、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就是要用雷锋精神在培养、造就代代共产主义新人。这家报纸发表文章攻击雷锋，不仅仅是要否定雷锋一个人，同时还要扳倒一批雷锋式的先进模范人物，并企图从理论上彻底摧毁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例如这家报纸在另一篇题为《试论个人主义科学和科学个人主义》的署名文章中，攻击开展学雷锋、学习先进模范人物是为全国人民和青年树立“道德天尊”。他们认为，这样做只能培养人们驯服工具的奴性思想；个人崇拜的现代封建思想；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道德观；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虚无人生；自相矛盾的幸福观；助人为乐中的非科学性。

宣传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思想和优秀品格，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些报刊在反对宣传先进模范人物的同时，进而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到方式、方法全面加以否定。

一些新闻报道说，曲啸等同志与蛇口青年的座谈会，标志着过去那种“传道、受业、解惑”的方式已告结束，“青年已不再迷信权威”，“青年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和观念都要更新”等。一些报刊极力攻击“传道、受业、解惑”。实际上，“传道、受业、解惑”是一般的教学过程。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古人概括的这个教学过程，反映了教育的客观规律。如果不是这样，何必办学校，又何必要教师呢？那些好为人师的知识界“精英”，难道是生而知之、无师自通的人吗？何况曲啸、李燕杰等同志在蛇口那次座谈会上，只是谈了几句自己对深圳的观感，或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有问有答，各抒己见，怎能说是“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呢？

曲啸等同志近年来在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对青少年的思想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还有一大批优秀的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其中有不少并不知名，但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年来，在有人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削弱以至取消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广大政工干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的情况下，他们坚持做青年思想工作，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理应受到尊重。然而一些人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这一大

批长期以来坚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作为攻击目标，说他们“整人”、“训人”、“耍嘴皮子”、“卖狗皮膏药”。还说什么“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思想政治工作计划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等等。制造“蛇口风波”的人，之所以要集中攻击曲啸等人，是因为由于舆论的关系，曲啸他们比较知名。要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工作，便从否定他们开始，这是很有心计的一着。

何谓“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果说这个传统指的是过去那种极左的东西，那么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已经宣告结束了。诚然，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亟待改进。但是，面临第一位的是要不要的问题，而不是从根本上取消。联想到赵紫阳同志在中央工作期间，一贯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淡化”党的领导。在一些报刊制造“蛇口风波”的前后，赵紫阳同志又到处鼓吹“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调，实际上是否定党的优良传统，取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蛇口风波”和赵紫阳的这些言论，以及近年来泛滥成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8月8日）

制造“蛇口风波”实质是 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教育报邀请教育界 部分人士座谈“蛇口风波”（摘要）

《中国教育报》编者按：本报8月8日一版刊登长篇通讯《为什么要制造“蛇口风波”》，8月11日又邀请教育界部分人士座谈“蛇口风波”问题。座谈中，与会同志尖锐地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

“蛇口风波”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有什么关系？和这场动乱有何联系？

在赵紫阳同志的支持下，在一片“淡化”、“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声浪中，“蛇口风波”起了什么作用？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

应该用什么样的思想教育和引导青年？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积极地教育、引导，还是一味地迁就以至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

新闻舆论的社会职责是什么？在“蛇口风波”中，一些报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本报用较大篇幅报道有关“蛇口风波”问题，目的在于引起教育战线和社会各界对这场风波的进一步思考，把在“蛇口风波”中被搅乱了的思想端

正过来，以利于揭露、批判和肃清这场风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热诚欢迎教育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继续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蛇口风波”在宣传上升级是和赵紫阳同志取消思想政治工作紧密配合的

尹栋年（中共北京市委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蛇口风波”从一次偶然的对话引起轩然大波绝不是偶然的，它的实质不是要不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而是还要不要思想政治工作。制造这场“风波”是有其背景和目的的。

昨天，我又看了一遍今年3月上海一家杂志刊登的那篇1.5万字的《蛇口风波始末》，其中有一段讲到：到了1988年5月，中央那家大报有关部门上上下下对“蛇口风波”的关注又增添了新的动力，是因为“从这个月起，党中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指出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宣传舆论机关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怎样就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开展一场生动活泼、入耳入脑的宣传呢？自然最好的由头就是‘蛇口风波’”。从这里可以看到：“蛇口风波”在宣传上升级是和赵紫阳同志支持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打着“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来“淡化”党的领导，甚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是紧密配合的。我们在高教战线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都深深感到，这几年社会上不断刮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歪风。前几年是集中否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今天要取消班主任，明天要取消辅导员，以后是贬低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极力丑

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说什么一提起思想政治工作，大多数人都是敬而远之，一提起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人们的评价是“整人、训人，耍嘴皮子”。这几年，北京地区高校对思想政治工作还是做了艰苦不懈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一些成绩，但我们觉得始终没有走出困境。原因是什么？这里不仅有学校内部的问题，还有一个大环境问题。这几年自由化思潮泛滥，而赵紫阳同志又支持和纵容自由化思潮，在这一种大的思潮冲击下，真是回天无力。所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人心不稳。有的同志讲，我们现在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就是末代干部了。这样下去真是后继无人。这种长期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在这次动乱中受到沉重惩罚。从整个大的环境看，现在要为思想政治工作正名，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正名。

“蛇口风波”的制造者打的旗帜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了挑战，从而全面否定思想政治工作。这几年，我们讲要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加强，改进只是手段，这和赵紫阳同志讲的改造虽然只一字之差，但却是两码事。通过“蛇口风波”的报道，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推倒重来要代替的东西，就是用资产阶级的陈腐观念，来代替马列主义的教育内容。从这次学潮、动乱给我们的启示看，这几年有些传统的、长期坚持的东西的确讲得少了。

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和拥护改革的，但支持改革开放不等于就拥护四项坚持，我们讲改革开放一定是四项原则指导下的改革开放。相反，美国等国家也希望我们改革开放，但他们是想利用我们改革开放把资产阶级那套民主制度和思想体系渗透到我们内部来，实行和平演变。这几年这种资产阶

级自由化影响在学生里都有反映。如有些学生主张改革和开放的实效第一，不要管它什么主义，只要是能够促进现代化就行。这就说明我们讲的四化和有些人脑袋里的四化是不同的，我们讲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是本质，离开了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就会走向反面。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离开改革开放，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我们还发现，青年学生关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他们中有些人脑袋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是什么呢？是多党制。是三权分立、两党轮流执政这一套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制度。同时，在学生中还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参与改革的愿望，但这种良好的愿望如果不引入正确轨道，就会产生破坏力，这次学潮、动乱到暴乱就集中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教育学生中，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决不是空洞的说教，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在新的时代是有新的内容的，今后应很好地坚持下去。

打着“现代意识”“更新观念”的 旗帜贩卖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

罗国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

在“蛇口风波”的争论中，蛇口一家报纸曾经发表两篇文章，把这场争论概括为《“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和《两种深层价值观的冲突》。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点想法。

首先，对这家报纸所说的“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必须加以剖析，把他们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只要

我们仔细看一看他们所极力鼓吹的“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谋生”、“赚钱”，什么理想、信仰只不过是“虚无缥缈”和“空头的东西”等等，就很容易看出，这些所谓的“现代意识”，只不过是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的陈腐滥调而已。远在300多年前，英国的霍布斯就宣扬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活着的等。之后，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家和伦理学家，不断重复着这种思想，对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在八十多年前的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已经对这种能挣钱、能赚钱就是道德的理论作了全面的概括。最近几年来，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现代意识”和更新观念的旗帜，贩卖的却完全是这些腐臭的资产阶级思想。蛇口那家报纸所说的“现代意识”，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至于他们所说的“陈腐观念”又是什么呢！他们把宣传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叫做“陈腐说教”，把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贡献、先公后私和为人民为国家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都看作是与他们所说的“现代意识”相对立的“陈腐观念”。他们所攻击的“陈腐观念”，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指的却是适应社会发展规律、体现时代发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在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必须学会分辨什么是“现代意识”，什么是“陈腐观念”。

其次，说“蛇口风波”的斗争，是“两种深层价值观的冲突”，确实说出了这场风波制造者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来代替社会主义的以社会为本位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蛇口那家报纸的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宣扬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说什么

“现代的个人本位则首先肯定和鼓励个人的发展”，并要“以此作为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基础”，说什么“完全利他的动机将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提倡人们要“首先为自己着想”，并且要“肯定个人本位主义”、“确立个人本位主义”等等。与此同时，他们极力主张，要破除“传统的”、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民族、集体利益的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认为这种价值观“往往产生空洞的说教和普遍的虚假”，并由此而提出要进行“彻底观念更新”，用“个人本位主义”来代替“社会本位主义”（实质上，这里的“社会本位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

为了改革开放，我们必须重视个人能动性的发挥，反对旧的封建道德对人的个性、尊严、才智的压抑。但是，我们决不能提倡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为了个人并最终只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我们必须科学地、辩证地弄清个人和社会的辩证关系。社会和国家应当尽最大可能，使个人利益、个人尊严、个人价值等受到保障，但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并且在必要时，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应当为集体作出必要的牺牲。“个人本位主义”片面地强调个人，其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漠视、反对和敌视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而为“确立个人本位主义”扫清道路。

最近我国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充分说明了“个人本位主义”的价值观，尤其是那些打扮得五光十色的“个人主义”、“个人自由”等等，对青年的影响，是特别需要重视的。今后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加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树立关心集体、爱护集体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

凝聚力，使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

“蛇口风波”反映两种思想 争夺青年一代的激烈斗争

许统乔（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教授）

“蛇口风波”的制造者把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叫做“陈腐说教”，而把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吹捧为“现代意识”。由此可以看出，“蛇口风波”的实质是四个坚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本对立，也反映了改革开放时期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在争夺年轻一代问题上的激烈斗争。

改革开放，首先有一个方向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然而赵紫阳同志对此却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强调要“淡化”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提出“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放松党的领导作用，放松了对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则大开绿灯，采取支持和纵容的态度。这完全适应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需要，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蛇口风波”公开宣扬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几百年来，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始终宣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要素所有者都掌握着资本，每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安乐和利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每一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套理论的核心，就是要美化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宣扬人的利己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些年来，顽固坚持搞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人，总是鼓吹什么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彻底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制；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等等。把四项基本原则都完全扔掉了。不讲四个坚持，只讲发展商品经济，不讲理想，只顾捞钱，还说是“历史的进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必然蔓延。这些年来，有许多人“一切向钱看”已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严重地违法乱纪，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哪有什么“历史进步”可言呢？！在“一切向钱看”思想的影响下，许多青年学生关起门来一心一意搞“自我设计”，实现“自我价值”。这种脱离实际的“自我设计”一旦不能如愿，就会垂头丧气，或对生活失去信心；或者是“自我”发作，对党、对国家、对社会极端不满。在关键时刻，极少数人堕落成为动乱、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参与打、砸、抢、烧，叛国投敌，成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败类；大多数人则迷失了政治方向，走向自己良好愿望的反面，以致与仇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社会渣滓为伍。

血与火的教训向我们昭示，要实现四化，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8月22日）

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 和《河殤》的“新纪元”

靳 仁

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在文艺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我有个基本的主张，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轻易表扬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轻易批评什么。”“什么这个作品怎么样，那个作品怎么样，根本不管这个事。”他还特别声明：“凡是让我审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对《河殤》这个作品，他不仅介入了，而且三番几次地介入，管得很具体，与他的那个宣言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鲜明对照。

请看事实：

去年夏，《河殤》在中央电视台一播出，赵紫阳同志扶植的一批“文化精英”立即带头在报刊上刮起一股吹捧风，一些清醒的学者则写文章对《河殤》宣扬的历史观政治观提出尖锐批评。就在这时，赵紫阳同志对《河殤》不仅表示赞赏，还让有关单位复制五百套录相带，广为发送。对赵紫阳的这种支持，有的报纸在为《河殤》迅速重播而写的文章中作了特意的暗示。

不久，一位友好国家的总理来华访问，赵紫阳同志特别送给他一套《河殤》的片子，并推荐说：值得一看。

9月末，王震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河殇》，并要求中央重视这事件。这时，赵紫阳同志却支吾其词，回避问题的实质，搪塞几句就匆匆宣布散会。

10月，一个《关于处理〈河殇〉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提出，要“发表适量的评论文章，对《河殇》散布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对这一报告，赵紫阳同志表面上并未表示异议。可是当易家言同志的批评文章《〈河殇〉宣扬了什么？》写出之后，赵紫阳却明确表示：不要发表。他硬是利用职权压制对《河殇》的批评，为《河殇》思想的畅行无阻提供保护。

短短几个月之内，赵紫阳同志对《河殇》表现出来的关心是非同寻常的，介入的次数之多、程度之深是令人惊讶的。人们不禁要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支持《河殇》？《河殇》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使他这样着迷？

对《河殇》所宣扬的那一套荒谬东西，易家言的文章和其他文章已谈了不少，我们这里只着重指出一点：《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赵紫阳同志最欣赏的也正是这个“新纪元”。

《河殇》在论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中向人们推出了两个新纪元：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1987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两个“新纪元”一线相穿，都是为赵紫阳和他的现实政治需要制造舆论的。

其一，《河殇》讲“新纪元”，是用来突出赵紫阳、大树特树赵紫阳的“新”权威的。

《河殇》在总体反思的旗号下，一笔抹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抹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

抹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贬低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唯独突出赵紫阳当总书记的这一段。在《河殇》里，巴黎公社不是新纪元，十月革命不是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周期性的社会振荡”和“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有“颠狂的大跃进”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85年仍然是“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只有到1987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才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诚然，《河殇》也不得不提到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但却只是说在“这一天”，历史“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改革大潮，并接着又说“我们正好站在十字路口”。显然，《河殇》作者的意思是在说，当时的中国只是刚“打开封闭的篱墙”，领导者尚未自觉地作出新的历史选择。作者还特别提示说：“无论是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也无论是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们（引者按：这无疑包括邓小平等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没有找到开辟新纪元的“神秘的看不见的经济规律”，只有赵紫阳才找到了这个规律。恰在这时，屏幕上立即出现了赵紫阳的特写镜头，响起了他的讲话声，话音未落，屏幕上再次推出“新纪元”三个大字！作者这样歪曲历史，把赵紫阳之前的中国历史抹成一片空白，调动各种手段突出赵紫阳，就是要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只有他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这不是在大树特树赵紫阳的“新”权威、为赵紫阳独揽大权制造舆论又是什么？

其二，《河殇》讲“新纪元”，给赵紫阳同志搞他的“新

秩序”制造了理论依据和舆论气氛。

《河殇》断言，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根本原因是自古以来一直受着一种“封闭、保守”的“黄色文明”的支配。作者进而抹煞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差别、社会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根本差别，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描绘成仍然是由“黄色文明”笼罩的“板结”的黄土地，并强调说这种“黄色文明”已“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走下去只能是“自杀”。与此同时，他们极力美化“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说是“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合唱”，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新纪元”。他们还说，由于“蓝色文明”代表科学与民主，资本主义直到今天仍在“不断调整和更新”。因此，结论很清楚：只有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在干涸的黄土地上浇下一片霖雨”，中国才能“获得生机”，跨入“新纪元”。换言之，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才是唯一有希望的选择。《河殇》的这一套推导，正好从时髦的“大文化理论”的高度上给赵紫阳搞“新秩序”的现实政治需要以巧妙的支持。

赵紫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并不积极执行中央的方针和决策，而是热衷于顺应所谓“国际进步潮流”去建立他所主张的“新秩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秩序”呢？在政治上，就是削弱以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和政工队伍，淡化党的领导以至“改造”党，把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歪曲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扶植起来；就是不讲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不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扬初级阶段腐败难免论。在经济上，去年9月，陪同西方“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的一位香港大学教授曾指出，“弗的学说与赵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赵紫阳自己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也直接肯定了“以夷制华”的说法，并且说，不要怕人家说“丧权辱国”。一句话说到底，他要搞的“新秩序”是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那一套秩序为主要参照系的“新秩序”。当然，赵紫阳同志知道要在中国建立这种“新秩序”，不仅需要香港报刊讲的“独裁改革”的权力，还必须有舆论的支持。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河殇》的“新纪元”理论帮了他的大忙：既然只有“蓝色文明”才能救中国，他那套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为主要参照系的“新秩序”不正是识时务之举吗？搞“以夷制华”不也就名正言顺了吗？况且，《河殇》是声画结合的电视片，又在黄金时间播出，在制造舆论上有着特殊的效应，其观众覆盖面之大更是一般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所不能相比的，它所制造的舆论气氛不恰是赵紫阳搞“新秩序”所求之不得的吗？

《河殇》的作者利用“新纪元”吹捧赵紫阳，为赵紫阳搞他的“新秩序”制造舆论，赵紫阳同志则利用手中的权力支持《河殇》的传播，压制对《河殇》批评。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关系的互相支持，或者说是利益交换关系把赵紫阳和苏晓康等人紧紧地联在了一起。然而，这种互相支持也反过来说明赵紫阳要搞的“新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应有的新秩序。

活生生的事实还说明，孤立地大讲“少管，少介入”只是

一种障眼法，所谓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更是虚伪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对文艺都不可能完全不加干预，对具体的作品都不可能“根本不管”，区别只在于干预的范围、标准不同，介入的方式、途径不同。事情的关键不在于管得多和少，而在于按什么原则和方向去管。赵紫阳同志口头上讲要“少管，少介入”，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实际上做起来则是只许我介入，不许你介入，只许按照纵容、鼓励、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需要去管，不许按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去管。换言之，他大讲“少管，少介入”是用来束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的手脚，而让搞自由化的人在文艺领域为所欲为。对赵紫阳讲“少管，少介入”的真实意图，苏晓康们是心领神会的。去年10月，苏晓康在他写的《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中，破口大骂王震等同志对《河殇》的正确批评，胡说什么“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并由此大加发挥地指责说“‘不干涉文学艺术问题’的政策，每每到紧要处便会化为泡影”。他的逻辑显而易见：赵紫阳如此具体地支持《河殇》，把易家言的文章打入冷宫，都不算干涉；只有象王震同志那样批评《河殇》，才算干涉。苏晓康与赵紫阳上下呼应，一唱一合，用他们的行动为所谓“少管，少介入”和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作了透底的注脚。

最后应当指出，正是因为有了赵紫阳的支持，苏晓康们在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越来越肆无忌惮，直到把坚持自由化立场变为策划、煽动动乱的政治行动。今年2月，苏晓康积极参与33人联名上书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要求实行大赦，释放所谓“政治犯”，他和极少数策划者这样做实际上已是

在为动乱作准备。到动乱开始后，《河殇》的作者和顾问中有好几位迫不及待地出来登台表演，苏晓康本人更理所当然地成了煽动和策划动乱的头面人物之一。4月28日，联名发出煽动新闻界支持动乱的致中共上海市委公开信的30人中，有他；5月14日，率先发表逼迫政府要承认整个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非法学生组织为“合法组织”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的12人中，有他；5月16日，公开发表否定“4·26社论”、再次要求承认非法学生组织的“合法性”的《5·16声明》的首批签名者中，有他；5月20日，发出叫嚷“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的《我们知识界的誓言》的10人中，又有他；国务院发布戒严令之后，与严家其一起发出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的电报的几个人中，还有他。与此同时，他又是紧张地参与密室策划，又是声嘶力竭地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煽动演说，又是参与发起成立非法组织“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又是带头参加支持绝食和反对戒严的非法游行，为动乱的不断升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那反动的政治野心也随之暴露无遗。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动乱就是苏晓康们要搞的“新纪元”的一次大曝光，也是赵紫阳为推行他的“新秩序”而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互相利用、互相支持所必然酿成的一个恶果。其中，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原载《光明日报》1989年8月14日）

方励之张显扬们早就 提出要搞“动乱”

赵 前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发表以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赞同和拥护。然而，动乱的策划者们却气急败坏，大肆鼓噪，反对这篇社论，尤其拚命反对“动乱”这两个字。策划和制造动乱的人，为什么那样讳言“动乱”，怕说“动乱”，而又采用种种使动乱升级的手段，来反对“动乱”这两个字？

难道社论对于动乱的定性“委屈”了他们吗？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社论的论据是不是事实。

“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这些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这些事实是能够随意否定的？

“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切，言犹在耳，白纸黑字谁又能说它们不是事实？

至于说到“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就更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事实了。而且应该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比这里所列举的，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既然这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许《人民日报》社论依据这些事实，对动乱作出恰如其分的定性呢？

其实，首先提出“动乱”的并非《人民日报》社论。早在社论依据当时的事态指明问题的性质之前好久，就已经有人在酝酿动乱，并对“动乱”二字直言不讳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略举一些事实。

且不说那位大名鼎鼎的方励之，早在1986年就大声疾呼要人们对党和政府“捅一捅”，“动作动作”，在1987、1988连续两年屡屡鼓动要“用一些激烈的方式”“夺取”民主，今年1月份又扬言“必须行动”；让我们听听一位名叫张显扬的“精英”人物，在今年2月15日对后来成为“高自联”头头王丹讲的一番话吧。他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现行的政治体制必须废除，中国人还要经历几次教训，诸如社会动乱等。”

很显然，张显扬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废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明白无误地提出是需要“动乱”的了。顺便说说，张显扬其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研究员，此人在1987年被查明在“文革”十年动乱中犯有“三种人”错误，被定为“三种人”而清除出党，是个搞动乱的老手了。他的资产

阶级自由化言论在当时就很成系统。而今，他在中国搞动乱之心仍不死，在这次动乱发生之前两个月，他就同北大学生王丹毫不含糊地提出“动乱”来了。

今年2月28日，另一位“精英”人物还同王丹有过一番交谈。交谈中，他们“一致认为，今年恐怕过不去，一定会乱。”乱者，动乱也。为了搞动乱，此人还对王丹说，他“认为现在应该出一些地下小报，宣传反对派思想，并强调应首先以人权为重。”在这里，连搞动乱的具体手段都已筹划出来。

到了今年4月20日前后，也就是这次学潮刚开始不久，方励之在接受香港某新闻单位记者的电话采访时，就讲得更加直露而肯定了。方励之得意地说：“中共若不与学生坦诚对话，那么形势就不容乐观，甚至会演变成为动乱。”4月21日，北京农业大学贴出一张小字报，文中引用了另一位著名“精英”金观涛的一个“论断”——“任何一个组织都要产生无组织力量，其使命是动荡和摧毁该组织的存在”，声称“中共今日正是一个即将溃灭之组织”，并且呼喊：“中国大乱之至。中共危亡在日。诸位拭目以待之。”4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出现了另一张小字报，标题本身就是《运动了!!!》这不就是直接引用电影《芙蓉镇》结束时那位疯人在十年动乱之后呼唤“文革”的语言吗？所有这些煽动动乱的言词，都比《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要早好些天。

事实就是这样。策划动乱的人早就提出了“动乱”。但是，当《人民日报》社论实事求是地指出当时问题的性质是动乱的时候，他们就不答应了，就要鸣鼓而攻之了，就要借题发挥，给他们搞起的动乱火上浇油，使动乱更加升级了。

总之，这场由学潮演变而成的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正是在这伙策动者组织者的煽动、鼓噪下，一步步愈演愈烈。比如，学潮开始时，方励之先生的妻子李淑娴就曾给“高自联”头头出主意说：“要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才能唤起同学的同情心，特别是女同学。”于是，果然发生了两次冲击和多日围困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到这场动乱被平息的前夕，被外电捧为“学运领袖”的“高自联”头头柴玲，在天安门广场学生静坐现场还对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说过这样一番话：“同学们不断问我，我们下一步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他们，下一步是流血。唯有血洗天安门，整个中国人民才能被唤醒。”听了柴玲的这一番话，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明明后来没有发生“血洗天安门”的事件，却中外呼应，一起造出了“血洗天安门”的弥天大谎来。原来，这是动乱和暴乱的策划者的需要。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想努力造成这样的事实，造不成也不罢休，还要——也只能乞灵于谣言，而且是互相配合好了来造的大谣言。这就无怪乎柴玲这样的想法“不能告诉”广场上那些准备当牺牲品的同学，而只能事先透露给外国记者。

阴谋见不得阳光，制造动乱者怕人说他们搞动乱，怕的就是暴露了阴谋骗不了群众，搞不成更大的动乱。但是，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决定了他们必定要采取种种手段，促使动乱不断升级，直至发动反革命暴乱。图穷匕首见。当人们终于看清事情的真相时，这一伙阴谋家就再也没有什么号召力了。代价当然是沉痛的，但是给予人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原载《北京日报》1989年7月17日）

资产阶级自由化 与动乱及反革命暴乱

吴 戈

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不久前在北京和一些地方发生的动乱，以及在首都演变为反革命暴乱，从根本上说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产物。整个事件自始至终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鲜明对立。

(一)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以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为特征的一股逆流。邓小平同志曾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强调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1987年初，为了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全面、正确地得到贯彻执行，党中央针对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情况，部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赵紫阳同志是在这个时候担任党的总书记的。

人们曾期望他能够切实地执行中央的决定。然而事实很快表明，他对此采取了两面态度。表面上，他也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却背弃了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这表明他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早已发生动摇。他还提出只要把改革的成绩讲清楚，四项原则的问题就解决了的“自发论”，这实际上是取消四项基本原则。难怪他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一再纵容、支持，而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则竭力加以压制、排斥和打击。这样，就使得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得到了鼓舞，有恃无恐。以致自他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发展为内外勾结的态势，越益严重了。

去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进一步泛滥，其中几个重要的事件为这次动乱作了准备工作。

一是北大“民主沙龙”的开张。这个“沙龙”是由方励之、李淑娴一手策划，主要由王丹等人主持的。在去年“五四”正式开场的时候，方、李就首先登台作了充满火药味的讲演。以后，或由方励之出题，由王丹宣扬方的观点；或由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登台演说。到去年年底为止的半年多时间里，方励之在香港及国外报刊上发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鼓吹动乱的文章和访问谈话约二十篇。他从“民主”、“人权”说到要求释放魏京生和实行“多党制”；从经济“改革”说到必须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私有制，鼓吹大陆的出路是“资本主义化”。他还一再声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等。方励之的这一套货色，成为王丹和“民主沙龙”重要的思想库。有人公然喊出：“应该成立反对党”。并叫

嚷：“要实现民主，关键在于改变中国的环境。”后来的发展进一步表明，这个所谓“民主沙龙”，是名符其实的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的。

二是《河殇》和所谓“河殇热”的出现。《河殇》自称是一部以“对民族历史、文明、命运的全面思考”为已任的“电视政论片”。它通过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任意剪裁，在理论、世界观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宣扬唯心史观；在思想、文化上，全盘否定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欧洲文化中心论；在政治上，否定“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在我国实行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作品在把它说的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奉为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丰碑的同时，把中国文明诬蔑为“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进而提出、颂扬了两个“新纪元”：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新纪元，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率先跨入了历史新纪元；一个是中国以赵紫阳为象征，开始了奔向蓝色文明的新纪元。赵紫阳对《河殇》非常赞赏，把它当作国宝介绍给外国元首。而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受其影响的人对它大肆吹捧，顿时形成了一股异乎寻常的“河殇热”。在《河殇》播出后，它的总顾问金观涛在一次集会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的煽动性演说。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中，这位总顾问和《河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都扮演了动乱制造者的角色。对此，人们从《河殇》中可以不难找到它的踪迹。这也说明《河殇》和“河殇热”的出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为动乱所作的重要舆论准备。

三是前段时间出现的“倒邓保赵”风。去年九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这是一个符合当前实际，有利于纠正前几年工作失误，深得人心的方针。然而，这意味着治理整顿取得成效，纠正某些失误，赵紫阳的错误也就会进一步暴露，影响到继续坚持错误的赵紫阳的权力地位。所以，被称为赵紫阳“智囊团”的人物，通过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透露出了要“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刮起了一阵“倒邓保赵”风。一些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据一位香港教授透露说，是因为“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而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与赵紫阳原秘书鲍彤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严家其和温元凯一起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对话》。他们攻击治理整顿导致“停滞”、“倒退”，“很可能把经济改革都冲掉”。严家其特别提出：“我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的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容许象文革一样用非程序化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在《经济学周报》刊出后，立即在多种香港报刊和《世界经济导报》上登载。其核心就是掩盖赵紫阳的错误，动员为保住他的权力地位而斗争，以使“中国走资的希望”不致破产。这个“倒邓保赵”的阴谋，既是动乱的准备，又在后来的动乱狂潮中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今年以来，动乱的蕴酝和准备进一步加紧。一月一日，方励之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他说，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他提出要通过多种形式，形成对政府的“压

力集团”，“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去实行所谓“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即他说的“全盘西化”。

一月底至二月，活动更为频繁。从苏绍智、方励之等人的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到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和陈军等33人要求释放反革命罪犯魏京生的签名信，又到张显扬、李洪林、包遵信、戈阳等42人的联名信，山雨欲来，讯号频传，使一些青年学生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氛围所笼罩，以至在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向资本主义的明显倾斜。三月初，一些院校就出现了所谓《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三月底，方励之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在有的大学被广为张贴。在北大的集会上，李淑娴则鼓动“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四月中的学潮伊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彻底平反的纲领，就咄咄逼人地出现了。与此同时，各种非法组织也在背后策划者的指使下迅速成立，为实现其纲领而斗争。一场动乱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

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使学潮迅速发展为动乱，并最终恶性发展为一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暴乱。在这次事件中，多年积淀起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进一步泛滥开来，引导着青年学生朝自己初衷的相反方向越走越远。

其一，借口进行“新启蒙”运动，从根本上否定“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历史，歪曲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

长期以来，我们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一个根本性分歧是：如何正确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正确看待我国社会的性质。他们先是主观随意地歪曲、夸大党中央提出的“肃清封建主义余毒”的任务，后来又把“封建主义”的标签紧紧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肌体上，一古脑地把社会主义当作“封建主义”来反对，以此蛊惑了许多青年。

这次动乱中，这股思潮象开了闸门似地进一步倾泻出来，什么“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注入新的文明，正在悄悄地走向死亡”啦，“要反抗加在几代人身上的枷锁，争取拖了几代人的自由”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一些人蓄意歪曲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完全是一种诡计。今天，我们是在已经远远超越“五四”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这四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发展最好、进步最大、也是最稳定的四十年。这已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

其二，狂热鼓吹违反法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民主”、“自由”、“人权”，作为动乱的支撑。

“民主”、“自由”、“人权”，是这次事件中最时髦的口号。各种非法组织、国内外敌对势力也都以此竞相鼓噪。

马克思主义主张讲民主、自由、人权，但是认为必须作阶级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抹煞了它们的阶级性，脱离开具体的社会条件，就只能是宣扬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历来欺骗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惯用手法。

然而，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煽动，对缺乏政治经验、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却具有极大的欺骗

性和煽惑力。有一所大学的所谓《学生民主宣言》中说：“我们有嘴，但一直不能说自己的话！我们有脑，但一直不能独立思考！”这些大学生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哺育、培养，竟然冷漠到了如此颠倒黑白的地步。可见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那一套把他们煽动到了何等地步！还有人鼓动说：“什么法？争民主、争自由就是最大的法。”这就公然打出了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旗号，要求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搞动乱的绝对自由！

所以就出现了极其反常的情况：只要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什么违法的事都可以干；而如果反对他们的做法，坚决制止违法的动乱，就被诬为是“专制”。这使我们看到了如列宁当年所揭露的“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妙再现。

动乱和暴乱的严酷事实和血的教训，已使不少一度沉醉于那一套口号的青年为之惊醒。它告诉我们，在今后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决不能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只会出现那种少数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而对广大人民受到法制保护的民主、自由、人权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其三，鼓吹以资本主义化为中心的“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进行。这是我们对待改革问题的基本态度。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一开始就利用青年学生支持改革、开放的热情，来兜售他们以资本主义化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私货。

把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赵紫阳同志奉为“改革派”，而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诬蔑为“保守派”、“顽固派”。一时间，所谓“拥护改革派，反对保守派”的舆论甚嚣尘上，竟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为了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导向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改革开放，鼓吹“多党制”和“私有化”的舆论，在这次事件中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有的纲领公然叫嚷“取消共产党专制，实行多党制”，公然煽动说：“要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极其露骨地表达了极少数人妄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迫切心情。

对于许多青年学生来说，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为什么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繁荣富强等问题缺乏认识，使之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动乱。这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可以看到，在这次事件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已不仅作为一种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对立的一般的思潮，而且集中凝聚为一种极其反动的、完整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在政治上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在思想上是要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代之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两个月的风风雨雨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为了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我们必须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有效地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光明日报》1989年8月18日）

一部妄图建立资产阶级 共和国的纲领

——评严家其的《首脑论》

钟 海

一本挂满花环和桂冠的书

《首脑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严家其的代表作，是使他获得晋升、重用和巨大“声誉”的主要著作。严家其说：“1986年9月，这本书刚刚出版，我就把他献给了我们共和国的总理赵紫阳。”1986年10月，严家其被安排到赵紫阳同志直接过问、鲍彤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工作。《首脑论》曾经走红一时。某科研部门评定此书为：“是目前我国政治学界影响最大的一部学术水平较高的理论专著。”严家其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的“主要代表作及新见解或主要工作成绩”。他自述道：

1986年9月3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就《首脑论》的出版发行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在会上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接着就中国政治体制的现状和改革趋势作了讲演。《首脑论》出版后，中国掀起了“反自由化”高潮，但正是在这一时期，《首脑论》

在中国四处传播，在1987年内连续印刷了六次，发行量达31万册。1987年初，广州市新华书店评出1986年度十本畅销书，《首脑论》名列其中。安徽省合肥市举行了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评选会，《首脑论》荣获一等奖。在北京举行的《博览群书》的评奖中，《首脑论》荣获1987年度“金钥匙奖”。

《首脑论》在上海出版后不久，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的“海外版”和“台湾版”。台湾“金石文化广场”举办了评选活动。《首脑论》被评定为“1987年度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

《首脑论》就是这样挂满了花环和桂冠，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既然这本书影响大，那我们就不能不分析它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既然它被称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那我们就不能不研究它的“优秀的政治理论”究竟是什么？

《首脑论》值得我们重视之处还在于严家其始终把这本书看作是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相抗衡的对立物。他不止一次趾高气扬地说：“《首脑论》出版后不久，迎来了惊心动魄的1987年早春，可恰恰在这种气候下，《首脑论》在中国四处传播。”他在这里诅咒的“早春”“气候”，就是1987年初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严家其这时洋洋得意、趾高气扬是有道理的。这场斗争由于赵紫阳同志倒转了斗争的大方向，压制、打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纵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夭折了，造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一步泛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的

反动言论“四处传播”的严重恶果。这段历史至今人们记忆犹新。但是，历史终究翻开了新的一页，动乱“精英”严家其和其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严家其连同他的《首脑论》自然也逃不脱历史和实践的评判。

放肆的假科学

翻开这本号称“在政治学领域影响最大的理论专著”，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书中许多篇章讲述的是下述内容：“首脑的食品”、“首脑的礼品”、“首脑的家庭”、“首脑的出国旅行”、“首脑的警卫措施”、“首脑任职时的自然死亡”、“首脑下台后的生活”、“成为首脑前的婚姻”、“任职期间的婚姻”、“首脑的离婚”、“现代第一夫人的私生活”等。上述这些问题，从凡人的眼光来看恐怕还很难属于政治学理论领域。严家其创立的上述政治学理论专题只不过叙述了一些被神秘化了的首脑人物的逸闻轶事，极其肤浅庸俗，既无理论也无研究。严家其认为“首脑的婚姻形式本身也构成一部历史”。（第254页）他总结的这部“历史”有何重要发现呢？请读他概括的一段高论：“国王的日常生活受到整个宫廷的注视，因而，国王要和他的情妇‘幽会’，都是一件困难的事。”严家其得出如此乏味的理论，当然不会没有乏味的根据。《首脑论》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关于“路易十四在娶西班牙公主为王后的第二年，爱上了年仅十七岁的路易丝·隐·拉瓦利埃”的详细过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关于美国总统哈定和约翰逊等人与其情妇的“私通”；还有关于“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嫁”，“也有许多夫情”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一一

引用了。这些描写胜过黄色小说的地方就在于严家其从他的政治学的高度将此概括为“首脑的婚外爱情”并作了“理论”论述。但是，淫荡就是淫荡，严家其将其称颂为“爱情”实在是政治学界的创举。这样低级下流地美化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淫乱放荡的糜烂生活，恐怕连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舆论都不如。众所周知，近期日本内阁前首相宇野、前官房长官山下均为桃色事件被日本公众舆论轰下了台。

在严家其笔下，首脑情妇的更迭，总统的“私通”，国王和他的情妇的“幽会”都成为了政治学理论，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被恩格斯痛斥过的杜林的放肆的假科学，而严家其与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严家其将这些浅薄、庸俗的东西冒充为政治学理论，说明他已经堕落为一个理论骗子，说明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理论上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色就是惊人的浅薄。熟悉严家其的人都知道他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也没有系统研究过的政治学家。他最初是学数学的，但他认为在数学领域里埋头苦干多年也可能出不了名，因此他又转向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他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后，发现又走错了路。搞自然辩证法既要有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又要懂马列主义，但他的数学忘得剩不了多少东西，又不愿学马列。他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里唯一的一位拒绝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人。他反复考虑为了出名，必须告别自然辩证法研究。“文革”后期有一位一举成名的“白卷英雄”，给了严家其很大的启发和震动。1976年初他和哲学研究所的同志一起去昔阳县参观，听说这位“白卷英雄”也来了，便千方百计地要与他建立联系，受到了大家的批评。严家其就是这样下决心投

身到政治领域。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是严家其这位不研究马列主义的人写得如此浅薄庸俗的《首脑论》，竟能挂上“优秀政治理论读物”的一顶又一顶桂冠，这实在是对我们理论界、出版界的巨大讽刺，说明理论界、出版界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世界观

严家其在《首脑论》中处处标榜自己是站在“廿世纪的今天”、“廿一世纪”和“第三千纪”的高度，总结整个人类历史，研究适用于全世界、全人类的理论。他在《序》中说：“科学无禁区”，“对科学来说，我们周围世界的一切”，“都应当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位身在社会主义中国，当时还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政治学家写作《首脑论》，却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列为研究对象，只字不写社会主义，只字不写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和领导人。严家其承认，这本涉及近500位首脑的《首脑论》，“完全不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于自圆其说的巨大矛盾。该书既然定名为《首脑论》，在逻辑上就应当包括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否则该书就应易名为“资本主义国家首脑论”或“剥削制度国家首脑论”。

《首脑论》一书的鲜明特色就是完全不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完全不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这本大讲资本主义世界各国首脑的书长达廿六万字，竟然几乎没有出现一处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字样。在《首脑论》中只讲“人群”、“群体”，而讳言阶级。严家其给首脑下了这样的定义：“首脑或首领就是群体这种社会心理过程的人格化”。

他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群体”概念，掩盖和抹煞资本主义国家首脑的阶级本质，也就掩盖和抹煞了资本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本质。他在给“国家权力”下定义时说：“国家权力是掌握在国家机关及官员手中的权力。”他有意用关于国家权力的表面现象掩盖国家权力掌握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问题的实质。他在论述“权力主体”、“权力关系”、“权力的类型”、“政治体系的类型”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时均回避阶级分析，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闭口不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首脑论》旗帜鲜明地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相对立，十分清楚地暴露了严家其已经完全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公开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写作《首脑论》的目的，严家其在《序》中说，就是献给“那些希望并将成为首脑的人们”。他本人希望成为首脑已经达到了入迷的程度。他十分欣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了追逐权力，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力”（第125页）；他赞美林肯“一心想成为总统”（第126页）；他敬佩“三木武夫想当首相都着了迷”（第127页）。严家其从中悟到了真谛，十分感慨地总结说：“可以说‘首脑迷’正是成为首脑的重要条件”，“要成为首脑，就必须在内心深处立意成为首脑。”（第127页）严家其就是这样做起了首脑梦。他在《首脑论》中写道：“当世界各国的首脑人物在联合国大会或某一位首脑的葬礼上相遇时，我们可以想见，这些人物是沿着人类社会的多么不同的途径、阶梯而登上职位或权力的顶峰的”。

(第78页) 严家其与众不同，他对首脑的会见，不是关心其会谈的内容，而是想入非非，“想见”这些人如何“登上职位和权力的顶峰”。《首脑论》的《序》说：“要彻底了解人民，必须登上权力的顶峰”，公开地表明了他的个人野心。

严家其赞颂的是个人如何登上权力和职位的顶峰，并在《首脑论》中致力于“研究首脑人物取得最高权力的道路和途径”他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呢？第一，他认为“在通往首脑职位的权力的阶梯上，一个人必须取得一个又一个愈益接近首脑职位的地位。”他把“攀登权力顶峰过程”概括为三阶段：早期阶段、踏入政界阶段、争取成为首脑阶段；第二，他提出：“一个人要成为首脑”，“有必要学会政治舞台艺术”。他总结了这种“经验”：“在向政权进军的征途中”，“除了既定的目标外，还要使用种种计谋和手腕”（第110页）。严家其将这种计谋和手腕概括为“政治舞台的艺术”和“政治谋略”，其中有“幕后交易”、“利用派系之间的矛盾”、“冒险”、“有屈从他人的能力”、“高知名度”、“高度自信心”等等。严家其总结的这套“计谋”和“艺术”就是不折不扣的搞阴谋诡计，和林立果实施“571”政变计划相比更阴险、更狡诈。这完全是一套搞阴谋的理论，而毫无学术可谈。

严家其脱离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总结出一套“登上权力和职位顶峰”的理论和思想，完全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是一种赤裸裸的个人野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毫无共同之处。无产阶级的领袖是在革命实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他们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推举出来的一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无产阶级领袖的品格、无产阶级领袖的形成和严家

其总结的这套阴谋理论是根本对立的。严家其所以堕落为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堕落为可耻的卖国贼，不是偶然的。在《首脑论》中他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世界观已经暴露无遗。他的下场是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世界观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纲领

《首脑论》从首脑的日常生活讲到了国家的政治体制，东拉西扯，七拼八凑，涉及不少领域，但核心的问题和落脚点是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

《首脑论》从头至尾美化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明目张胆地把当代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典范。这本书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概括了“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十项“规范”。严家其害怕过早地暴露仇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祸心，在书中作贼心虚地声明：他只概括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政治体系”。但是令人可笑的是，这十项“规范”中每一项“规范”的内容讲的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例如，“规范”所列举的“弹劾制”，讲的内容是弹劾尼克松总统的经过。稍有常识和记忆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弹劾尼克松总统之事决不会发生在70多年以前。诸如此类，书中比比皆是。严家其欲盖弥彰，反而露了马脚。

第一，《首脑论》描绘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首先说明的问题是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他懂得宪法规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性质。他写道：“在廿世纪的今天，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宪法。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制

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位“站在廿世纪的今天”的中国的“著名的政治学家”，却闭口不谈社会主义的宪法，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而是把美国的宪法奉为“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典范。《首脑论》概括的“政治体系完善化”的一项“规范”是：“确立宪法根本原则，在宪法或根本法中明文规定不得修改这些根本原则。”他赞美美国宪法自1787年制定以来，“近二百年来，宪法中的许多原则始终未与修改”。在他看来，美国宪法的根本原则稳定不变标志着美国“政治体系的完善化”。这一主张毫无疑问地意味着美国宪法所规定的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与统治的根本原则应当万世永存。

严家其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极力装出一副捍卫宪法、依据宪法原则行事的模样。5月26日，他在香港某报发表的《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中叫嚷：“通过宪法规定的途径”，“推倒李鹏政府”。其实，他是从骨子里仇视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他参与策动的反革命暴乱失败后，逃到香港，马上就露出了赤裸裸地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凶相。6月26日，他在香港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希望，在未来的中国，……中国要制定一部长期稳定的宪法，以从根本消除今天这样的政治灾难，我希望把三权分立、联邦制、军队的非政治化、国家化作为宪法的根本原则”。他在这里所说的宪法的一系列根本原则，都是美国宪法的原则，在《首脑论》中都作为“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典范进行了论证。严家其在《首脑论》中为何只字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写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绝不是他的疏忽或遗忘，而是因为他是从根本上反对中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脑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爱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恨的反动立场是极其鲜明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严家其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

第二，有意地抹煞美国政治体制的阶级实质，把美国的“三权分立”、议会制作为“建立不同机关间的制衡关系”的典范。他说：“继洛克之后，孟德斯鸠认为国家的权力应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洛克、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传播，引起了人类史上国家机构设置原则的重大变革”。“拿实行‘三权分立’的美国来说，国家机关间有着一系列明确的制衡关系。”“在议会制下，议会和政府间的关系也可以看作一种广义的‘制衡关系’”。严家其在这里避而不谈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大肆美化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其目的就像他在香港发表的“6·26公开信”中说的那样，在中国的未来实行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制。

第三，美化美国总统的个人军事集权制。《首脑论》提出的“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又一项“规范”是所谓的“保持最高国家行政权的统一”。其主要内容如下：“在美国，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总统，同时是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总统不仅握有最高军事指挥权、高级军事首领的任命权，而且对军事和国防政策的制定负有最高责任，通过国防部掌握着武装部队的领导权。”严家其论述这一“规范”的目的，在他的“6·26公开信”提出的关于我国的宪法应确立“军队非政治化、国家化”的原则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说明。这一“规范”完全是针对着我国的政治体制，针对着我们党对军队的领导提出的。实行这一“规范”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也就改变了人民军队的政治性质。严家其所谓的“军队非政治

化、国家化”就是资产阶级化，这是他们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首脑论》中奉为“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典范的美国总统的个人军事集权制，就是“军队非政治化、国家化”的具体模式。

第四，美国的“两党制”、“选举制”、“弹劾制”等均被奉为“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典范。1986年7月7日，严家其在一民主党派举行的座谈会上大放厥词，扬言“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的说法”，鼓吹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和他在《首脑论》中美化美国的“两党制”是一脉相承的。严家其最近在国外继续进行反华反共煽动，肆意攻击党的领导是“专制”、“独裁”，彻底暴露了他在《首脑论》中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就是为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舆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首脑论》只字不谈社会主义，不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这本身就是对待社会主义的一种否定的态度。严家其像其他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一样，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在通常的情况下，还不敢公开喊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号，但反动的阶级本性又决定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宣传和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纲领，因此就使出种种计谋和手腕，有针对性地，即针对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方面，大肆美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舆论准备。《首脑论》出版、发行的时间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其猖獗的时期，方励之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纲领。但是，由于方励之对社会科学一窍

不通，所以他的“全盘西化”的反动主张还没有理论上的论证。《首脑论》则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纲领披上了一件理论的外衣。

值得重视的反面教材和反面教员

严家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的恶性发展是同赵紫阳同志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的立场、态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987年3月，在全党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严家其因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受到审查。在赵紫阳同志的直接支持下，鲍彤伙同严家其炮制了一篇狡辩抵赖的“两点说明”送给了赵紫阳。赵紫阳同志竟以党中央传阅文件形式印发鲍彤与严家其炮制的“两点说明”，公然为严家其打保票，肯定他“没有发表过反对党的领导或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肯定他“是守纪律的，研究问题的态度比较严谨”，并继续重用严家其，让他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照常工作”。严家其正是在赵紫阳同志的直接支持、纵容下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在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充当了重要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这场风波一开始，他就跳上了前台，摆出了同党和人民、同社会主义决一死战的架势。他和其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结成死党，发表了《5·16声明》，声称：“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关头”，“已经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再无后路可以退却”；“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的历史契机”，“应当意识到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严家其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将他在《首脑论》中提出的建立资产

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付诸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行动。他所说的“再无后路可以退却”，不言而喻就是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他所说的“历史契机”和“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就是说他自以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机会来到了。的确，他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动乱已经搞了起来，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的许多人被卷了进去。动乱“精英”们得到了赵紫阳的公开支持，他们和赵紫阳同志上下呼应，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紧密配合，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社会主义共和国处于严重危急之中。严家其一伙利令智昏，穷凶极恶地发动了反革命暴乱，向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最疯狂的进攻。但是，严家其一伙过高地估计了反革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对形势的发展作了错误的判断。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是不可逆转的。严家其一伙策动的反革命暴乱的失败也宣告了《首脑论》宣扬的唯心史观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纲领的彻底破产。

严家其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始终寄托在西方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支持上。早在1988年初，严家其就把《首脑论》一书献给了里根。他说：“1988年2月4日，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举行早餐会前，我和日本、斐济、索马里等国的几位来宾受到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夫人南希的接见，我把《首脑论》献给了里根总统。”1989年7月，严家其逃到法国，以“北京高自联”和“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致各国首脑书》，此文可以看作是《首脑论》的续篇，文中极尽向西方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献媚取宠之能事，卖力地诅咒社会主义制度说：“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

了两股巨大的反民主势力：一是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二是从斯大林开始的社会专制主义。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法西斯主义已经日趋灭亡。但是，蔓延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专制主义，至今仍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猖獗不已。社会专制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推行专制主义。”严家其还奴颜婢膝地向西方资本主义大国首脑献计：“采取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国现政府进行谴责和必要的经济制裁，取消与北京当局的首脑级、高级官方交流访问活动。”从严家其献给里根《首脑论》一书的丑态，到《致各国首脑书》中的卖国主义的喧嚣，说明他已经堕落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可耻的卖国贼。严家其一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是西方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走卒和代理人，他们上台就是卖国。严家其一伙要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必然是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严家其一伙策动的反革命暴乱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贼心未死。在美台港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严家其继续猖狂进行颠覆我国政府的活动。他凶相毕露地叫嚣“中国并不是‘共和国’”，“‘共和国’必须重建”。严家其这位反面教员和《首脑论》这份反面教材告诉我们：在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位反面教员和《首脑论》这份反面教材教育青年和群众捍卫几千万先烈流血牺牲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捍卫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捍卫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捍卫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原载《光明日报》1989年9月2日）

二、“精英”素描

方励之的反共卖国行径

中国科技大学 瓯 海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方励之同李淑娴很快躲进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要求“保护”。这种卖国行径，完全撕下了方励之“民主斗士”的画皮。

过去，不少人感到困惑：方励之是搞自然科学的，为什么不专心于科学研究，却如此起劲地“关心”政治？这也许是因为他爱国的缘故吧。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否。

其实，方励之根本否认爱国主义的口号，哪里还谈得上有爱国之心。他说：“如果要我彻底说，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他还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你不必太注意你是哪一国。”方励之所关心的并不是振兴中华，使我们的民族强盛，而是要使中国解体。他认为，现在的情况，“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要解体”。中国解体了，方励之要向何处去呢？他大言不惭地说：“要到美国去，做世界公民，当中国的爱因斯坦。”瞧，方励之摆出了一副“国际主义”的面孔，呼出了“科学家无国界”的口号；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国际主

义，而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世界主义。

二十世纪初，国际上曾出现过一种反动的理论，叫做世界主义。这种理论认为，民族文化遗产、国家主权等概念，都已成为“过时的概念”，世界是“每一个人的祖国”。持这种理论的人，主张“消除民族界限”，“消除国家界限”，组织所谓“世界政府”。在仍然存在着根本对立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着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世界上，世界主义这种理论，显然只能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反动思想工具，它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一些反动的阶级利用世界主义，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反对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民族虚无主义者则利用世界主义，否认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贩卖帝国主义文化。爱因斯坦也曾从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侵略和战争，赞同“世界政府”的主张。当然，爱因斯坦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同上述那些人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的主张，同样是错误的。当时，苏联的著名学者瓦维洛夫、弗鲁姆金、约飞、谢苗诺夫等人，曾对爱因斯坦的主张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爱因斯坦博士已走上一条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他在一个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世界里追逐‘世界政府’的幻景。”今天，方励之重弹世界主义的老调，反对爱国主义，说中国“是微不足道的”；他否认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叫嚷“中国可能有很多文化都要淘汰掉，彻底淹没”，他鼓吹“做世界公民”，主张消除国界，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励之躲进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保护的行径，充分暴露了他所标榜的所谓“做世界公民”，原来是反共卖国的代名词。他的一言一行都在证明，在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对

立的制度的地球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世界公民”。

方励之为什么否认和反对爱国主义，宣扬世界主义呢？其目的就在于掩盖他反共卖国、推行“全盘西化”的真面目。因为，我们的祖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方励之不仅反对爱国主义，同时也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有中国特色。他说：“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名词。”“没有必要说一定要保存中国特色或中国传统。”因此，他在北京大学的“民主沙龙”上宣称：“不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法”。他为什么反对这个提法呢？其根据就是“现代化不分国界”。这样，世界主义不仅被用来反对爱国主义，同时也被用来反对社会主义了。既然现代化是不分国界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去注意“东方”和“西方”的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所以，方励之既不赞成“中国特色”，也不赞成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只能是“全盘西化”。

方励之也深知，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的确是一件难事，他认为主要的障碍是“中国的体制和传统造成的观念，使得上面的作用显得非常大”。因此，方励之极力想利用国外敌对势力来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同引进西方的技术比较起来，“中国更需要引进一位总理”，以改变“上面的作用”。方励之的这种主张，从反面告诉了我们一条真理：现在的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斗争，现代化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现代化，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方励之也深

深地了解这一点，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首先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大声疾呼：“中国更需要引进一位总理”。

显然，依靠引进西方的总理，是不能如愿以偿的。比较现实的作法，是让西方更多地“关注”中国的问题，造成“以洋人压政府”的局面，促进“全盘西化”的实现。这就说明，反共必然投洋，而投洋必须反共。方励之深深地领悟到，要引起洋人的“关注”，首先要讨得洋人的欢心。怎样才能讨得洋人的欢心呢？办法有二：一是吹捧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鼓吹“全盘西化”；二是骂共产党，骂人民政府。方励之的得意弟子王丹为他道破这种反共投洋的天机：你从事骂共产党、骂政府的活动越出名，便越能得到西方某些人的喝彩，你的知名度便越高，便越能获得**更多的自由**。在这几年中，方励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洋人眼中的“**世界名人**”，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捧”和“骂”的伎俩。

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接受他的“全盘西化”的纲领，方励之不仅四处活动，组织国内的“压力集团”，而且还要造成西方对我国政府的压力。二月十七日，方励之在家中举行记者招待会，抱怨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只公开批评苏联，没有公开批评中国。因此，他“希望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单一标准，不要采取双重标准”，不仅公开批评苏联，同时也应该批评中国。在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他企图同布什接触，“希望美国对我们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他还说：“如果我有机会同布什交谈，我将提出人权问题，包括中国关押政治犯问题。”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他伙同一些人发起了“征集签名”运动，得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动乱和反革

命暴乱期间，他还要求外国公司抽走在中国的投资，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他叫嚷：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应当抽走他们的资金，“至少把人权作为投资的条件。”但是，方励之反共卖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上，同一切国家和民族发展友好关系，但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事实已经证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是要同中国人民长期友好下去的。方励之企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附庸的阴谋，彻底破产了。他的反共卖国的行径，将永远被中国人民所唾弃。

（原载《光明日报》1989年8月9日）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王 昭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光荣！”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前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做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

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之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径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持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

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关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提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它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转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

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

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

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地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们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拚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之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

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嚎。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得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北京市民的信心，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原载《北京日报》1989年6月24日）

李淑娴有一颗什么样的“中国心”

周彤文

今年6月5日，李淑娴和她的丈夫方励之畏罪潜逃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保护”。这一公开叛国的无耻行径，不啻是为她几年来的丑恶表演添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这一笔把她用来骗人的一件件外衣统统剥得净光，使人们终于看清了她的庐山真面目。

李淑娴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们进行这样的自我表白：“我这颗心是一颗道道地地的中国心。”“真正的、诚实的中国心。”上述事实已经完全戳穿了她为自己编织的美丽光环，在此之前，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煽动学潮、制造动乱的大量言行也同样证明了她说的全是谎言。

(一)

自1986年以来，声称要“解散中国”的方励之在国内各种场合狂热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李淑娴则公开申明她和方励之是“志同道合”的，她完全支持丈夫的事业。不仅如此，她还和方励之一唱一和，进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蛊惑宣传，甚至不惜把污蔑党和政府的谣言造到远在国外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间。特别是方励之被开除党籍，行动一度受挫之后，李淑娴更加活跃、更加露骨地四处活动，她或在西方记者面前抨击党组织的决定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声

明方励之没有错；或在学生之中传播方励之拒不认错、身体健康、坚持斗争的消息。她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千方百计地为方励之扩大影响，她不但怂恿学生请方励之到北大讲课，发表演说，举办“民主沙龙”；还“大胆地避开机场当局”，安排西方记者和方励之的会见，以便把舆论造到国外去。

有人可能认为，李淑娴和方励之如此沆瀣一气，是否是出自他们的夫妻感情呢？其实不然。李淑娴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她和方励之的反动政治立场是完全一致的。1988年9月，香港反动刊物《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访问方励之时曾经问：“李淑娴还在党内，而你已肯定不会再加入了。你们夫妇间有什么不同看法吗？”方励之说：“这倒不会。实际上她比我讲得还利（厉）害，了解我们的人都知道。”1989年1月22日的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李淑娴的一篇署名文章，道出了她的心声。她在文章中咒骂社会主义制度“压抑个性”，“假共产主义之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还说：“假共产党之名可以杀任何人，作出这种决定的只是一些领导人。”从中不难看出，她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完全采取了敌视和彻底否定的态度。这就是她和方励之一致的政治立场。

（二）

1987年春夏以后，李淑娴则俨然以“青年导师”、“学生代表”的面目，频繁地出没于北京大学生之中，在骗取学生信任的同时，寻找机会，煽风点火，蓄意把一些富于热情而缺乏理智和政治经验的学生引向同党和政府对立的危险境地，以便火中取栗。后来，她发现了不思努力学习却总想在

政治上出人头地而又颇有活动能量的王丹，便和他勾结起来，演出了一出煽动学潮、制造动乱的双簧戏。

1988年5月4日，正值北大庆祝五四运动69周年和建校90周年之际，李淑娴突然携方励之粉墨登场，来到北大校园内的塞万提斯像前，“与北大青年会见”。方励之拿着手提式话筒神气活现地大讲“我现在活得很自在，到处受到欢迎。”并大肆攻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李淑娴则攻击中国不民主不自由，声言“愿做一粒沙子，为后人铺就一条自由之路。”从此以后，以王丹等人为骨干、以在北大学生中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聚集所谓“民主力量”为目的的“民主沙龙”就开场了。

1989年适逢五四运动70周年。海内外反动势力纷纷登场，互相勾结，积极活动，蓄意要利用这个时机在中国制造大规模的动乱，以实现他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罪恶目的。李淑娴充当了这股反动势力中一个急不可耐而又十分卖力的重要角色。从1989年1月开始，她就又是在西方报刊上发表反动文章，又是在北大三角地等处张贴鼓动学生闹事的大小字报。4月5日，她和王丹又一次一唱一和地主持了“民主沙龙”。王丹按捺不住动乱到来之前的喜悦，神情诡秘地说：“今年是一个好时机呀，‘五四’、‘四五’、法国大革命，按理说大批记者涌到大陆来，都希望中国民主化在今年有个开端……现在我希望在目前这个时机，大家都团结起来”，“我想大家都窜腾得比较欢的话，这个过程就推进了。”老谋深算的李淑娴则从古到今地大谈“民主”、“科学”、“言论自由”、“兼容并包”、“中国的布鲁诺”，并现身说法鼓动学生进行“合

法斗争”，还对敢于闹事的学生表示“尊敬”。

(三)

1989年4月15日以后，海内外蓄意要制造动乱的敌对分子终于利用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机会煽起了旨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学潮。4月17日夜，王丹等人鼓动一些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声言要向人大常委会递交一封“请愿信”，信中提出了事先精心策划好了的“彻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七条要求。到18日清晨，王丹看学生愈来愈少，就急忙给李淑娴打电话求救。他回来后立刻传达了李淑娴一要坚持，二要递交人大常委的“两点指示”李淑娴则马上写了题为“天安门前传来的电话”的大字报一式两份，贴在了北大三角地，呼吁“广大同学密切关注”，“希望广大同学声援”。由于作贼心虚，李淑娴没敢署名。

然而，不管李淑娴如何遮掩，阴谋诡计总是要大白于天下的。4月21日，一位经过痛苦的思考、深感自己和同学们上当受骗了的同学生，揭露了李淑娴等人对“运动早有安排的”真相。据这位同学揭露，李淑娴等人为运动安排了四步：“第一步，悼念胡耀邦，顺便提出我们的政治要求。李淑娴老师说，要把为胡平反放在第一条，这样他们就不好说什么了。第二条也别提为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受挫、受批判的知识分子平反，那样太脱离群众，也易引起误会，好像方励之老师参与了，尽量避免给当局以口实。再有，群众最恨腐败，别直接提反四条（四项基本原则），就用这一点攻他们。第二步则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才能唤起同情心，特别是女生，心软，就说警察专打女

生，也能引起男生的‘汉子感’。第三步，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更大了，还能推向全国。第四步，五四达到最高潮。李老师说：要搞臭团委、学生会，这样他们就没帮手了”。

这位同学戳到了李淑娴的痛处，她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竟然当着来访同学的面破口大骂：“他妈的！”

直到北京部分地区宣布戒严以后，5月下旬，李淑娴还对别人说：“天安门绝对不能撤，”“卫星在看，全世界在看。”“北京也可能是个局部，而全国需要一个更尖锐的斗争。”这时候的李淑娴，她的心，就挂在卫星上，挂在她的外国主子的眼色上，哪里还有什么“道道地地的中国心”？她需要的，是在中国发生比当时已经发生的动乱“更尖锐的斗争”这实在是一颗道道地地的祸国之心，卖国之心。

（原载《北京日报》1989年7月15日）

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

叶 光

发生在首都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中，暴徒们抛起石头、砖块，疯狂地砸军车、砸解放军，那一幅幅血淋淋的场面，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人们或者身临其境，或者通过电视屏幕，早就看到了、见识了。然而，恐怕谁也难于想到，一个西装笔挺、温文尔雅、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万润南，也举起了“石头”……

作为四通集团公司总裁的万润南多次说：“我们把四通的英文名字取意为STONE——石头的意思。”“也许，我们是铺路石；也许，我们是新世纪纪念碑的一块奠基石”。5月21日，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成严的第2天，万润南借非法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办的“北京之音广播站”煽动说：政府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它就不再是人民的政府，各界人民要动员起来，粉碎成严，打倒政府……同时重申：四通公司是一个战斗堡垒，就象它的英译名STONE（石头）一样坚硬。怎样用这个“石头”（STONE）？万润南的得力助手、公司副总裁崔铭山向闹事的学生头头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天安门”，“作为四通公司，我们作出的贡献，可以说在北京市排在第一位的。我们是冒着整个公司被政府整掉的危险！”

这就是说，万润南搬起块大石头——“整个公司”砸

过来了！

(一)

对于自己在这场风波中的表现，万润南7月28日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次集会上做了一番自供，他说：任何国家地区的企业家都小心翼翼地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在这次国内的学潮中，“我们却沾上了，而且涉入很深”。他不无得意地声言：“像‘四通’这样的民办企业和个体户，是最积极支持这个运动的一分子！”

然而，学潮之初，万润南还需要有一个掩人耳目的假象。当时四通公司还有过职工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参加学潮活动的规定。实际的情况怎样呢？崔铭山就曾对天安门广场上闹事学生的头头说过：“从你们走上天安门广场那一天开始，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监测着全国各阶层的反映，监测着全世界的反映。我们了解的情况比你们要全面一些，我们所作的判断，比你们要冷静一些。”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公共关系部副部长周舵整天不上班，和闹事的学生搞在一起。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万润南直截了当地说：“是我派去的。”

那么，这个期间他们干了些什么呢？

香港《明报》6月28日登了篇专讯，称“四通”为“海外支持北京学运管道”。文章说：“4月下旬大陆学潮风卷云涌，四通公司成为海外与大陆学生沟通的管道之一。”作为海内外反动势力沟通的一条管道，万润南和四通公司极少数人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以学潮黑手自居的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伙同反动组

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陈军等，搞了份10人签名的《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为学潮打气加油，出谋划策。事隔4天，4月26日早9时半，这份由刘晓波执笔的“公开信”，就张贴在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了。这一代表国外反动势力为动乱所作的谋划，就是先从美国传真到四通公司，再从四通公司传递出去的。而担任“信使”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受万润南指派插手学潮的周舵。

刘晓波受“中国民联”派遣回北京直接参与动乱，也是这个周舵同“四通”另两名工作人员去首都机场迎接的。刘上飞机后，他在纽约下榻处的“房东”、“中国民联”头头胡平的老婆便打电话到北京，告知刘可能下不了飞机、出不了机场即被拘捕等等。刘到京次日，胡平老婆的询盘电话，又打到了“四通”。刘晓波到北京后，便成了“四通”的常客。他多次拜访万润南，进行密谈。6月1日中午，即在刘晓波发起的4人有限绝食闹剧的前一天，他还同吾尔开希一起到四通公司拜会了万润南，双方晤谈了一个中午。

4月27日，周舵从机场接回刘晓波之后，4月30日，他又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亚太经济时报》两名记者串连召开的“五四精神与时局”座谈会，参与起草了为钦本立鸣不平的请愿书。5月3日他们再次聚会通过了请愿书，并议定5月4日策动新闻界“集体围观”学生游行。5月4日12时，一些新闻单位的200来人在新华社前集合后，到民族宫前“集体围观”近两小时，有人打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游行横标，队伍便卷进了学生游行的行列，并由此打开了社会参加动乱行动的缺口。这是事先策划好的预谋，香港报纸当天早上便预报了1000名记者

要参加游行的消息。周舵集合时迟到，硬是追到西单、天安门，赶上队伍，自称“欣然”参加了游行。这以后，他卖力地参与文化界、知识界、新闻界、学生界的一系列活动：他多次参加“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两次代该会起草“告人民书”；他领着海外来“客”去“四通”购买通讯器材支援闹事的学生；他被王军涛（《北京之春》头头、《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指定为海外捐款的3位财务监督人之一……作为受命于万润南的“特派员”，应该说，周舵干得相当出色。

万润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经说：现在社会上盛传，我们“四通”是学运的后勤部、参谋部和指挥部。这些评价，万润南是当之无愧的。

7月30日香港《明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芝加哥28日专电，报道了万润南的一次讲话。万说：“争取民主是开销很大的，在广场上每天开支起码要四万元人民币。当然海外筹集了许多资金，但大部分未能进入大陆。”靠什么呢？“美国之音”7月30日播出的万润南讲话中，万自己作了回答：“广场上的学生主要是靠北京市民、北京的民营经济象‘四通’这样的公司，以及北京的个体户的资助。”公开地亮明了学潮“后勤部长”的身份。

“四通”的一位副总裁曾对学潮头头透露：“四通”支援了20多万元。除了大批直接送到“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的食品、饮料、药物，还提供了一批供反革命宣传煽动用的器材，如无线电话、高音喇叭、电讲仪等等。天安门广场“高自联”指挥中心那部为动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高效率的造谣机器，就是“四通”供给的！

除了“四通”自己的资金，还有“许多海外金钱的支援通过四通公司源源流入天安门广场”（香港《明报》6月28日）。4月下旬以后，海外反动势力就利用“四通”向非法组织“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高自联”等，陆续提供了油印机、打字机、复印机、微型收录机以及传真机等多台。充当联络员和提货人的，是王丹的一位挚友、北大民主沙龙的积极参与者。

“援助”是有条件的。“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

前边提到的那位从“四通”提取美国“资助”的“高自联”提货人，还借助“四通”的通讯条件，多次向海外汇报北京学潮情况及下步打算，并接受指令。5月初，高校纷纷复课、学潮面对难题的时候，在美国的一位提供“援助”的神秘人物就曾在电话中指示说，一、要坚持学生组织合法化的要求，这是当务之急。二、除了要求恢复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职务外，还可要求江泽民、李锡铭下台。三、要把学生办的《新闻导报》坚持办下去。

海外的反动势力远隔重洋的指挥，就这样通过万润南主持的“通道”不断下达。

(二)

5月20日，在首都局势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国务院断然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他们明白：一旦戒严实施，部队进城，动乱被制止，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他们设想的从北京乱起，搞乱全国，借动乱搞垮国家政权的预谋，就将完全破灭。于是，反对戒严，阻止部队进城，搞垮政府，便成了他们当时行动的总纲领、总目标。他们要“进行决死的斗争”（“体改委”一批人5月19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说）了。

面对这种形势，万润南及其得力助手们感到不能再待在后台了。“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拚死一搏！”——正象他的一位得力助手描述的那样，他跳到前台，赤膊上阵，举起“石头”——STONE，“拚死一搏”了。

5月21日，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他先召集北大等校的4个学生头头商谈，再次派助手去天安门广场“调查”之后，召开了“四通”全体干部大会，郑重其事地宣布他要亲自介入学潮，并提醒说：“我介入就是四通公司介入了！”面对员工们的疑惑，他交底说：“上边支持我们这样做！”有了“上边”的授意，万润南不顾“四通”广大员工的意愿，决心破釜沉舟地孤注一掷。

万润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描述当时他们的心情：“如果能劝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撤走，赵紫阳也许还能复出。”于是，一个以学生撤退为筹码，逼迫政府取消戒严、逼迫邓小平、

杨尚昆、李鹏下台、保赵紫阳复出的策略形成了。这是万润南下的第一着棋。

从5月21日至23日短短3天里，万润南不仅两次召开四通公司干部大会，五次与“高自联”的头头王丹等人个别接触谈话，还两次召集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学生头头开会、商谈。

5月22日下午4时许，万润南派人派车直接从天安门广场召来了首都和外地近80所高等院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头头。来到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之后，万润南谢绝饭店服务人员任何服务，关起门来，以大老板身份挥舞起了指挥棒。他首先肯定学生们的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接着打气说：“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

怎样才能“写好下篇”？万润南出主意说：“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回学校，坚持校园斗争。”他特别强调：“这样，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更有利于下一步的斗争。”“下一步”是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知道，军队进京意味着什么吗？如果学生回学校了，就使得外边的部队进京的理由少了一分……那时候你部队进来，要干什么？”他亮出底牌说：“撤退，我们是有前提的，是有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军队回去，你们回校；第二条，取消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第四条，拥护赵紫阳同志。”他还特别强调这最后一条“很重要”。

在这次国际饭店会议上，万润南俨然以一个“指挥官”的身份，做出了具体安排：“你们首先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

记者亮明观点。其次，撤离广场时，可以举行‘凯旋在子夜’的大活动，大进军。”他还着重地说：“是进军，是为了新的目的才回学校。”

5月23日，万润南一边派车去天安门广场接昨天到会的学生头头到“四通”饭店继续开会，协商通过由“四通副总裁曹务奇代行起草的所谓撤离《倡议书》；一边把首都新闻界近20名记者邀请到四通公司，企图通过他们造成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按照万润南们的意愿行事。

然而，绞尽脑汁策划的《倡议书》，尽管在最后成文时删去了一些露骨的反动内容，终因戒严令已经颁布，报纸未能刊登，他们精心筹办的所谓“凯旋在子夜”的示威活动，自然也成了泡影。

万润南不只有这一着棋，为了推翻合法政府。他还有另一着棋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迫使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进而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撤销戒严，罢免总理。

5月20日以后，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深感从党内解决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可能了，便把希望转寄到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上。严家其、包遵信等先是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攻击国务院按宪法授予的权力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胡说“目前宪法受到极少数人的粗暴践踏”，因而“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随即又在香港《明报》上，抛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并告李鹏书》一文，叫喊“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与此相策应、相配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在万润南的

直接支持和指挥下，立即行动起来，策划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非法活动。

5月20日，宣布戒严的第一天，万润南就找该所所长曹思源商谈，面授机宜。5月21日一早曹思源口授起草了一封《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短信，派该所办公室主任中午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家，胡略作修改后第一个签名。下午，该所所有人员一起出动，有的登门拜访，有的电话征询。有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对四通研究所插手有怀疑，拒绝签名，胡绩伟委员便给加上了个“由我委托你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进行”的名义。尽管征集签名信隐去了他们取消戒严、打倒李鹏的真实目的，但是直到23日，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仍然不多。于是，曹思源便把在戒严以前表示过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而没有在征集信上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拉进来，还把几位没有同意签名的人大常委委员也擅自列入，拼凑了个50多人的名单。胡绩伟提议将“征求”的结果交香港《文汇报》发表，曹思源便多次给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通电话联系，商议发稿事宜。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人大常委57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综合消息，并强调指出：“据悉，紧急会议的重点包括罢免李鹏。”

其后，知悉香港《文汇报》这条消息的一些人大常委委员，纷纷辟谣，并提出了严正抗议。“四通”内部也议论纷纷，许多员工表示怀疑和不满，插手签名活动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也乱了阵脚。针对这个情况，5月31日晚，万润南

紧急召开了四通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会上，万态度强硬地重申：“四通研究所就是四通集团公司的！”并就5月30日部分人大常委委员的指责，发表了3点意见：“一是血要热，二是头脑要冷，三是骨头要硬。”公开为他的同伙撑腰打气，要他们站稳反动立场，与党和政府顽固对抗到底。

(三)

无可奈何花落去。

发生在首都的这场反革命暴乱，在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持、戒严部队官兵和武警、公安干警的共同努力下，被平息了。万润南的美梦破灭了，孤注一掷的挣扎失败了。他躲过公安部门的缉拿，和海外反动势力相勾结，6月初私逃出了国境。

到了国外，在洋主人的卵翼下，再也没有必要继续伪装，万润南便赤裸裸地坦露出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来了。为了实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定目标，万润南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立刻和海外反动势力、新近叛逃国外及先期出国的“政治精英”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公开亮出旗帜，开始了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新阶段。

7月，趁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活动的契机，万润南和通缉犯吾尔开希、严家其以及苏绍智、刘宾雁等麇集巴黎，又是参加所谓“民主女神”像揭幕式，又是筹建“民主中国阵线”，万润南还被推为这个新的反动组织的秘书长。事实表明，万润南是横下一条心，要和人民作对到底了。

走到这一步，决非偶然。“四通”公司本来是以高科技开

发为己任的，万润南也借此换来了巨大荣誉。然而，万润南本人早就声明过，他办“四通”并非着眼科技和经济，他要搞政治。5月30日，动乱高潮之际，万润南接见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谈话时就明确地说：“政治民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稳定要有一批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云云，正是他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如何使“中产阶级”大量涌现？万润南叛逃国外后，点得更透了：关键在解决“产权关系问题”，“就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必须要明确的界定”。说白了，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呼唤资本主义私有制。

而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讲，“这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领域，变成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同时，“活跃的经济势力必然会有它的政治代表”。万润南除了自己充当这样的“政治代表”以外，还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探讨、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这就是由曹思源牵头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该所从开张之日起，就把引进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

今年3月26日，该所和《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次“修改宪法理论研讨会”，曹思源在开幕词中就明确提出要把毛泽东、孙中山等人的名字统统从宪法中勾去，否则他“感到羞愧”。有人则挖苦“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由一个阶级、一党一派、一个人的权力来‘决定一切’”。这次会议严格谢绝外人进入，然而，英国《卫报》记者还是作了报道说：“这次4小时会议的参加者们要求删除宪法中任何提及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字。”

一个实现私有化，让一批所谓“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一个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实现所谓“议会民主”——这就是

万润南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这，当然是一枕黄粱！

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阴霾终于被廓清了。万润南带着破碎的梦逃到了国外。四通公司广大员工看清了万润南及其亲信策动、支持和参与动乱，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面目，最近四通集团公司、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已撤销万润南在公司的一切职务，将其开除出公司。至此，万润南搬起石头终于只能砸在自己的脚上。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17日）

动乱“精英”严家其

李建生

一些自命为知识界“精英”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败类的人物，在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担当了策划者、煽动者和组织者、指挥者的角色。严家其是其中一个主要代表人物。

(一)

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来，严家其是“学术精英”。实际上，十年前他就是一个热衷于街头政治和非法活动的怀有政治野心的人。那个时候，他忙于同北京与外地的一些非法组织如“启蒙社”、“振兴社”、非法刊物如《四五报》以及它们的头头密切联系，参加会议，出谋划策，解囊相助。他自己还直接参与“西单墙”下的各种活动，成为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活跃分子。他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西单墙”和非法组织被取缔后，严家其着手“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三本书：一本是由大小字报和各种谣言、传闻拼凑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本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观的《首脑论》，还有一本是自我吹嘘、自我标榜的《思想自传》。他的基本政治观点，是主张中国实行不要共产党领导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认为马克

思主义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是“保卫中国封建文化”。总之，是要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推销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一些人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成为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他被海内外一些人捧为“新型政治学家”、“政治精英”、“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权威”和“民主斗士”、“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当代世界名人”等等，名噪一时。他还频繁“出访”一些西方大国，颇受某些西方政治首脑的青睐，心甘情愿地充当西方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一个代言人。他被赵紫阳同志和鲍彤看中，是不奇怪的。1986年秋，他们将严家其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担任要职。鲍彤还打电话通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要保留严家其的政治学所所长职务，二要派车保证他的活动需要。严家其从此成了被称为赵紫阳智囊班子的重要成员。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后，严家其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但是，严家其立即向鲍彤求援，向他写信为自己的错误辩解。3月20日，鲍彤以中央政体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名义向赵紫阳写报告，说审查中提出的严家其的错误事实是“误解”、“以讹传讹”，称赞严家其“是守纪律的”，要他继续留在政体改研讨小组“照常工作”。赵紫阳同志立即表示同意，并批示有关负责同志“阅知”。这样，严家其就被包庇了下来。

(二)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党内外强烈批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消极对待中央的治理整

顿方针。在这之后，那个被称为智囊团里的人物透露，要刮起一阵“倒邓保赵”风，并由海外一些反动报刊透底，鼓噪只有“邓小平完全退休”，由赵紫阳“独裁改革”，“中国才有希望”。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严家其，这个一头连着鲍彤、一头连着海外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的人物，在“倒邓保赵”风中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和温元凯发表《关于时局的对话》。这篇对话由后来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颇为活跃的《经济学周报》一位记者整理，几乎同时在《经济学周报》和一些香港报刊刊出，《世界经济导报》也发表了内容大体相同的消息。对话的要害，仍然可以用“倒邓保赵”概括。用他们的话来说，中央治理整顿的方针是“倒退”，党内外对赵紫阳的错误的批评使“改革成果面临断送”的“危险”，如果赵紫阳下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停滞”，因此要反对“非程序的权力更迭”。这“非程序”三个字很费了一番心机，值得特别注意。这已经不再有任何学术气味，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动员。

与此同时，他向人们推荐了一套所谓“程序”。去年11月，他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谈话，要人们放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制精神污染的斗争，把腐败的根源归结到公有制上，要求“积极发展私有制”，并从苏共历史谈起，提出“撤销政治局”，建立一种所谓华盛顿式的程序。今年2月，他又在日本提出“必须废除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之，他追求和宣扬的是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西方政治体制。他还在今年某青年刊物第2期上发表谈话，鼓吹按他那套“程序”修改我国宪法，规

定国家政权如何组成，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如果不遵循他的这套“程序”呢？他说“只有通过非程序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诉诸暴力或动乱”！请注意，严家其已经由反对“非程序”走到鼓动非程序。他的这些活动，同方励之等人的“新启蒙沙龙”，陈军等人的签名上书，戈扬等人的演说，李淑娴、王丹等人主持的集会，以及北京一些大学里直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小字报一起，给动乱作了直接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极少数人立即乘机利用学潮制造动乱。游行、静坐和冲击新华门的活动中出现了大量政治口号，最核心的两条就是要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和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家其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两条出谋划策，进行煽动。

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召集一些人物座谈，不少人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央。严家其发言说：“对天安门广场上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1986年的某些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在天安门广场上面，我就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他不仅画龙点睛地概括出两个实质性口号，使之成为动乱初期的行动纲领，并直接为非法游行叫好，给动乱煽风点火。

4月21日，在鲍彤的授意下，他和包遵信贴出《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中央承认游行、静坐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积极”的“民主要求”，向中央施加压力。包遵信后来对香港《百姓》杂志的记者说，这封信“对学生的鼓舞很大”。

4月26日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按中央精

神作出了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但是，遭到赵紫阳同志的非难。赵紫阳5月4日发表“亚行讲话”，5月6日指示要进一步加强学潮报道的“公开程度”，5月16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又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在这一阶段，严家其依据赵紫阳讲话的精神，集中攻击4.26社论和上海市委决定，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策划动乱的不断升级。

4月27日大游行的当晚，严家其说：这次游行“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4月28日，他起草并散发了由他和其他一些人署名的公开信《捍卫新闻自由》，攻击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决定，煽动新闻界进行声援活动和请愿集会。

“亚行讲话”一发表，严家其说“现在出现了转机”，立即提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随后，他与苏绍智等一伙人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界人士起来游行。

5月14日，严家其同其他共12人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中央公开宣布整个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北高联”为“合法组织”，威胁党和政府不得对学生绝食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将成为历史罪人”。这一“呼吁”由严家其定稿后，先在天安门广场宣读，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然后在15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呼吁》提出的要求，立即变成学生的政治要求，并通过舆论工具造成了以绝食学生为人质要挟党和政府的严重局面。

5月15日，他带领一些人搞所谓“中国知识界”的首次游行，并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继续绝食。

5月16日，他又带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人声援绝

食学生的游行，并与一些人发表《5.16声明》，再次要党和政府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

5月17日，他又发起和起草《5.17宣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严家其的上述活动，上面体现了赵紫阳的意图，下面把黑手伸向学生和知识界，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这场动乱从酝酿到发动、经过逐步升级达到高潮的基本过程，揭示了动乱的策划者们从舆论准备到组织、煽动和直接出面指挥的基本轨迹。到了《5.17宣言》，他们的反动图谋和动乱的政治实质就和盘托出了。

(三)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19日李鹏、杨尚昆同志在党政军负责干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20日发布戒严令。赵紫阳同志反对中央的正确决策，公开分裂党，并把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与此相配合，动乱的策划组织者更加疯狂地把攻击矛头指向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同志，策动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企图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组织反对戒严令的大规模游行等活动，使动乱不可避免地走向反

革命暴乱。到了这个阶段，严家其不但在煽动方面继续领衔主演，而且跳到前台承担起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在推动动乱向暴乱的演变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革命狂热。

5月19日后，他多次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组织并主持有苏绍智、王丹、吾尔开希等参加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和“北京高自联”联席会议，策划对抗戒严令的统一行动。

5月20日，鲍彤看到败局已定，提出“党内已不能解决问题了，只能靠人大”。这一天，严家其对人说道：“李鹏应该打倒，要通过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罢免他。”他还参加了反对戒严的大游行，并与一些人发出《我们知识界的誓言》，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

5月21日，他和一些人策划组织知识分子联合会，先组织北京的，再走第二步，“总的目标就是李鹏下台”。同一天，他和一伙人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5月23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正式成立，由包遵信负责统筹。有人说，待全国的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就该由严家其负责统筹了。同一天，《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复印件即在台湾《联合报》全文发表。《宣言》攻击中央的决策、国务院的戒严令为“倒行逆施”，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罢免李鹏案”。当晚他们号召入会者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并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他们编辑的《新闻快讯》，咒骂李鹏同志，要把他“押上历史的断头台”。

5月24日，“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又宣告成立，通过这一形式，严家其等人组织的“知识

界联合会”，同“北京高自联”、“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工人纠察队”、“北京市民敢死队”等正式结成了反革命行动的“神圣同盟”，所谓“文化精英”和社会渣滓完全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共同誓词中叫嚷要“不怕流血牺牲”去推翻我国的政府。

5月26日严家其和包遵信在香港报纸发表《告李鹏书》，再次扬言要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

5月27日，他参加了组织所谓“5000知识精英大绝食”的会议。后来，演出了一场只有刘晓波等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

直至6月3日，反革命暴乱发生后，严家其仍在直接指挥。当天傍晚，他一直在建国门立交桥参与和指挥“堵塞军车进城的活动”，10时半才回到家中。11时多，他又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所谓“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并担任“名誉校长”。他发表了20分钟的煽动性演讲，宣称李鹏必须“主动辞职”，否则“必将受到审判”！他还叫嚷要用鲜血和生命来铸造他们的“民主”。

在戒严令发布之后，严家其们知道他们大势已去。但是同一切反动分子一样，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把动乱“精英”和各种社会渣滓拼凑为一支反动力量，为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拚死一搏。他们是注定要输的。在这输掉老本的一搏中，严家其口口声声标榜的民主、法制、非暴力等堂皇外衣，已被他们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阴谋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的凶残暴行所彻底撕碎，他作为反革命暴乱的一个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的面目已暴露无遗。

(四)

反革命暴乱平息后，严家其在国外敌对势力的策划下，带着老婆逃跑了。在国外，他还在咬牙切齿地咒骂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样很好，好就好在不打自招地供认他不仅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而且是一个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

7月4日，严家其和吾尔开希在法国巴黎联名发表所谓《国殇周日宣言》，叫嚷要在海外成立“中国学运民运联合委员会”，在中国大陆制造更大的“风暴”。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中国民联”头子王炳章跑到香港，宣布要成立一个“流亡的中国反对党”，提名“严家其担任这个党的第一任领导人”，“另一个人选”是方励之。这番话，很能表明卖国贼们和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在严家其身上寄予的希望。7月中旬，严家其又召集一些人在巴黎秘密举行会议，策划成立以反对中国政府为宗旨的所谓“民主中国阵线”，鼓吹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看来，得到海外国外敌对势力支持的严家其们，还要和中国人民继续较量下去。我们一定要彻底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同时警惕极少数顽固分子的新的阴谋，随时防止他们捣乱。不过，我们要正告他们：凡是倒行逆施，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的阴谋既然在国内已经以失败而告终，那么靠海外国外反动势力支撑继续进行捣乱，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他们终究要失败；中国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一定要前进、要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3日）

吾尔开希真面目

石 青

北京发生学潮和动乱以后，吾尔开希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西方一些记者追踪采访，有的还吹捧他为“学运领袖”“民主英雄”。一个一年级大学生何以受到海外资产阶级传播媒介的如此垂青？主要是因为他在今年4月中旬以后的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作为组织者与策划者进行了拙劣的表演。如今吾尔开希已叛逃国外，充分暴露了他的可耻面目。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所谓“民主英雄”“学运领袖”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一)

吾尔开希最初煽动学潮，并非像他自己标榜的什么“反腐败”或“忧患中国教育的危机”，相反，他自己倒真正面临两种危机：一是入学不到一年，他就有三门功课不及格（生理学42分、数学52分、外语57分）面临被勒令退学的危险；二是他倒卖皮毛亏了7000元，债台高筑。这两个危机搅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当老师问他下一步怎么办时，他闪烁其词，一会儿说“学不下去就退学”，一会又说不能这么回去，还要“挺一下”。直到他与同伙挑起动乱，本人也登上高自联主席的“宝座”，他似乎还余悸未消，在宿舍里说：“这次干好了就好了，就是回去也荣耀。”

接触过吾尔开希的人也不难了解，此人虽专业知识、历史知识、理论水平极差，但他那种强烈的权力欲和自我表现欲却非他人所能比。进入北师大后，他曾两次争当系、校学生会干部，均因他平时经常旷课、私自倒卖引起斗殴、学习成绩太差等被否决，为此，他曾找到系领导质问“我怎么就不能当干部”。他自封为“自治会主席”，无疑是这种权力欲的一种满足。有一次，一高年级学生进入他的宿舍，他很得意地对这个同学说：“你信不信，我叫他们（指宿舍里的同学）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随即他叫一个正躺在床上的同学“×××站起来”，那个同学“腾”地站起来，他又说“坐下”，那个同学又坐下。

当然，吾尔开希是不满足这些“小打小闹”的，随着动乱事态的发展，他头脑中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起来，一出出拙劣的表演使他逐步走向反动，并因此而成为名噪一时的“乱世英雄”。

（二）

吾尔开希第一次在北京大学生面前亮相是4月19日，他率领一些人冲击新华门。为把事情弄大，他在静坐的学生前面不停地演讲，煽动大家“不要离开”，“要静坐到天亮，天一亮就有北大学生来支援我们了”。他面对阻拦他们的非法行为的武警破口大骂：“你们是狗，政府的狗！”在新华门前被驱散返校之后，他开始大造“4.20血案”的谣言，说自己身上挨了打，鼓动同学上街游行。但当同学问他哪儿挨打时，他却说不清，也不肯脱掉上衣让大家看。

之后，他便更加兴风作浪，组织和策划这场动乱与暴乱，

请看下面事实：4月21日，由他挑头成立了非法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自任主席后第一件事便是宣布废除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要求各系学生会“交权”。

接着他又当了以悼念胡耀邦同志为名义的4月21日晚开始的大游行及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直接指挥者。这次静坐他再次使用了造谣的看家本领，他拿着手提扩音器向在场同学们宣布：“（人民大会堂）里边传过话来，李鹏总理12点出来与我们见面对话，请大家耐心等待。”结果，引得几万学生翘首盼望。到了12点45分，他又鼓动说：李鹏欺骗了我们！随即领着学生们向人民大会堂冲击。

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着实使吾尔开希乱了一阵手脚，然而等到5月27日“黑手”刘晓波由美国返京，在他的引导下，吾尔开希直接与动乱的幕后策划者严家其、万润南等接上线以后，他便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又被充足气，重新蹦跶起来。

刘晓波回京立即向他转交了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王炳章等人所“捐赠”的数千美元和万余元人民币。刘晓波等人不断向吾尔开希面授机宜，介绍动乱策划者们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使得吾尔开希“大开眼界”。他曾私下对人说：“现在我的理论水平大有长进。”

让我们看看吾尔开希的“长进”吧：5月14日，在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说：“政府是一个由坏蛋和腐败分子组成的帮……党和政府是一回事，要反对政府就必定要反对党。”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目前不安定团结的最大政治因素”。他还明确表示，一定要逼迫党和政府承认“高自联”的合法性，在中国建立起政治上的反

对派。

在回答西方记者提问时，他称“民主就是大多数人能按自己的选择去行动”。可在5月18日，在与李鹏总理对话时，他又说：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不是1%服从99%，而是99%服从1%。应该说这一阶段吾尔开希确有“长进”，他的反动手腕越耍越滑，制造动乱的胆子也越来越大。5月13日，吾尔开希和动乱的制造者们煽动学生进行“绝食”，妄图逼迫党和政府让步。5月18日，在与李鹏总理的对话会上，吾尔开希提出两点要求：承认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高自联”为合法组织。并要挟：满足了上面两条要求，才可以尽量说服同学将绝食改为静坐。也就是说即使政府在原则问题上让了步，他们也没有打算撤出天安门广场，而且还要继续搞下去。在回答法国记者问时，吾尔开希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的要求远远多于现在提出的三、四个条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我们必须逐步前进。

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吾尔开希多次到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去参加严家其、苏绍智和王丹等人组织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和“北京高自联”的联席会，策划对抗戒严令的统一行动。他们派出人四出堵截军车，破坏戒严令的实行。他还通过一些渠道与掌握党和国家机密的人取得联系，为反革命夺权和反革命暴乱制造舆论。5月21日，他在北师大的一次演说中鼓动：“再坚持三天，一个光明的、从未有过的政府就会诞生。”

在24日以后的几天中，由于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北京局势趋于缓和，戒严部队与北京市民关系日益融洽，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使吾尔开希和他的同伙

们深感不安，于是他们便下定决心作最后的挣扎。6月1日，吾尔开希对市民广播说：“天安门广场旗帜依然飘扬，有400多所学校（在那里），我们没有理由中途退出”。同日，他与刘晓波、万润南晤谈一中午，对下一步行动作了策划，导演了一场4人绝食的闹剧。

6月3日，面临灭顶之灾的动乱头头酝酿着最后的顽抗。这天晚上9点30分，吾尔开希在“北师大自治会广播台”作了他在叛逃前最后一次“表演”。他在演讲中煽动说，现在是考验每个共和国公民的时候，每个人在今天晚上都必须做出郑重选择。我呼吁大家今天晚上到天安门广场去！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今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向全国颁发了紧急动令员。”

一些同学在他的煽动下到西单路口去参与堵截军车，其中少数人付出了血与生命的代价。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他们遵照“领袖”的号召去“冲锋陷阵”，可“领袖”却早已溜之大吉。

（三）

溜出中国大陆，吾尔开希等人便一头扎进了国际反共和反华势力的怀抱。为迎合国际反华势力的需要，吾尔开希在国外各种场合继续编造谎言。在接受“美国之音”一次采访中，他又重弹“血洗天安门”的老调，说什么天安门广场死了三千多人，整个北京死了几万人，还说什么“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的纠察队员几乎全部都被打死了”。在此之前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中，他煞有介事地说，亲眼目睹了解放军屠杀一批又一批大学生。

吾尔开希等人继续做着有朝一日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推翻社会主义政府的美梦。7月，他与其他反革命暴乱的在逃通缉犯一起，参加了所谓“民主女神”像揭幕仪式，他在法国、美国，宣称“有一天要将自由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在美国他明目张胆地叫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的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府，建立起资产阶级的“自由”的社会制度。

既要反共和反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向国际反动势力摇尾乞怜。7月底，吾尔开希在台湾人吴英毅的搓合下，与台湾反动势力头目、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心雄握手言欢，合影留念，以求“可靠又独立的经济来源”。在拜见几位反华的美国国会议员时，他竟无耻地建议美国和其他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8月1日，他又跑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进行挑衅，拿着手提式扩音器跳着脚地进行谩骂。吾尔开希预言，他们的“民主运动”要在“三年内取得胜利”……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历史绝不会按照反动势力的意愿去发展。吾尔开希及其同伙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力量。随着这场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真相日益大白于天下，不仅广大中国人民和广大青年学生看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对他们采取鄙弃和疏远的作法。一些法国知名人士早在7月份就提出，法国政府接纳吾尔开希等人是“上了美国人的当”，7月18日吾尔开希、严家其等人在巴黎召开记者招待会时竟然无人充当其翻译，使招待会不欢而散。在美国，吾尔开希等虽受到一些国会议员们的支持，在白宫前却

吃了闭门羹。不仅布什总统不予理睬，就连原来应允的奎尔副总统的接见也化为泡影。

眼下，吾尔开希在西方反华反共情报机构的庇护下，正在国外阴暗的角落里做着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黄粱美梦，但同所有历史上的跳梁小丑一样，他们终究逃脱不了可耻的下场！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8月29日）

吾尔开希在美国扮演了 什么角色？

魏 谷

自己招认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下叛逃到国外的“高自联”头头吾尔开希，于7月下旬从巴黎飞到美国后，顿时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不是“应邀”出席丰盛宴会，就是被抬到大小会场“讲演”，一会儿从芝加哥奔赴华盛顿国会山“朝拜”，一会儿又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美国国会中少数政客、台湾在美形形色色御用组织以及美国和台湾的新闻媒介把他吹捧为“民主斗士”、“民族英雄”等等。

吾尔开希对这一切甚感得意，变得更加目空一切，狂妄自大。为了报恩，他决心在这个“自由世界”里大大表演一番，其特点是造谣、骂人和空喊口号，大概他认为这样更可“骂龙成名”。然而，动机与效果并非总是成正比，正是他的一系列低劣表演使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华侨和美国公众看清了这个政治暴发户既非“斗士”，亦非“英雄”，有些一度“崇拜”他的人也渐渐感到失望。不少正直的美国朋友、爱国华侨，甚至台湾留学生和学者私下里说：“吾尔开希只不过是爱出风头的跳梁小丑而已。”

政客手中的玩物

吾尔开希从踏上美国国土的那天起，就身不由己地任人摆布。美国政府专门派了安全人员作他的“保镖”，24小时形影不离。

美国少数反动势力、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一些人以及披着联合报系美加新闻中心记者外衣活动的台湾大陆留学生工作组成员和台湾控制的各种侨社组织，加上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等一伙人，对吾尔开希的活动进行了精心策划。吾尔开希到达美国后头两天，他们故意不让他露面，制造一点神秘气氛，接着就安排他先在美国电视台接受专访，随即由台湾在纽约的喉舌《世界日报》发表文章鼓励他公开活动后，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又一个“欢迎会”、“讲演会”和“记者招待会”，千方百计钻进白宫和国会去游说美国高级官员出来“接见”，呼吁他们支持吾尔开希等几个叛逃分子反对中国的活动，以达到离间和破坏中美关系的目的。

美国国会中少数政客对吾尔开希的到来也如获至宝，认为又可以利用他投机一番，有的赶忙出来接见，有的颁发“奖章”，有的设家宴，陪乘游艇，……一位暂时不希望披露姓名的美国资深记者看到这种情况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吾尔开希这个中国青年只不过是议员们手中的玩物而已。”他说：“这些议员，他们向来是为了捞取选票，既可无视国际关系准则，也可不顾自己的人格和身份，不管什么样的‘风流人物’都可拥抱接吻，只要能保证会后继续登上名利双收的议员宝座就行。”

会见国民党头目决非偶然

7月25日傍晚，吾尔开希自巴黎抵达芝加哥，是为了参加所谓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代表大会”的。可是，他一下飞机，却撇下到机场“欢迎”他的大陆留学生，乘车直奔一位所谓的“医生”家里去会见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主任郑心雄。这位“医生”是芝加哥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吴英毅，他是所谓“美中支援大陆民主委员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吾尔开希会见郑心雄的消息很快在大陆留学生团体和广大中国留学生中传开，反应强烈。国民党特务一看情况不妙，赶忙叫吴英毅出来为吾尔开希摆脱困境献计，说：“最好由吾尔开希自己出来解释，以澄清不必要的误解。”吾尔开希也慌了手脚，害怕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行动一曝光将损害他的“英雄”形象，慌慌张张地连夜分别打电话给在美国各地中国留学生团体负责人进行解释，诡称他“事前不知情”。

然而，任何遁辞都掩盖不了“会见”的事实。众所周知，郑心雄选在中国留学生芝加哥大会召开前夕专程从台湾赶到美国，就象台湾在纽约出版的《时报周刊》所透露的那样，目的就是来做大陆留学生工作，“支持”他们的所谓“民主运动”。

无知而又狂妄

吾尔开希在一片吹捧声中当上了“政治明星”，处处以学生“领袖”自居，屡次在公开场合自嘲为“1989年最佳布景”。纽约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说，吾尔开希“自信地说自己理论水平高，民运经验多，组织能力强，足以担当

领导大任。”

且不说有不少中国学生特别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知道吾尔开希的底细，就是外国人和华侨看到他这副狂妄的样子也开始感到厌恶。洛杉矶出版的华文报纸《国际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一位台湾的留学生表示对吾尔开希自视过高，开口闭口代表大陆留学生极其反感。”

尤其令人嗤笑的是他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那种蛮不讲理的攻击。基辛格最近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文章，从国际战略格局和美国的长远利益考虑，只是劝导美国政府勿再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他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忍在其首都的主要广场，被几万名游行示威者占领达8个星期之久。”吾尔开希知道这些话对他在国会和其他场所散布的谣言不利，就破口大骂基辛格博士“无耻”、“胡说八道”、“狗屁不通”等等。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访问学者说：“想不到吾尔开希的水平这么差，他除了唱高调、喊口号和谩骂之外，肚子里真没有什么货。”

《世界日报》对他如此低劣的水平甚为着急，也流露出一点不满，用批评的口气说：要在美国进行有效的游说，“不能靠尖锐的措词和口号”，而“需要仔细拟出投合西方价值观念、具体、诚实的说词”。

（原载《瞭望》杂志1989年第35期）

动乱“记者”戴晴

邝 岩

今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首都的由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中，有一员活跃于新闻界、知识界和高校学生之中的“能干的女将”。她上窜下跳，牵线搭桥，呐喊助威，煽风加油，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作了充分的表演。她就是光明日报记者戴晴。

(一)

看过电视片《血与火的考验》的人，大约还记得其中这样的—一个镜头吧：5月11日晚，当北京高校的一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进入第二天的时候，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于造成、苏晓康等—伙知识界“精英”来到学生中间，为绝食学生助威打气。出面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的就是戴晴。你瞧，她手持电喇叭，绘声绘色地极力鼓噪，说什么“自4月15日到今天，同学们冒着生命危险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大，我觉得非常大，如果没有你们（从4月）15号到今天的活动，我们决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局面。”什么局面，当然是动乱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戴晴显然是极力赞赏的。她还说：“一定要让（政府）向同学们让—步！”怎么让步，就是严家其等12人在这天下午炮制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中所提出的要承认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承认“高自联”

等非法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他们提出，如果政府不承认这两条，他们将同绝食学生一起“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尽管戴晴在此也说了一些希望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之类的话，但有了上面这两条作为前提条件，他们的真正用心不就昭然若揭了么？邓小平同志早在1987年3月3日就明确指出：“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戴晴等人煽动动乱，其意亦在此。后来的事实也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紧急呼吁》确实是在为动乱火上浇油。

如果5月14号戴晴在天安门广场的这番表演算作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她在这之前的一系列表演就已经为这次出场作好了铺垫。

(二)

早在今年2月16日，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成员陈军曾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的“政治犯”。2月17日，海外一些人在美国发表《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的条文。对此，台湾《联合报》大肆鼓劲，该报2月23日发表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紧接着，2月26日，张显扬、李洪林、包遵信、戈扬等42人又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

在这种气候下，一向对此类事情不甘寂寞的戴晴再也按捺不住了。3月14日，她联络苏炜等三人又发起搞了个43人签名的公开信。信中说：“前不久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吁请释放魏京生等人，我们认为他们的请求是符合宪法、表达了民意的。在此，我们再次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考虑这一要求。”请注意，戴晴搞这43人签名的公开信，恰恰是在党和政府对此事表明了严正态度、袁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之后。对此，戴晴今年4月对香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的一个人说：“我们是（3月）14日签的，袁木讲话出来的时候，要撤销签名还来得及，但我们都没撤。”从这一段自白中，人们不难看出，她这样完全是“对着干”的。这也暴露了她平素所宣扬的“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影响社会、干预政治”的根本出发点。

（三）

4月15日以后，极少数人借悼念胡耀邦同志之机，煽动学潮，蓄意掀起一场政治动乱。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到处串联，组织集会。此时的戴晴，也异常活跃起来。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鼓动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一向出入于“沙龙”、“座谈会”的戴晴，这样的“座谈会”自然少不了她。她在会上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说。她历数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闻天、邓小平、胡耀邦的经历和遭际后，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总书记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莫名其妙地被拿掉的。”这段话既是暗示要全力

“保”赵，又是严家其的“非程序的权力更迭”说的一个形象的注脚。当然，戴晴是不甘于仅仅为别人做做注脚的。她在讲了上面这番话之后，特别指出：“你这个党内民主这么残缺，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其意在攻击中国共产党内从来就没有民主。那么，哪里才有民主呢？在戴晴的心目中是早有认定的。1989年2月号的香港《明报》上有一篇《戴晴谈心路历程》的文章，文中介绍说：“戴晴有一个新观点，可以说颇具惊人之处。她认为，中国专制的结束和民主的初步奠定，是自林则徐、魏源开始，而至蒋经国完成。遗憾的是，不是大陆，而是台湾，先行实现了这一完成。”哦！原来民主在台湾国民党那里？！无怪乎采访她的那个人也不得不惊叹她的这个“新观点”“颇具惊人之处”了。由此也可看出戴晴的脚根究竟站在什么地方去了。

（四）

戴晴及严家其等人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无疑十分符合《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口味。钦本立决定在4月24日出版的第439期《导报》上全文发表这次座谈会的发言，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从维护大局出发，建议《导报》将严家其、戴晴等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发言内容删去，钦本立则顽固坚持发行未经删节的这期导报。4月26日，上海市委果断作出关于钦本立停职和整顿《导报》的决定，并在下午的万人干部大会上宣布。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导报》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戴晴几次三番地登台表演，把她这个动乱记者的丑恶面孔暴露得十分充分。4月26日上午，她在上海市委作出处理《导报》的决定宣布之前，便给钦本立发了

一封电报：“正义为本，民主为道，本立则道生，钦老板安康”。这是从北京发出的最早的一份给钦本立打气壮胆的电报。电报发出后，戴晴仍觉得不过瘾，又马上给《经济学周报》的总编辑陈子明和《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晚上又给《光明日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鼓动首都新闻界发电报支持钦本立。此后一封封“声援”的函电就从北京飞向上海，飞向钦本立。4月27日，严家其起草了一封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捍卫新闻自由”，信中污蔑上海市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开始，在信上签名的仅严家其等两人。戴晴得悉后嫌人少，声势不够大，便和《导报》编委、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一起，把苏绍智、包遵信、于浩成、张显扬等人拉上，凑了30多人的签名，发往上海，并同时在北京散发。戴晴策划和组织的这些函电和《公开信》，与赵紫阳同志对《导报》的支持态度形成上下呼应，与《导报》内部蓄意制造事端的某些人里应外合，把事态进一步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动乱中去。

（五）

戴晴在《导报》事件中如此卖力，如果认为只是因这一事件直接牵扯到她的发言，那就把她看得太“小气”了。事实上，戴晴同《导报》有着深深的渊源，同钦本立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有着很深的默契。戴晴的一些在其他报刊发不出的文章，在《导报》可以“自由”发表。在戴晴的心目中，《导报》是中国最具“新闻自由”的报纸了。戴晴曾经认为，中国“没有新闻”。她曾对一海外记者发牢骚，说“从82年到88年，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有多少新闻呀！但是我

不能写，你也不能写，没有一个人能写”。戴晴所要求的新闻自由是什么呢？《导报》今年4月3日刊出的一篇文章为她做了注解。该文说：“西方新闻学并不强调‘积极的’、‘消极的’、‘正面的’、‘反面的’报道，而是强调‘新闻事件’，即新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件。”正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把戴晴和《导报》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六）

戴晴在《导报》事件中搅和了一番，仍觉不够劲，又翻出了新花样。4月29日，在一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出“新闻界也要和领导人对话”时，戴晴欣喜之至，她马上介绍张伟国与那个人相识。三个人便当场凑在一起“商量新闻界出场名单”。戴晴提出的原则是：报社部主任以下，具体新闻从业人员。在戴晴看来，部主任以上的干部是不能代表新闻界的。这就是新闻界一些人也要求“对话”的起源。经过一番酝酿和征集签名，5月9日新闻界部分人要求对话的公开信出笼并向全国记协送交。签名者中间自然有戴晴。这一事件与5月4日首都部分新闻工作者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被海外一些资产阶级报刊说成是中国“新闻界的抗议浪潮”。5月21日出版的香港《亚洲周刊》上登有一篇题为《新闻体制面临重大挑战》的文章。文章说：“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对亚洲周刊说，新闻工作者的行动乃受月来的学生运动触发。……大陆记者过往对重大事件的如实报道都无法见诸报章，情绪积压已久，学运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停职事件遂成了导火线，引发记者上街。”不难看出，戴晴在进一步鼓动记者上街了。

(七)

在动乱中上窜下跳的戴晴，在新闻界跳过一阵、煽动一番之后，又跳向知识界和学生中间。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明了这场动乱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当天，戴晴就对香港《天天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她对这个社论表示非常失望。该报记者这样写道：戴晴认为“尽管中共这次态度强硬，学生们还是应该坚持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此外，她又说，学生如果需要她的时候，她会给予援助的。”

果然，4月27日，她便到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校门口去“看”学生游行，观察动向去了。是时，她遇到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她对那位记者说：“今天政府如果对学生镇压，我就退党”。这大概就是她所说的“援助”吧！

当然，戴晴的“援助”决非只此一种。

5月3日，香港《明报》刊登“本报记者北京专电”：“以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许良英等为首的一批著名中国知识分子，就‘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发出一联署倡议书，呼吁中共当局坚持改革，并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坚决支持，称此次学运是极其可贵的爱国行动。”“专电”转发了呼吁书全文，文后签名中，在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许良英、张显扬之后，赫然写着戴晴的名字。这时的戴晴又变成“著名中国知识分子”了。

5月10日，戴晴到中国人民大学讲演。她说：“我觉得，1989年4月27日一定会象1949年的10月1日、1966年的6月

6日、1976年的4月5日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大家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鼓掌、欢呼）。也许你们不知道，从1989年4月27日开始，我们国家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从此就要开始结束了（鼓掌、欢呼）”这里，戴晴犯了一个“错误”，她忘记了1966年6月正是“文革”发难之时，而她把1989年4月27日与1966年6月6日相提并论，正好说明这次学潮是一次动乱。在这次讲演中，她还说：“大概今年年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编了一个《青年研究》，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你们今天会有这样英勇的作为，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大学生和学生运动》，在这篇文章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生们总是对的’（鼓掌）。非常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出来。”可见，戴晴“援助”学生、支持动乱之心早已有之，这篇讲话可谓不打自招。

5月13日，戴晴在一个会议上，提出能否以开座谈会的形式，客观披露一批知名人士对形势的见解，得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的首肯。5月14日，戴晴就把她的那些老朋友拉来“座谈”，炮制了一份《紧急呼吁》，随后，又到天安门广场宣读这份呼吁，发表鼓动性演讲。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这份呼吁书经《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后，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造成绝食学生骑虎难下之势。这就是戴晴所谓“援助”学生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戴晴在一些场合也曾劝说学生复课，劝学生停止绝食，劝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她似乎是站在一种

公正的立场上，因此很能迷惑一些人。其实，她的本意不在这里。她在5月14日晚在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发表演说时，就说过：要“打得出去”、“撤得回来”。其潜台词是“撤”是为了“打”。5月15日，她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采访时，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思。她说：“学生们有很好的个人素质，表现在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责任心、爱国热情、牺牲精神、组织能力等方面，可是他们却缺乏现代社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足够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每个人是有自己的角色的。比方说我是个主角，站在舞台上，当我把剧情推向一个高潮后，我就要退下去，由一些配角上来表演，如果需要的话，我再上来。”那么，学生撤出去，谁上来呢？5月18日，戴晴作出了回答。她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提议知识分子们绝食，换得学生们进食。她要变擂鼓助阵为亲自出马了。

(八)

为了迅速制止动乱，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戴晴感到很失望，流露出颓丧之情，并声称“从此不再参与运动”。

是“从此不再参与运动”了吗？请看她此后的行踪：

5月22、23两日采访7名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绝水的学生，并到他们的家中采访他们的家长。

5月24日，参加全市大游行，手擎“首都知识界”的横幅，并接受一批记者的拍照。

5月30日，接受香港无线、香港翡翠两电视台采访；接受香港商业电台采访；接受香港无线电台采访。

5月31日，接受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戴晴在50天的政治风波里，频繁地与英、美、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接触，接受他们的采访，发表谈话，有些是通过面谈，有些则是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对国内的学潮及动乱作了大量歪曲的宣传。一时，戴晴成了外国记者追逐的“明星”，成了他们歪曲报道中国动乱的一个消息源。

6月4日，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被平息，戴晴说她“心情极为悲愤”，并策划组织知识界人士“联名抗议政府对学生和平请愿的镇压”，但未能成功。就在这时，她又一次接受香港及东京等地电台的长途电话采访，说自己“决意退出中国共产党”。终于在6月5日，她向所在的党支部递交了退党申请，向共产党示威。

这就是戴晴所谓的“从此不再参与运动”。

(九)

戴晴在北京动乱及反革命暴乱中的种种表演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是她长期以来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必然结果。

1978年以后，戴晴开始写小说，因发表反映知识分子两地分居为主题的小说《盼》而有了点小名气，由此跻身文艺界。后调到《光明日报》当记者，进入新闻界。当记者后，她声称“一不坐班，二不采访官式会议，不做那种只发豆腐块新闻的记者”。她感兴趣的是四处采访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物。1986年以后，她利用在光明日报办《学者问答录》专栏的方便，转达传播方励之、严家其、金观涛等人的观点，并与这些人过从甚密。在对香港某杂志记者

谈采访经验时，她“再三强调”：“我得益于思想和情绪的长期压抑，所以当他们一碰到我这样的人，有一种悟性，一种感情的沟通、情绪的沟通”。由于有这种沟通，她和那些所谓“精英”们裹到了一起。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受到赵紫阳同志的阻挠，戴晴欣喜异常，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情绪”，写起翻案文章。她不顾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所写文章的“矛头专门指向我认为她本应维护的东西”（香港明报1989年2月号《戴晴谈心路历程》）。香港某杂志在发表她写的《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时，特别为该文加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戴晴女士再接再厉，继《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之后，为本刊写就另一篇调查报告，详尽记录另一名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崎岖命运，包括他在中共治下步向厄运的悲剧历程。单是他（储安平）右派身份至今未除这一点……俨然是说，即使中国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从未给万恶不赦的‘四人帮’极左派窜扰捣乱，包括储安平在内的一批民主党派人士，始终是无法躲避被打成右派的命运。”戴晴文章的矛头所向被这篇编者按点得再清楚不过了。正因为如此，她受到所谓“精英”们的喝采和赏识，被一些和她“志同道合”的人捧成了“名记者”、“名作家”，受到国外一些图谋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势力的青睐。她自己也就飘飘然起来，经常和“精英”们及以海外“学者”、“记者”们在一起，异常繁忙地出入于一些“政治集会”、“政治沙龙”，实现她的“参与”意识，似乎也是一名“精英”了。

其实，戴晴哪里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她只不过是国内外妄图把中国演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势力的一个走卒

罢了。这个戴晴，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造反派人物。当时名叫傅凝，“文革”之后改名戴晴。然而，名字虽然改了，思想依旧未变，只是从极左跳到极右而已，一遇适当气候，她和她的同伙们便又跳将出来兴风作浪，以求一逞了。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永远不会达到的。中国人民迅速平息了发生在首都的反革命暴乱，使他们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原载《光明日报》，1989年9月13日）

从“轰动效应”到动乱中大曝光

——苏晓康言行简析

尔平新

“河殇效应”的实质是搅乱人们的思想

苏晓康作为《河殇》的总撰稿人，曾经这样概括它的主题：“我们所要呼喊的一个时代强音：中国除了现代化，别无出路。”尽人皆知，在当今世界有多种多样的现代化，苏晓康们究竟要什么现代化呢？还是让《河殇》的顾问金观涛来回答吧：“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顾问如是说，总撰稿人的“现代化”的实质，不是很清楚了吗？

《河殇》打着探讨文化、历史的旗号大肆兜售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腐恶思想。在电视剧中，编导者们把80年代初期的中国描绘成仍然是由“黄色文明”笼罩的“板结”的黄土地，说这种“黄色文明”已“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走下去只能以“自戕”而告终。与此同时，他们极力美化“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用诸如“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之类的象征性语言，鼓动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甚至以调侃的口吻，大谈所谓“变法之艰难，或

许就难在我们总在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声称“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是“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作者正是用这类恶言秽语把中国人民遭踏得一无是处。细心琢磨《新纪元》的逻辑结构，就不难明白苏晓康所鼓吹的“新纪元”是什么货色。这一集其实是金观涛关于“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断言的注脚和图解。它从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歧说起，断言苏联由于“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付出惨重代价，结果东欧各国“或早或迟‘离经叛道’进行改革”，并且武断地说：“历史并没有倒退，而是人们超越了它。”继而慨叹中国一次又一次丧失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并蛊惑性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标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如此与中国无缘？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憎恶它，以致到了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在大规模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呢？”至此，也许作者以为铺垫够了，终于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布哈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为认识这个神秘的看不见的经济规律而付出沉重代价”的背景下，煌煌煜煜地推出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新纪元”。按照这个逻辑，这个“新纪元”岂不是离马克思主义之经，叛社会主义之道，复归到超越了的资本主义阶段吗？作者唯恐人们疑虑，特地在此集的结尾处强调：“……古老的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象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与《新纪元》鼓吹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相呼应，《蔚蓝色》则在鼓吹“蓝色文明”的同时，大声疾呼造就一个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它说：“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

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胜利，中国文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的，它教化出臣民心理。”为了造就这个阶级，按照他们的说法，知识分子必须“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人格”；而“更有现实力量的”，则是“新型企业家们”，以及“小商店的老板们”、“生意人”、“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据说他们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和冲动，都不可低估。”在他们看来，依靠这个阶级才能“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才能与“蔚蓝色的大海”汇合。按照这个“方子”，中国那里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谈得上什么繁荣昌盛，充其量不过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仰人鼻息、拣点残羹剩饭罢了。

正因为如此，《河殇》才得赵紫阳等人的赏识，去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所谓“河殇现象”、“河殇效应”。用苏晓康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曲《河殇》，海内哗然。几度波澜，几番纷争，遂成了龙年一大热点。”“河殇效应”究竟是怎么回事？实质是什么？经历了这场风波，尤其是赵紫阳同志的一系列错误做法被揭露之后，人们终于明白：“河殇现象”原来是在赵紫阳同志支持下，“文化精英”们制造出来的。正如《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殇〉的“新纪元”》这篇文章所指出的：“《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河殇》的作者利用“新纪元”吹捧赵紫阳，为赵紫阳搞他的‘新秩序’制造舆论，赵紫阳同志则利用手中的权力支持《河殇》的传播，压制对《河殇》批评。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人们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怎么想象得到“河殇现象”的背后，竟然隐藏着这种“利益交换关系”呢？

不错，《河殇》的确提出了一些问题。然而，这与其说

为了启发思考，不如说意在诱使人们入其“彀中”，跟着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观点走。比如在《寻梦》中，苏晓康耸人听闻地问道：“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为什么我们终于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之后，忽然觉得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呢？”他进而议论道：“在我们的民族情感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言下之意，岂不是说如果按照历史唯物论去分析历史，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把中国的贫困和落后，归之于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就是陷入“误区”吗？要是认为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成为当今世界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不仅是进入“误区”，而且是“忽然觉得自己非常强大”的自大狂了。这类的例子，在《河殇》中几乎俯拾皆是。这说明苏晓康们在提出问题时，也在挖空心地“导向”，使你不知不觉地落入他们的“彀”中。

而当王震同志在党的一次会议上对《河殇》提出批评之后，苏晓康更加按捺不住了。在他稍后写的那篇《龙年的悲怆》中，又是指责“‘不干涉文学艺术问题’的政策，每每到紧要处便会化为泡影”；又是叫嚷“《河殇》一旦成为‘政治问题’，顿时象万马齐喑了”，“大家只好都闭上嘴”。他甚至声称这是“少年中国和老年中国之争”，是不可调和的。据说“调和的结果，总是我们只能在供奉老人、祖宗牌位的岁月里苟且下去，无可奈何接受那种‘将萎之花，惨于槁木’的结局”。语言之恶毒，立场之反动，实在令人发指。

《河殇》得到赵紫阳的青睐，又得到“文化精英”们的喝采，是与它搅乱人们的思想，进行反动的“导向”分不开的。

“河殤效应”的实质今天看来更清楚了。

“轰动效应”的实质是为动乱造舆论

苏晓康前些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后调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他以报告文学崭露头角。从写作报告文学到炮制《河殤》，直至为制造动乱奔走呼号，是一个蜕变过程。其中固然有“利益交换关系”的驱动，而就其个人来说，则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特别是追求“轰动效应”、热衷于“暴露阴暗面”的结果。

他曾在题为《望瓦尔拉夫之项背——报告文学的苦恼和出路》一文中说：“……别的国家的报告文学也是以题材尖锐、直刺敏感的社会问题而引起轰动的”，“同瓦尔拉夫所选择的题材相比，我们的报告文学的那种尖锐性、深刻性、广泛性，便相形见拙得近乎可怜了。”联系苏晓康的作品，把他这番话推敲一番，就不难明白苏晓康所追求的只是有特殊取向的“轰动效应”。这种特殊取向揭穿了说，就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眼光观察社会现实，以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为能事。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曾经煞有介事地对报告文学的前景表示忧虑，并发出这样的责问：“我们有谁敢碰违反宪法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有谁问津过新闻媒介的弊端？有谁染指过对社会大丑闻的揭露？”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经过自由化的有色眼镜滤过的，其指向也决非报告文学界。

其实，苏晓康追求“轰动效应”，热衷于揭露“阴暗面”，几乎是同他的报告文学生涯一起开始的。他在讲到自己为什么搞起报告文学时说：“转来搞报告文学，原本就是为了寻一块封不住嘴的去处，能对着那些民众关切、世人瞩目、街谈

巷议的敏感问题，畅快地直抒胸臆。”

苏晓康所要的“街谈巷议”、“直抒胸臆”的机会终于被他盼到了。请看——

今年5月中旬的一天，苏晓康佩带写有“河殇”的赫然标记，与同伙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人们顿时为之轰动，他也仗着据说是“雄辩的、所向披靡的口才”，着实鼓动了一番。这可以说是“河殇现象”的“巅峰”，同时也是苏晓康堕入深渊的又一步。

事实上，苏晓康参与策划、煽动动乱，不只是到天安门广场摇唇鼓舌。早在今年2月，他就与陈军等33人联名上书人大常委会与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所谓“政治犯”。这是企图冲开一个缺口，为动乱投石问路，难怪台湾《联合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按捺不住兴奋呼叫什么“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嗣后，随着酝酿已久的学潮因胡耀邦同志的逝世而提前爆发，苏晓康更是频繁地参与策划、煽动动乱的活动，且看：

4月28日，他同严家其等30人一起，发表《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公开信》，肆意攻击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决定；

5月14日，他与戴晴等12人率先发出《我们对局势的紧急呼吁》，声称学生罢课和绝食请愿“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要求政府宣布这是“爱国民主运动”，扬言如果不答应就“将和同学们一道”“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5月16日，他又与一些人聚集在北大三角地召开所谓“中国知识界联合会”，宣读了有210多人签名的《五·一六声明》，叫嚷否定“4·26社论”，逼迫政府承认非法学生组织的

“合法性”：

5月20日，他与包遵信等10人发出了《我们知识界的誓言》，叫嚷“绝不背叛爱国学生的生命和热血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向专制屈服”等等。台湾《联合报》如获至宝，于22日冠以《不向“末代皇帝”称臣》的标题全文发表：

在国务院戒严令发布以后，他又于5月21日，与严家其一起发出致人大常委会的电报，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

苏晓康如此起劲地策划于密室，频繁地活动于现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河殇》拴在一起的，是与“河殇现象”一脉相承的。如果苏晓康在《河殇》问题上的霸道、骄横，看作是有恃无恐的表现，是赵紫阳同志的纵容支持所使然，那么他积极参与策划、煽动动乱，把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变为政治行动，则是“河殇现象”的继续和发展，是企图把赵紫阳支持的《河殇》“新秩序”变为政治现实的最后一搏。跳得高，跌得惨，最后只能是落入罪恶的深渊。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10月14日）

三、 动乱真相

关于这场动乱的十个为什么？

梦 省

当前这场动乱已持续了50多天，在首都则已恶性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由于局势趋向缓和，不少青年学生已转入了思考。笔者感到有几个问题颇值得研究，谨提出供读者参考。

一、从4月15日到22日为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为什么极少数人把李鹏总理作为攻击的目标之一？有的人提出集中要“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但胡耀邦一直未在政府任过职。1987年初处理胡耀邦的辞职问题时，李鹏同志还只是政府副总理，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为什么向他提出此事？到4月26日为止，李总理也还未公开讲过话。关于“官倒”的流传也没有涉及到他个人。在这段时间里，就把矛头集中指向他，这是为什么？

二、5月19日以前，中央的核心机密：从4月24日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25日的邓小平同志讲话，一直到5月20日首都戒严、戒严部队的番号、进军路线都被非法的学生组织事先知道了，并在19日就加以阻挡。但19日以后泄露核心

机密的这种情况为什么又突然不再出现了？

三、广大青年同学出于爱国心，提出要反腐败，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志为此尖锐的警告说：风气如果坏下去……发展下去会成为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但近年来腐败现象仍发展较快，1987年以后，却一度出现了开始发展的国家中社会腐败风气是“不可避免”的论点。谁都知道政府、大公司和大中企业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却出现了要把党风问题“淡化”的说法，要把政府、企业中党员的风气问题与党风分开。这对不对？

四、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搞的动乱，到了5月4日前已趋于平息，5月5日首都高校基本趋于复课。此后，动乱又突然愈演愈烈。到5月28日，首都新闻界除了少数以外，在“新闻自由”的口号下发生失控现象，对游行、示威、绝食、极力火上加油，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折？

五、1988年起的物价上涨过猛，引起群众不满。谁都知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太多，是物价上涨的原因。这不是一年形成的。邓小平同志在今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时讲，如果三年以前采取治理、整顿的措施，情况就会好得多。他并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李鹏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1988年以来的政府工作作了自我批评。报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仅以四票弃权、两票反对获得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而通过。那么，对前几年经济改革中的失误，究竟应该怎么看？

六、邓小平同志根据党关于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历次决议，在3月23日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方面，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的不够。并指出这个问题比

通货膨胀还严重。以后李鹏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这主要是指精神文明建设的失误。那么，为什么有些报纸发表邓小平同志这个谈话时，没有“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这一句话。从谈话的上下文看，这句话又是指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估计。不发表又是说明了什么？

七、5月16日我国领导人先后会见了戈尔巴乔夫。为什么5月17日，首都游行队伍中反对邓小平同志的标语骤然增加？

八、在首都的空前动乱中，为什么以“三所一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名义出现的人特别活跃。他们与北京好几个大学的非法组织有联系，而且直接到天安门广场去，出谋划策。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九、首都非法的“高自联”，不仅得到某些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某些舆论的支持，并在他们控制的校内外电台中大肆加以传播，而且“高自联”是很有钱的。他们从国外及香港的某些人手中得到的大量资金，又说明了什么？

十、极少数人在政治上一再遭到失败后，他们铤而走险，在首都掀起了反革命暴乱。国家和人民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的目的是反腐败反官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吗？这场斗争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应该怎么看？

以上十个问题，建议每个青年大学生都来认真思考一下。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6月15日）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

忻华实

《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称《导报》）积极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这场由学潮到动乱，进而发展成为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政治风波造了一番舆论。在学潮之初，《导报》利用报纸的舆论导向作用，首先公开向党中央发难。在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对它进行整顿后，报社极少数人不仅不幡然悔悟，相反，蓄意扩大事态，与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势力南北呼应，内外勾结，使《导报》成为上海动乱的一个重要策源地，成为海内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煽动和支持动乱的大合唱中一个刺耳的喇叭。

《导报》是打着所谓“新闻自由”、“敢说真话”的幌子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又以被整顿的“受害者”的面目四处招摇，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此，有必要把《导报》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让大家看一看《导报》事件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导报》中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在这次动乱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原439期《导报》的要害是公开提出动乱政治纲领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利用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阴谋策划、组织和发动政治动乱。《导报》的极少数人凭

他们特殊的政治敏感，也立即行动起来。《导报》编委、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在他的工作日志中写道：“胡耀邦逝世，是一个很好的转机，是可以改变当前情况的转机”。当日，张伟国即与《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以及苏绍智等人联系，“打听有关人士反应”。戈扬当时就造谣说：“耀邦是被气死的！改革者竟如此下场！”4月19日，《导报》与《新观察》联合召开“追悼胡耀邦同志座谈会”。《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在此之前从上海“指示”：“内容要有份量，不是一般表态性的”。参加者名单当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座谈会上，几个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发言。他们不顾事实真相，煽动说耀邦“受到不公正待遇”，他的辞职是党的历史上一大“悲剧”，甚至死了连“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也没有。他们要求重新“对耀邦作出公正评价”。他们公开翻“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案，说什么“反自由化运动”甚至在最基层的人民当中也“不得人心”。有人还提出“要对1986年的某些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等等。李鹏同志在分析动乱初期的形势时指出：“这个时期，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正是《导报》召开的这个座谈会，首先鲜明地集中地提出了这两个政治纲领。

围绕上述政治要求，这些人在发言中公开地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已经忘了人民、脱离人民了。严家其更向党中央要挟道：“要无私地承认自己

的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戴晴则大谈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史，大谈几位总书记的命运，说什么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暗示现在要全力“保”赵紫阳同志。一句话，“倒邓保赵”。

当时，学潮已起。座谈会上有些人竭力鼓动学生和群众进一步走向街头，说什么“中国的凝聚力”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天安门广场。他们以学者、名人的身份给学潮火上加油。

由上可见，这个座谈会既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提供了一个向党中央发难的讲坛，又为制造这场动乱进行舆论导向。

对这次座谈会，钦本立等人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做法：指示张伟国详细整理所有发言人的讲话，准备以几版篇幅全文发表；决定《导报》提前一天印刷，赶在胡耀邦同志追悼会举行那天把报纸发往北京；把报道方案预先捅到海外。于是，海外一家报纸在座谈会前两天，即4月17日就透露，《导报》将用专栏报道这次座谈会的重要内容。

上海市委宣传部从海外报刊上获悉这个信息后，由市委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于4月21日下午约见钦本立，要求看清样。第二天市委负责同志看了清样后立即再约钦本立谈话，诚恳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与中央正式决定相悖的意见是宣传纪律所不允许的。尤其在当前学生已经上街的情况下，这个座谈会的部分发言内容如发表出去，会起到错误的舆论导向作用，对稳定当前局势不利。因此，市委负责同志从维护大局出发，也是为了爱护《导报》，建议删节数百字，主要是严家其、戴晴等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发言内容。但钦本立坚持不肯删节这些反对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语句。当领导同志追问他为什么要坚持发表这些内容时，他一语道破天机：“我就是邓小平检讨。邓小平早检讨，早主动，早得人心。他要检讨，我们就拥护他。”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亲自找钦本立谈话，严肃批评了钦本立的错误观点和无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的行为，指出这些内容非删节不可，同时请担任《导报》名誉理事长的一位老同志一起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钦本立最后总算同意删节了。可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实际上他在将清样送市委审阅的同时，就已下令开机印刷刊登这次座谈会内容的439期报纸了。所以，当钦本立在与市委领导拖延时间时，16万多份报纸已经全部印好，并有几百份提前抢送和抢发出去，有的已送往北京了。

市委宣传部得知后，于4月23日下午与钦本立商定：这期刊有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导报》（称做A版）停发，另编B版。按理，这种有限篇幅的改版半天就可以了，仍可保证《导报》如期正常出版。但是此后整整三天过去，439期B版仍未付印。在此期间，市委宣传部多次打电话催促，但始终找不到钦本立及有关编辑人员。现在真相大白：原来4月23日晚钦本立在家中召开编委会，一些编委反对出B版，坚持继续发行A版，最后钦本立总结发言说：“我本来就认为没有什么错。这些删去的内容正是我们报纸要说的。”于是，他们又电告在北京的张伟国把这个消息捅到海外新闻单位去。果然，4月24日香港《南华早报》首先发出《导报》被“查封没收”的歪曲报道。24日晚，钦本立在家中再次召开编委会，决定给上海市委写一份《紧急报告》，接着，钦本立就

躲到樱花渡假村“养病”去了。正如他们私下向香港《明报》透露的：“能多拖一天，就是《导报》的胜利”，“《导报》事件已形成国际影响了”。就这样拖到了4月25日晚上，《导报》编辑部竟又写了一份《紧急报告》送到了市委。报告说鉴于439期A版问题已引起国际上强烈反响，同时造谣说：“据北京消息，中央有可能对耀邦同志重新作结论”，因此坚持要发行439期“A版”，企图用国际的和“北京”的压力，迫使上海市委屈服。这份紧急报告是“专此奉告”，这就是说他们要一意孤行了。

从以上大量事实可见，《导报》组织这个座谈会，并顽固坚持发行439期A版，完全是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上海市委根据4月26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精神，果断地作出关于钦本立停职和整顿《导报》的决定。4月26日下午，上海市委召开“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的万人干部大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宣布了市委的决定，并义正词严地指出：“当前，有人企图利用海外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决不能动摇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心。”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拥护与支持。

上海动乱的一个重要策源地

上海市委的正确决定，打乱了动乱制造者的阵脚，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止步，相反，蓄意扩大事端。一场扩大动乱与反对动乱的严重较量就此展开。斗争首先表现在对《导报》的整顿与反整顿上。

早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导报》决定的前一天，即4月25日，《导报》北京办事处就给钦本立等人写去一封信，以

恫吓的口吻警告“非法干预者”说：“如一意孤行，我们也将走上街头，争取人民和读者的支持”，声称“面临严峻考验，导报全体同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是新闻界第一份提出“走上街头”的自白书。

4月27日，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当时整顿领导小组的首要任务是组织报社职工尽快出版坚决维护国家安定的报纸，用事实打破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者制造的《导报》被查封的谎言。但是这种努力一开始就受到《导报》极少数人的百般抵制。一名被称为《导报》“智多星”的编委说：“我们不是要‘世界经济导报’这6个字，而是要象以往一样独立内容独立风格的《世界经济导报》，如果内容风格变了，《导报》就死亡了，《导报》同人只能冲一个鱼死网破”。“解决《导报》的唯一办法就是市委承认错误，老板（按：《导报》职工对钦本立的称呼）复职，撤出整顿小组”。因此，从副总编辑到编委均拒绝签发清样付印。在整顿领导小组主持下，439期B版终于在4月27日付印发行。以后，整顿领导小组尽管对440期一些内容有异议，但考虑到在当时出报是大局，还是签发了。但报纸出来一看，原来定的第一版的通栏大标题“纪念五四”却被篡改成“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地讲真话的环境”。这是《导报》极少数人在整顿领导小组签发后做的手脚。这个大标题，第二天就成为上海学生游行队伍中显眼的横幅和口号。以后在编发441、442期报纸过程中，《导报》极少数人又制造种种事端，越来越明显地企图对动乱进行舆论导向，整顿领导小组理所当然地拒绝签发，并一再努力耐心说服他们修改，但一再遭到拒绝。《导报》从442期起就无法出版了。

现在已经查明，《导报》极少数人这样干的背景来自北京。张伟国从鲍彤控制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得到指令说：“《导报》没有停掉，北京感觉不到压力。如果停办了，北京就会感到压力，就可能出来讲话了”。张伟国立即将此指令传到上海。这样，《导报》自442期起停出就不难理解了。“北京就可能出来讲话了”中的“北京”指的是谁？现在已真相大白：原来，访朝回京的赵紫阳同志得悉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决定后，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感到“震惊”，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有了这种“北京”的支持，《导报》极少数人自然有恃无恐地把事态扩大到整个社会动乱中去。

在上海市委关于整顿《导报》的决定作出后，为了把事态扩大，钦本立立即打电话给张伟国，要他了解参加座谈会的人对《导报》被整顿的看法。张伟国马上与严家其、戴晴等人联系。4月27日，严家其在电话中声称“上海市委的决定是错误的，对此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导报》应按原来的宗旨风格（按：实际上是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照样出版，而且应在报上鲜明地揭露江泽民的错误决定”。严家其立即起草了一封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捍卫新闻自由”。一开始，在信上签名者仅严家其等两人。后来，经过张伟国和戴晴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鼓动，才又有30多人签名，其中就有包遵信、苏绍智、于浩成、张显扬、苏晓康等人。这就是第一份声援《导报》的函电，也是《导报》极少数人自编自导的一出闹剧。

已被停职的钦本立根本没有“停职”，他不时在家中或借宾馆召开编委会，讨论如何扩大事态。他们于5月初炮制出

一份《对中共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决定”的陈述（事实真相，我们的态度和要求）》。这份通篇歪曲事实的《陈述》经钦本立审阅同意后，大量印发，并派专人送数百份到北京，向社会各界散发，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声援《导报》的浪潮。

《导报》极少数人从4月29日开始在编辑部办公室沿墙披上黑纱，在黑纱上张贴国内外各方面“声援”的函电。这实际上是一种示威，也是一种展览，以图动员社会各界前来参观和声援。钦本立亲自打电话动员海外报刊记者前往参观。他说：“你会感到新闻界开始觉醒了，独立了，团结了。”一时，到《导报》编辑部参观的人川流不息，欺骗了不少不明真相和受其影响的人，起到了鼓动动乱的社会作用。

《导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更是活跃。他在北京新闻界和大学生中，在各种知识界集会上发表演说，介绍所谓《导报》事件真相，提醒新闻界“要对自己的主体意识彻底觉醒”。什么觉醒？张伟国接受香港《镜报》月刊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作了最好的注解：“《导报》事件使得中国新闻界觉醒，这就是胜利。要推倒重来，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必定掀开历史的新一页”。5月4日，首都新闻界少数人打出了“新闻自由”、“声援《导报》”的旗帜走上街头。

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导报》极少数人变本加厉，积极参加和支持动乱。5月13日，钦本立等人在锦江饭店开会，研究形势与策略。他们认为形势“十分有利”，是大“转换”的时刻到来了。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面临的形势，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其深刻程度，后果如何很难估计，可能有我们尚未认识到的巨大意义”。于是他们干脆拒绝出

报，而是集中全力，南北呼应，制造扩大上海的动乱。

5月11日，《导报》极少数人纠集一些人，起草了《上海知识界呼吁书》，提出了五项要求，撤销对《导报》的处理，撤出派驻《导报》的整顿领导小组，恢复钦本立同志的职务，恢复发行被禁的4月24日《导报》有关版面，确保新闻自由，肯定和保护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呼吁书》的内容很快见之于海外报纸。

5月16日、18日，《导报》极少数人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外记者招待会，并且特邀了美国等外国领事馆官员，以及近20所大学的学生非法组织成员参加，蓄意把《导报》事件扩大到国内外。他们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把《导报》发生的事，仅仅看成是一个人、一张报纸的事。我们希望和同学们一起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

《导报》极少数人一贯自我标榜“敢讲真话”，且看他们在动乱中为了把水搅混，又是如何“敢”造谣言的。5月18日，有人打电话问《导报》：“听说北京绝食学生死了三个，是否属实？”《导报》人员回答：“我们北京办事处核实过，是死了三个”。这个经过《导报》“证实”的谣言很快传出，更加激化了学生和市民的情绪，一时游行队伍中抬花圈、举挽联、带黑纱……闹得乌烟瘴气。

为了扩大动乱，《导报》极少数人还频繁出没于大学校园，串联，演讲，与非法组织上海“高自联”等建立起经常联系。为此，复旦大学非法学生组织头头还写信感谢“《导报》老师的宝贵指导”。《导报》极少数人购买大量面包、饮料慰问游行学生，给学生们打气。他们在群众游行队伍中发表演说，煽风点火。《导报》的4部电话（包括国际直拨电话）

日夜24小时值班，接受北京和国内外信息，传递给上海一些大学和有关部门，又把上海信息传递出海内外。无怪乎当时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最新消息听《导报》，理论指导找《导报》。”

彻底失败前的顽抗

但是，《导报》极少数人和所有其他搞动乱的人一样，都错误估计了形势，低估了党和人民的力量。5月19日，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义正辞严而又鼓舞人心的讲话。5月20日，国务院发出了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钦本立等人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来临而又不甘心失败，还要进行最后的猖狂一跳。

在戒严令下达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抛出了关于当前形势的《六点意见》，公开暴露了党中央高层内部对学潮、动乱的意见分歧，并且用“人民日报号外”名义向社会散发，《导报》极少数人立即呼应，也编出“号外”，内容除《六点意见》外，还有曹思源的文章《让非暴力主义深入人心》，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只是由于印刷厂上级领导及时发现，采取措施，这份“号外”才未能出笼。

5月21日，《导报》的极少数人在报社外面的“导报阅报栏”里，以“5·20天安门广场”为标题，贴出了30幅照片，宣扬动乱分子阻拦解放军进城、反对戒严，以及占据天安门广场，高举“打倒李鹏”反动标语等情况，一时观者如潮，道路为之堵塞。这一反动的舆论宣传，实际上为后来上海发

生设置交通路障等严重动乱，进行了思想发动。

北京曹思源、胡绩伟等人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妄图“罢免李鹏”。《导报》极少数人得悉后，立即闻风而动。5月21日下午，钦本立等人躲在一家宾馆密谋起草了“上海市中共党员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信中公开要求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对国务院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要求“收回”李鹏同志的“5·19”讲话，对党中央施加压力。他们四出拉党员签名，在遭到广大党员的抵制后，只得拉非党员充数，然后匆匆电传北京，捅到海外，制造“上海共产党员也行动起来”的假象。

5月22日，《导报》极少数人又积极串联，组织所谓上海知识界声援北京，反对戒严的大游行，根据来自北京的“信息”，《导报》某些人书写了“打倒李杨反党集团”、“彻底粉碎李鹏反党反人民的政变阴谋”等反动横幅。他们在游行中，又公然打出“罢免李鹏”等横幅，高呼“打倒李鹏”等反动口号。钦本立以“白发苍苍、步履细慢”之态，参加了游行，成为这次游行最引人注目的镜头之一。

《导报》极少数人还不惜与反动分子为伍，公然与臭名昭著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目经常电话往来，保持密切联系。

钦本立等人还乞求于用海外反动舆论工具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导报》极少数人频繁接受海外新闻记者的采访，港台和西方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发表有关《导报》的文章，为《导报》极少数人张目。据不完全统计，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有300多篇，仅香港某报从4月25日到6月17日有关《导报》

的新闻就达40篇以上。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导报》极少数人仍负隅顽抗。6月4日以后，港台及西方一些新闻机构造出什么“血洗天安门”、“黑色6月4日”之类的谣言。《导报》极少数人竟将这些反动材料复印、散发、张贴，他们还要《导报》工作人员佩黑纱，两次企图组织游行，均遭到《导报》群众抵制。一直到6月9日，《导报》仍约有20人参加上海“高自联”等非法组织在人民广场搞的“追悼会”，并拟在广场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上海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决制止动乱，这个记者招待会遂成为泡影。

留下深刻的教训

《导报》在这次动乱中的恶劣表演是偶然的吗？否。

《导报》于1980年6月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创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管。《导报》创刊以来，在宣传改革开放方面，曾发表过一些比较好的文章。但是，与此同时，在总编辑钦本立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导报》也发表过许多错误文章，受到过中央与上海市委的多次批评。上海市委有关部门曾于1985年和1987年两次派员进行整顿。钦本立也曾多次检讨。但是，赵紫阳同志对《导报》总是予以支持和庇护。例如，1987年整顿《导报》的关键时刻，他的秘书到《导报》慰问，使整顿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因而，《导报》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上海市委曾派一些同志加强《导报》领导力量，也先后被钦本立有恃无恐地排挤出去。特别近两年来，《导报》迎合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越来越多地发表违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迅

速滑了下去。

《导报》事件的性质是严重的。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有待于认真地全面地总结和反思。它告诉我们，与《导报》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的斗争，决不是要不要新闻改革之争，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斗争，是动乱与反动乱的政治斗争。它还告诉人们，在我们国家，任何舆论工具如果摆脱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必然会滑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中去。新闻改革，如果离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前提，必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大泛滥。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原载《光明日报》1989年8月19日）

《世界经济导报》风波真相

(摘要)

韩禹水

在刚刚过去的这场政治动乱中，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一场“风波”，引人注目。

首先请看下面的事实：

4月24日，原定出版的439期《导报》发生改版“风波”；同日，香港《南华早报》登载上海市委宣传部没收《导报》消息：

4月25日下午，《导报》办公室收到该报北京办事处电传函件，指责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无端扣发、查封《导报》第439期，并表示“将走上街头，争取人民和读者的支持”：

同日，香港《明报》和“美国之音”等传播媒介相继播发有关消息：

4月26日，上海市委决定，停止钦本立同志《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并向该报社派驻整顿领导小组：

4月27日，上海《解放日报》披露《导报》439期至今未出，责任完全在该报负责人的事实：

5月1日，《导报》以编委会名义发出《对中共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决定”的陈述》。这份陈述说：“市委在

有关这一‘决定’的说明中所举的错误均与事实不符”，“钦本立同志并没有市委‘决定’中指出的‘严重违反纪律’的错误”；

5月2日，上海近万名大学生上街游行，打出“还我导报，本立复职”的横幅；

5月4日，北京两万名高校学生在游行中表示声援；

尔后，《导报》在报社门口布置了宣传橱窗，张贴北京信息和海外报纸、通讯社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消息，每天吸引了大批围观群众；

直至5月23日，《工人日报》还刊登了以“世界经济导报同仁”名义撰写的“《世界经济导报》的风波”一文，这家报纸在“编后”指出：“新闻自由和新闻机构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是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

等等，等等。

显然，《导报》的这一“风波”与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的政治动乱，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今天，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认识这场动乱的实质的时候，弄清《导报》风波发生、发展的真相显然非常必要。它将有助于善良的人们通过对这一事件的了解，更好地反思我们的新闻改革和舆论导向。

为此，在7月上旬，记者专门走访了上海有关部门，就读者关心的有关问题作了了解。

上海市委宣传部从香港4月17日《华侨日报》阅知，《导报》将要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同志。为了了解社会思想动态及有关内容，4月2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了解有关情况。钦本立同志说，

《导报》确实将在新的一期中用几版篇幅刊载该报与《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悼念耀邦同志的座谈会的内容。曾庆红和陈至立同志请他将这期《导报》的清样尽快送阅，钦本立同志当场答应第二天一早送到。但直到第二天中午清样还未送达。下午，市委宣传部打电话到《导报》催问，当时找不到钦本立。到十六时左右在《解放日报》社（《导报》在《解放日报》付印）找到钦本立，他说，清样刚刚送去。十六点半，曾庆红、陈至立同志收到清样，阅后，请办公室打电话约请钦本立同志谈话。

晚上八点半，曾庆红等同志与钦本立同志讨论439期《导报》清样问题。他们耐心地向钦指出：上海各报都宣传了胡耀邦同志的优秀品质，表达了对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激发起人民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热情，这本是报纸应尽的责任。《导报》这篇长达二万多字的报道中，有一些段落是比较敏感的，拿到报上公开发表不合适。现在学生上街、集会，其中有极个别人喊出了出格的甚至是反动的口号。高校的教师、干部日日夜夜在做工作，花了许多精力，尽量使学生保持稳定，使悼念耀邦同志的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在这种时候要考虑舆论宣传的社会效果。因此，为了爱护《导报》并使它能够更健康地办下去，建议对严家其等人发言中直接把矛头指向小平同志、为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平反”和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的部分内容作删节（约删500字左右）。可钦本立同志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曾庆红、陈至立同志说，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此外，人家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

有关敏感问题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同意就发表也是极不慎重的（据了解，有几位发言者听说此事后，也明确表示他们没有同意过公开发表他们的发言）。钦还是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节。在这种情况下，曾庆红向江泽民同志汇报此事。

江泽民同志将此事告诉了汪道涵同志（汪是《导报》的名誉理事长），然后一起赶到办公室。江泽民同志严肃批评了钦本立同志。道涵同志在看了清样以后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把那些敏感的内容发表出去不合适，我们要对党负责。有的问题可以通过内部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这篇座谈会发言报道中还谈到耀邦同志近一二年的一些谈话，现未经组织和耀邦同志家属核实同意就发表也是不慎重的。汪道涵同志还对钦本立说，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要有党性原则，删掉若干段落并不影响整个版面，而且22日上午耀邦同志的追悼会消息和赵紫阳同志所致的悼词都不登，也是不符事实上的政治和新闻要求的。这时，钦本立同志才同意了删节后印发。但当钦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时，令人惊异的是十几万份报纸已印好了，《导报》对外号称发行三十万份，实际上只有十几万份订户，这就是说，这里在讨论清样是否要删节的过程中，那边报纸已经开印。钦本立同志又打电话对发报纸的同志说，已经印好的报纸不发。然后说定，钦回去负责删节，早晨再由汪道涵和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看一下。

但23日清晨，汪道涵同志发现未经删节的报纸已送到他家，他立即打电话给《导报》副社长蔡北华同志。蔡北华说，他在22日晚上八时已经收到了报纸。汪道涵同志马上打电话批评钦本立同志言而无信。

据后来了解，钦本立早就决定439期报纸要提前印刷发行，以便赶在耀邦同志追悼会前送去北京发行。4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导报》电告《解放日报》有关车间，本期报纸要提前印刷，22日下午6时左右报纸开始印刷，随后，部分报纸当即送有关方面和个人，还有400份左右已批发给个体报贩。此外，还有相当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

与此同时，23日早晨，海外一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的消息。现在了解到，这是《导报》北京办事处约见和电告一些海外报纸驻京记者的，希冀海外舆论压力。当天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尽早编排付印，钦本立同志当时提出了改排方案，并向市委表示要尽快出报。

24日上午，《导报》电告《解放日报》排字车间要求协助。10时多开始发稿，至下午5时左右工人打出6份新大样，由《导报》同志取走，讲好第二天来改样，但直到第二天傍晚还不见送回大样。其间，市委宣传部多次打电话到《导报》和钦本立同志家里催问，均被推托。傍晚，印刷厂厂长主动打电话到《导报》编辑部，也没有人接。再打电话到钦本立家，回答说钦不在家。事后才知，当时钦本立已转移到上海西郊的樱花渡假村“看病”去了。

25日晚上，《导报》给市委送来一份《紧急报告》，以“不激化矛盾，不扩大事态”为理由，坚持要发行未经修改印好的那份报纸。最后以“专此奉告”结束。这就意味着，并不需要市委意见，他们要把原439期发行出去了。

至此，26日凌晨1时，市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上午10时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了《导报》问题，重申439期原版不能

发行。鉴于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的情况，作出停止他的总编辑、党组成员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由于《导报》的有关同志仍不肯在改排的大样上签字付印，最后由《导报》副社长蔡北华同志（原来不负责报社具体业务）签发了大样。

4月27日，《解放日报》印刷厂收到签发清样，组织抢印。28日改排后的439期《导报》陆续送到读者手中。

综观439期《导报》改版拖期的这场风波，责任完全在《导报》负责人。

由此，人们不能不问几个问题：

（1）一般追悼会新闻界通例是报道一个新闻而已，为什么《导报》却反常地要发2万多字的座谈发言全稿，并且事先向海外预告？

（2）为什么它要提前印刷，赶在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发行出去？

（3）一面“送审”，一面开印，钦本立是老总编，难道不知道这是违反起码的编辑常识吗？

（4）上海市委总共只要求删节500字左右，为什么就是不改这500字，不正说明这500字是《导报》召开这个追悼耀邦座谈会的要害吗？还是用钦本立同志自己的话来注释吧：我就是邓小平同志公开检讨。小平同志检讨了，我拥护。

在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的今天来看，《导报》风波的真相，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吗？！

（原载《中国教育报》 1989年7月20日）

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

——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

任玉清

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这场动乱，是借胡耀邦同志逝世提前爆发的。

中央关于召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的公告是4月19日晚才公布的。然而在16日，受控于鲍形的国家体改所成员《经济学周报》编辑高瑜便找到北大学生王丹，明确地告诉他：“这次咱们要掀起十里长街……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成了华老栓了，成了阿Q了。”“星期六（22日）我们希望学生都到人民大会堂外。”18日，李淑娴又向王丹授意：“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在22日之前，无论是18日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还是20日凌晨冲击新华门，都是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为这一天所作的准备。

（一）

许多大学生是怀着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来参加一些活动的，但是，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掀起一场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

4月15日下午，耀邦同志去世才几个小时，清华大学就贴出了“李鹏辞职”的标语。晚上，北京大学出现了大字报：“我们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16日，中国人民大学的标语提出：“悼胡公骂李公不如倒了邓公；说千条道万条不如砍掉四条。”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字报更加明确地说：“现在的任务是要保护活着的改革派，保护赵紫阳。”至22日前，首都高校的大字报已有了上千份。

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也在天安门广场上散播着。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登出一位港人的目击日记说，4月18日晚，他在天安门广场听大学生们演讲，一学生说：“中国只有一党专制，就是官僚。打倒共产党一党专制！”众人大笑，有喊“不现实”的，有鼓掌的，还有起哄的。

一些文化“精英”们也积极地做着舆论准备。15日，《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以及苏绍智等人联系，准备召开座谈会。在19日的座谈会上，严家其、戴晴等人提出要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暗示要“倒邓保赵”。《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决定将刊有这个座谈会内容的报纸提前印刷，赶在22日之前发往北京，以“影响学运”。

21日这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给中央、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不失时机地出现在各重点大学的校园，其内容与王丹等18日所呈请愿书如出一辙。在请愿书的旁边，已贴上了所谓“澄清4·20血案真相”的大小字报及“到天安门去参加追悼会”的通知。

一股狂躁的情绪就这样在大学生中点燃起来了。21日下午，北大、清华甚至传出了“耀邦是被最高统帅警卫打死的”

谣言，有的学生竟商议要“截灵车”。晚上，北师大则一片混乱，外校学生撞开了校门，上万人出出进进要开什么“誓师会”。吾尔开希拿着电喇叭在操场上煽动大家“讨还4·20血债。”还有人用自行车驮着一大袋白灰进到人群中分发，被一些高年级学生制止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借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大闹一场的风波似弦上之箭，一触即发。海外的一些新闻媒介也已按捺不住发出了信息。21日这天，台湾《中央日报》印出了大标题：“大陆势将爆发更大动乱”；香港《东方日报》刊出醒目标题：“明天悼胡纪念会，学生可能冲会场。”美国《华盛顿邮报》则干脆引用北京某大学生的话：“悼念胡耀邦只是示威者的借口。”

(二)

22日凌晨，数万大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便席地而坐或倒头大睡，还有的在纪念碑附近的草坪上嬉戏谈笑着。大多数学校推出的学生代表也都不清楚天亮之后干什么好。

午夜2点多钟，在临时召开的20多所高校代表会议上，郭海峰提出，首先要搞和平请愿。在追悼会前，要求政治局常委甚至邓小平接见，进行谈判。如果不行，就冲入大会堂。各校学生代表一听，马上都表示不同意。在人家办丧事时去闯灵堂闹事，太不得人心；再说，学生们谁也没有思想准备搞什么“谈判”，大家是来开追悼会的。经过这样一番争议，大约6时左右，代表们才决定向治丧办提出3条要求：绝对保证学生安全，瞻仰胡耀邦遗容，灵车绕广场一周。

7时15分，治丧办的同志转告熊焱、熊伟等5名学生代表：只要学生队伍不乱，将保证学生安全；临时安排那么多

人进大会堂瞻仰遗容不可能；灵车能否从广场过正在商议中。对此，熊伟等人表示理解。但他们很快又提出3条新要求：澄清“新华门血案”，增加教育经费，新闻要说真话。治丧办的同志又很快答复他们：第一条现在无法答复详细情节；第二条与今天治丧活动无关，第三条已向有关部门反映。几名学生代表听后便不再提什么。

但是，自称“有后台”的吾尔开希等人却打定主意要大闹一场。吾尔开希进广场后对记者说：“我们是来斗争的，有权选择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如在开追悼会的时候高喊口号。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有可能这么做。其次，我们也许会使政府官员难堪。”吾尔开希一再说：“我们现在不动，但不是永远不动”。“如果条件不被落实，我们回去就要行动。”

实际上，一些人一进广场就行动起来了。他们有意识地在大会堂前的马路上鼓噪着。凌晨3时30分，当一队执勤的警卫来到这里时，这些人立即上前围挤、推搡、谩骂。“打倒暴政”、“当兵的滚蛋”等口号也响了起来。为了不发生冲突，这队警卫战士撤了回去。4时30分，身着警服的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大会堂东侧路，准备疏导交通时，马上又被围攻踢打。

天亮前，大学生的队伍已拥到大会堂前的马路上，广场上聚满了人，根本无法清场。8时整，执行警戒任务的警卫人员只能准备在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边站岗警戒。一些学生即刻站起来，有组织地一排排地向尚未列出警戒线的警卫们冲击。在现场的香港《百姓》月刊记者写道：“社科院新闻系打着‘新闻要说真话’的标语往前涌进。传闻风起，背景

是嗷嗷的叫声，人们的精神快要疯了。”

为了避免冲突，警卫战士们克制地站在了大会堂东门外，学生们的队伍离他们只有数米远。极少数人期望的、眼看就要发生的流血事件被控制住了。

追悼会期间，广场播放现场实况。放哀乐瞻仰遗容后，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和群众便向北跑去，准备看灵车。已经出来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学生们大都觉得该结束了，部分学生已经准备要走了。

(三)

广场上的大学生们并不知道，极少数人在搅乱追悼会不成后，还有着第二手计划。在21日这天，王丹、郭海峰、封从德、熊焱等“北大团结学生筹委会”的核心成员秘密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封从德把18日已递交过的请愿书重抄一遍，“利用这个许多学生都在场的机会，在追悼会后进行请愿。”

这个一直只有几个人知道的阴谋是在李鹏总理等领导同志的车队已离开大会堂的西门后才突然公开的。大约10时50分，广场西部猛然响起了“对话！对话！”的叫声，继而又喊起了：“李鹏出来”、“李鹏对话”等口号。吾尔开希、郭海峰等人则站到了离大会堂最近的学生队伍前面。

随着喊声越来越大，封从德从北大队伍里将一大卷纸传给郭海峰，示意他：“交给李鹏。”11点20分左右，郭海峰双手举起请愿书，向人群示意着，吾尔开希拿着电喇叭在他身边喊叫着，与另外两名大学生一起向人大大会堂走去。

在大会堂台阶下，郭海峰对闻讯赶来的治丧办的同志说：“我们要交请愿书。”吾尔开希接着说：“我们要交给李鹏，

非面交不可。”治丧办的同志提出让他们派代表进入大会堂，吾尔开希拒不同意，他坚持道：“李鹏出来是第一要求，除此之外，放弃一切要求。”并下了通牒：“12点45分是最后期限。”

12点整，一位负责同志匆匆从大会堂出来，问治丧办的同志：“能不能让学生让开通道，灵车绕广场一周？”治丧办的同志又反复劝说吾尔开希等4人：“你们既然是来开追悼会的，就应先送耀邦英灵。”但他们就是一句话：“让李鹏出来。”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和周围的道路上已挤满了人，学生队伍还在不断往大会堂涌。赵紫阳同志曾登上大会堂顶，用望远镜看了看这一情景，但没做任何指示，便驱车离去，准备打高尔夫球去了。

与吾尔开希、郭海峰等人接触的治丧办和人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谁也没说过李鹏同志要来广场，但吾尔开希却用喇叭向广场的学生们宣布：“（人民大会堂）里边传出话来，李鹏12点出来与我们见面对话，请大家耐心等待。”这个弥天大谎迅速传遍广场，有些感到意外的大学生们议论起来：“李鹏来了我们鼓不鼓掌？”有的挺纳闷：“为什么要李鹏出来？除了增加教育经费外，请愿的内容都不归国务院管呀。”有的还不明白：“请愿书不是已经递给人大常委会了吗？办丧事时提条件搞请愿，合适吗？”

12时45分，吾尔开希一下子冲上大会堂台阶，举着电喇叭高声叫道：“我抗议！”郭海峰等三人也走上台阶，忽然跪了下来。郭海峰高高举着请愿书，放声大哭，边哭边喊：“李鹏，你为什么不出来！”吾尔开希则鼓动道：“李鹏欺

骗了我们！”

尽管有些头脑清醒的大学生、研究生已感到事先无任何招呼，即要求李鹏在不可能出来的时候，不可能交谈对话的地点，接受本不属于他职责范畴，并已经递交过的请愿书是很荒谬的，更不赞成其下跪的方式，但是，他们已无法表达自己的疑问了。整个广场哭声一片，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向大会堂冲过来。一个女学生喊着：“打死我吧。”拼命向警察撞去。

郭海峰等人跪了十几分钟后方坐了下来，学生的对立情绪已达到顶点。回到广场的吾尔开希即和一些学校的代表开了个小会，不到2点，学生队伍开始撤离广场，向新华门方向游行，并喊出了统一的口号：“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四)

22日这天，令人奇怪的事还发生了一些。下午，参加追悼会的大学生刚刚回校，北师大的传单就撒到了他们手中。传单写道：“12：30，师大的代表告诉同学，李鹏将于12：45接见学生。下午2：00，李鹏还未出来。学生们愤怒地向前涌去，武警冲上去用皮带等殴打学生……”

这天上午11时，严家其、苏晓康等人“要求政府对话”、“绝不许对学生施暴”的请愿书贴在了北师大等高校的墙上。

方励之在当天对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他得意地说道：“中共若不与学生坦诚对话，那么形势发展就不乐观。”王丹也高兴地告诉外国记者：“相信行动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天，由台湾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胡平、

陈军、刘晓波等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求“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

《新观察》杂志则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先是造谣北京市公安局“戒严”，然后称赞学生强占天安门广场。使“追悼会的主会场在大会堂外。中午，3名大学生‘扑通’跪倒在大会堂台阶上，要求向国家领导人面交请愿书。国家领导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接见十数万大学生代表。”并煽动道：“他们往地下一跪，就把官僚主义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这样一个政治气氛下，北京6万大学生罢课了。一些人开始南下北上，东来西走，串联募捐。外地许多大学生也相继效仿。

同一天，西安和长沙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

王丹早在4月16日就说，大字报的“锋芒所指开始转向”，“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与‘五四’相联”。“不少人寄希望于我引导方向。”从4月16日至4月22日这一个星期，他和他的同伙以及背后的极少数人紧锣密鼓，到4月22日这一天又精心策划了这样一个大骗局，目的就在于把更多不明真相的大学生进一步“引导”向动乱的泥潭。

（原载《北京日报》1989年9月6日）

这算什么“民主”

——从北大八位呼吁复课的 教师遭遇谈起

北京大学 施义武

事情发生在今年5月底和6月初。鉴于从4月中旬以来，学校学生因罢课、游行和绝食等活动，严重影响了学业，教学基本不能正常进行，校园秩序亦无法维持，5月29日，北京大学8位教授、副教授，联名写信给校领导，发出“同学们，快复课吧！”的呼吁。信中指出：“一个多月的事实，清楚地表明，采用罢课、游行和绝食等手段，能充分表现群情激愤和希望的殷切，不能切切实实地解决问题，并且容易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旷日持久，于事无补。”信中诚恳地劝告尚未复课的同学，“对待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在当前异常复杂的形势下，尤其需要高度的冷静和理智。”“不要把爱国与为祖国而刻苦学习对立起来，请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

8位教师的呼吁5月31日电视播出并公诸报端以后，得到了许多教员和同学的支持，认为表达了广大师生员工共同的心声。但与此同时，也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很快在北大三角地贴出一些反对、嘲骂的大字报、大标语、小字报。一时间，8位教授、副教授成了北大街谈巷议的中心人物，围绕着“呼吁书”的评价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应该说，8位教授、副教授的心是真诚的、善意的，他们不希望学潮和动乱给广大学生本人造成巨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8位教授、副教授的口气也是亲切的、平和的，他们没有一丝教训人的态度，而是企盼学生目光长远，一面复课，一面谋求问题的妥善解决。任何一位多少有些良知的人都会赞同他们的意见。

可是，这8位教授、副教授却遭到一小撮人无端的污辱和攻击。大标语把他们称作“八大师贼”“××帮凶”。大字报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并发起什么“签名”，号召“永远罢上他们的课”。有的人还在大字报上写着：“请知情人写下他们的住址，我们将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愤怒。”其中有位副教授，曾多次劝告同学们不要参加非法游行，某大字报竟公开造谣，说这位教师就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现在又跳出来与一小撮人说三道四，分明是投机行为，大字报还蛮横地建议校方不再聘任这位教师的教学工作，并取消他的副教授资格。有张大字报还恶作剧式地写出：通知8位“师贼”到××楼××号（厕所）去领××伪政府的××元奖金。

这样，他们还觉得不够味儿，于6月1日下午又贴出一张题为《北大“模范教师”素描》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没有反驳呼吁书中的任何论点，没有提出任何一点建设性的意见，而是通篇以粗野和下流的语言，对8位教师逐个进行诬陷和人身攻击。例如有位教师会吸烟，这竟然成了一条罪状，被斥为“烟棍”、“幽灵”；有位教师身患严重肾病，但坚持工作，大字报竟说“你肾功能丧失，靠体外循环，每周换血”，“我们国家更需要换血”，你最好去加入残疾人协会，

根本不应当站出来呼吁复课；大字报污蔑这个人“在家只会和老婆打离婚”，污蔑那个人“眼泡老是鼓鼓的”，污蔑这个人“几年内一篇文章没写过”，污蔑那个人“只配进入迷糊协会”，甚至连“婊子”“三条腿”“神经病患者”这样不堪入目的字样也出现了。

有位离了休的老教师，见到这张大字报，站在那里，气得浑身发抖。有位女同学，看到教师们 在社会主义大学、堂堂的最高学府受到这般侮辱，不禁痛哭失声，法律系一位女教师将她劝回宿舍。有位过路的教师，见到“师贼”的提法，稍稍表示异议，当即遭到一些人的围攻，被轰走；有位教师，当着同学的面指出，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就这样恐吓、谩骂，“太不民主”“太不道德”，结果一伙人围上来跟他争吵。这位老师据理和他们辩论，这时，有的人胡搅蛮缠，有的人推推搡搡，有的人摆出要打人的架势，有的人提出要“盘查此人的证件”，这位老师坦然地从兜里掏出《北京大学工作证》，有人自觉理屈词穷，便气急败坏地指着这位教员鼻子骂道：那你就是出来的“第九个师贼”。这位老师足足被围攻了20多分钟。

更令人奇怪的是，北大这些攻击教员的大字报，6月2日就以“本报记者北京专电”的形式出现在香港《明报》第八版头条位置上。“专电”以“北大部分师生内哄”为大标题，用十分肯定的语气，把大字报中的谣言说成是事实，并且一一开列8位教师的姓名（其中最知名的冯教授的名字还被故意拉掉一个字），斥责他们是一小撮“投机分子”，声称这些人“严重损害了北大和北大教师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形象”，令北大蒙受“莫大的耻辱”。“专电”还假借转述大字报的

方式，反复地向同学们发出号召，要求同学“永远抵制”8位教师所开的课程。

人们读过这些大标语、大字报，尤其是6月1日所谓的《素描》、6月2日《明报》的“专电”，了解了所谓“第九个师贼”遭围攻的情景，不难看到，学潮和动乱中一小撮人搞的是什么样的“民主”。不难看出，到底是谁维护了学校的尊严，谁在希望动乱，给学校带来了耻辱。

有些人口口声声喊“爱国”、“民主”、“自由”、“人权”，仿佛这些是他们的专利，可是一到实际中就变了样，足见他们的口号是多么虚伪！难道无限期罢课，上街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能算作“爱国”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校园内不许说半点不同意见，能说是“民主”吗？难道随意对教师进行造谣中伤，人身攻击，甚至想大打出手，就是所谓的“自由”和尊重“人权”吗？这些人言行本身就揭穿了他们的谎话。

鲁迅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有些大学生（还有个别教师），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使用如此龌龊的语言，干出如此下作的勾当，既专横跋扈，又灵魂肮脏，难道不是给社会主义的大学丢脸，又丧失了国格、人格吗？我们的国家将来若是这样素质的人掌了权，那还有什么民主、法制、道德和文明可言呢？

北京大学8位呼吁复课教师的遭遇，反映了许多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每个有良知的学生和教师，都会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7月6日）

且看胡委员怎样自圆其说

孙 理

报纸登载，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一些委员在发言中，对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同志在动乱过程中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征集签名，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一事，提出了严肃批评，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可是，我们读了见诸报端的胡绩伟同志7月3日向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送交的“关于签名问题的说明”，却感到很失望。这个“说明”，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行为作辩解。

然而，辩解中却露出了破绽。从“说明”的内容看，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强烈印象：这份“说明”多有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当真是“不加这番‘说明’，事情倒还明白一些，越‘说明’反而越不明白了。谓予不信，且看下列几例。

在“说明”中，胡委员叫苦说：“当时我没有出门，也看不到任何情况，对当时街上贴的传单和天安门的广播都不知道……”胡委员那段时间较少出门可能是事实，但说对什么情况他“都不知道”，怕就不是实情了。因为就在同一个“说明”里，胡委员又说：“20日宣布戒严，形势更为严峻，我见学生在天安门坚持不退，戒严部队入城以后，很可能发生不幸事件，因而，我焦急万分，忧心如焚。”既云一切“都不知道”，“忧心如焚”也者，所为何来，从何谈起？此为

例一。

例二：在说明为什么委托四通研究所而不委托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来办理征集签名时，胡委员的理由是，他对该研究所的“印象是比较好的”，因而认为委托它“比较理想”。这里，笔者记起了早些时候，他在香港《文汇报》发表的“郑重声明”说过的一句话：“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是我国一个富有研究成果的机构”。这就无怪胡委员对它如此信任、加倍青睐了。

但是紧跟着却来了一个麻烦：有谁曾经在哪里见到这家正式开张不过半年的只有5个人的研究所有过哪一点点象样的“研究成果”来着（更不要说“富有”）？胡委员硬要这般起劲为它捧场叫好，为何不拿出一两条根据来呢？以胡委员的理论素养而论，应该是不至于闹到好歹、多寡莫辨的地步的。胡委员这般花力气在国人、世人面前为这家研究所抹涂脂粉，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例三：在说明委托四通研究所征集签名的缘由时，胡委员还说：“再说当时交通受阻，我们办公室实在无法进行签名的征集工作。”这也叫人纳闷：既然他的办公室外出交通受阻，四通研究所为什么竟能不受阻？人大常委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的办事机构办事交通受阻，一个小小的民办研究所却为何有那样大的神通，能在当时那种非常情况下高速度办成那样大的事？这家研究所同当时使交通受阻的那伙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胡委员又是怎样知晓了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关系，并且有意加以利用的呢？

例四：6月26日，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办公会议讨论有关签名问题时，有的委员谈到，香港《文汇报》

在5月31日的“更正”中埋下钉子，说罢免李鹏的议程是根据部分常委意见，这是给委员栽赃。对此，胡委员反驳说：“也许确有部分委员要罢免李鹏呢。”大家知道，胡委员是一位有几十年新闻工作经验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新闻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不至于忘记延安整风时期对“客里空”的严肃批评，他怎么能把“也许”的猜测作为新闻的根据呢？新闻真实性如果能够容许所谓“合理想象”或者“任意添加”，那同“莫须有”的手法又有什么两样？胡绩伟委员在这里有什么隐秘难言之处，我们相信经过调查是一定会搞清楚的。

拆了东墙补西墙，西墙的窟窿还没有堵住，东墙上又露出了新的漏洞。国人期望着胡绩伟委员能够尊重事实，按照事情的本来面貌讲话。这是唯物主义者唯一正确的态度。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11日）

谁在公然煽动推翻合法政府？

——评严、包两先生的文章

梦 省

6月3日至4日，首都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这是一个多月来极少数人煽动制造的动乱不断恶性发展的结果。极少数人制造谣言，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撰写文章，为这场暴乱做了大量的反革命舆论准备。香港某报5月26日发表的一篇特稿，就是这个反革命舆论准备中的一篇纲领性的文章。

这篇特稿是由北京知识界两位所谓“精英”（一位姓严、一位姓包）写的。文章题目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此文公然煽动“推倒”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并且提出了推翻现行合法政府的策略与步骤。什么步骤呢？他们公然提出：第一步，“必须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决定”“废除戒严令”；第二步，“近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总理。他们狂妄叫嚣：总理最好“主动辞职”，这样可以“不予追究”，否则，他们将“以鲜血和生命”来实现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众所周知，他们要推翻的政府是在1988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这个政府1989年在全国人大七

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仅有2票反对4票弃权，事实证明：现在的政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信任。公开煽动推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为人民所高度信任的政府，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联想到动乱一开始，政府工作报告通过还不到半个月，就有人极力煽动把攻击矛头指向李鹏为首的现政府，这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特稿”一再诬蔑李鹏总理5月20日签署的戒严令是“极为严重的违宪行为”。他们编造说，宪法第29条规定，“军队只能在外敌入侵和国内出现严重武装骚乱的情况下才能动用”。这是他们编造的宪法条文。而宪法第29条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他们如此歪曲宪法，鼓动废除戒严令，就是为了继续扩大无法无天的动乱，进行反革命暴乱。

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援引宪法说，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因此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废除戒严令”。然而这两位先生却有意回避了宪法第89条第16款明确赋予国务院“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的权力。国务院5月20日的戒严令是完全符合宪法的。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命令人大常委会本身来违反宪法。这叫什么“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特稿”说，实行戒严“是不必要的”，因为“北京的社会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体如常”。事实上，发布戒严令之前，北京的社会秩序不是“一如往日”，而是极不正

常，严重混乱，确有极少数人想煽动暴乱，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难道不应该对此郑重考虑、采取果断措施吗？如果不发布戒严令，能够制止这一场严重的动乱吗？如果没有戒严令，能够震慑那些妄图从动乱中实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极少数人吗？首都的动乱发展到反革命暴乱，正是靠戒严部队平息的，这不正好说明实行戒严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时的吗？

“特稿”还一再污蔑政府“对三千余名绝食请愿的学生坚决不予理睬”，“丧失了起码人性”，是“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的。事实上，从学生绝食一开始，政府就一直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和他们对话，并且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保护和拯救了这些年轻可爱的学生。这样爱护学生的政府才是世界上少见的。而那些把绝食学生当作人质，企图推翻现行合法政府的策划者们，才真是“丧失了起码人性”的。

我们要正告严、包两位先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制造动乱，破坏我们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是违反宪法的，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

严、包两先生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在走得够远的了！你们与广大善良、爱国的学生是不同的：与一般声援过学生示威游行的知识界人士也有很大的不同。奉劝你们还是认真看看刑法为好，那里有一条是关于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可别走的更远。你们中有的参加过中央一级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工作的，你们的观点与所流传的“三所一会”（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

经济学会)提出的关于时局的“声明”相通,这不会是偶然的。关于你们现在所作所为的来龙去脉,最好由你们自己来说清楚。否则,善良、爱国的人们终究会弄明白的。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6月10日)

非法组织“高自联”

高岩文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是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高自联”有什么背景，它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它的头头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幕前幕后干了些什么。本文概略介绍如下：

一、成立前的预谋策划

“高自联”是在国内外政治敌对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胡耀邦同志去世不久，4月17日、18日，以“北大、人大、清华部分教师”名义写的《告同胞书》及署名南开大学的《告全国青年学生书》就明确提出：学生的行动必须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要成立学生自治会，全国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体，无组织的行动将会一事无成。国家体改委的一名干部对学生讲：“先要搞臭团委、学生会，这样政府就没帮手了”；“为了不使学生运动流产，当务之急是帮助学生把联合组织彻底建立起来。这是这次学生运动的根本性转折，是关系中国未来的根本性措施。”“如果各地高校都成立联合组织，一下子可以把全国学联替代了。”“在共产党体制下建立第一个自发的学生联合组织将对整个中国政局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全国各地在‘五·四’期间折腾起来，一下子就是百万大军。”4月19日，在北大民主沙龙上

有人传达了金观涛提出的三点建议：一、当前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二、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应该首先联合起来。三、必须成立组织，采取非暴力和平请愿行动。他认为学生这种无组织的力量应组织起来去动荡和摧毁中共这一组织的存在。4月22、23日，一名自称美国记者的人，找到北大、清华的学生头头说，他已经与美国国内联系了，美国是支持中国大学生行动的，建议你们立即成立组织；成立了组织将会使你们的政府更头痛，成立组织非常重要，美国可以支持你们。4月22日，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分子胡平、陈军、刘晓波等十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巩固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整体进行有效的活动”。

4月19日晚，王丹在主持第十六次民主沙龙会上，宣布成立“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王丹称这是从历次学生运动流产的教训得出的一个结论：没有一个有组织的，由各高校和各阶层民主人士组成的联合组织，是没有力量的。会上宣布筹委会常委由丁小平、王丹、杨涛、杨丹涛、熊焱、封从德、常劲等7人组成。4月20日，由丁小平召集各高校300余名学生开会，酝酿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4月21日，在北大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21、22日的游行及静坐请愿活动，并呼吁“五·四”前成立“全国团结学生会”。4月23日，在圆明园，29所院校的40多人开会，讨论并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即“北京高校临时学联”。选举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为第一任主席，常委有王丹、吾尔开希、马少芳等7人。4月26日上午，周勇军等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成立“临时学联”及其纲领。

4月28日，又定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即“高自联”。其后，因所谓的“斗争需要”经常挂出“对话代表团”、“绝食团”、“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等招牌，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欺骗群众。

二、政治纲领

“高自联”的政治纲领，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西方化的政治体制”（王丹语），即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口号和行动目标则是根据形势发展不断调整的。4月18日凌晨，王丹等人在纪念碑前首先提出九条要求。在此基础上，当天他们又用“首都高校部分师生”的名义将“九条”改写成“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请愿书（七条）：（1）重新评定胡耀邦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2）彻底否定“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平反两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3）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家属的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反对贪官污吏。（4）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言论自由。（5）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6）取消游行示威十条。（7）要求政府对他所承认的政策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适当改选部分领导人。4月20日晚，北大“团结学生筹委会”宣布的11条基本纲领，以及其它院校宣布的“纲领”、“宣言”，其核心就是：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

在4月下旬动乱形成之后，“高自联”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三条：一是彻底推翻“4.26”社论，承认他们是爱国民主

运动；二是必须承认“高自联”是合法组织；三是必须接受以否定反对自由化斗争为突破口的七条要求。

在5月20日实施戒严后，“高自联”公开提出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要“严惩和讨伐”“暴君”，公开鼓动颠覆政府，声称已经到了“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的时刻，要“背水一战”。5月27日，“高自联”和其它非法组织以“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名义提出《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以“解除戒严令，否定4.26社论，否认李鹏5.19讲话”为近期具体目标。

“高自联”的一些头头在国外发表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讲明了他们的最高政治纲领。

5月17日，王丹在美国《世界导报》上发表《中国，学生为民主战斗到底》，文中说：“我们无意放弃目前这场学生运动的目的，在于向政府施加压力，以推进民主进程。我们也不希望隐瞒我们的政治观点与政府不同，我们公开宣布：我们提倡充分的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最终要建立西方化的政治体制，清除陈旧的政治思想。我认为，目前学生运动至少有一个作用，在将来我们可以宣布，是的，我们是支持不同政见的人。”

5月26日，“高自联”常委马少芳在香港《明报》上撰文说：我们当前提出罢免李鹏是为了扫清障碍，这次运动的最大目标是粉碎专制，争取民主。这场运动的政治目标是重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高自联”头头熊焱等人交待：这次我们提打倒官倒、打倒腐败，是方励之让加上的，包括物价问题，也是他让加上的。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是在

中国实现多党制。

事实也很清楚，在这场动乱、反革命暴乱中，反腐败、反官倒不过是陪衬，是他们骗得群众同情的策略。“五·四”之后，这类口号就很少提了。有的人甚至说：“宁要腐败的改革派，不要廉洁的保守派。”“高自联”的政治纲领，从它一成立就是明确的，近期目标是“迫使李鹏倒台”，成立社会各阶层代表包括“高自联”参加的新的临时政府。其最高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三、“高自联”的头头都是些什么人

“高自联”的头头在这场动乱中扮演了主要策动者、领导者、组织者的角色。这伙人中有同国内外敌对势力有着密切来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的；有品学兼劣、求学无望，企图造反起家的；有头脑简单、思想偏激的“勇敢分子”。他们在反动舆论和动乱气氛推动下，愈走愈远，由感情偏激走向政治反动，由无政府主义走向违法犯罪。

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王丹，无心求学，一心从政。他在4月16日日记中写道：“现在气氛不错，大有去年6月2日之势，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与‘五·四’相联，再次酿成一场学生运动。”“我打算挟‘民主沙龙’之号召力，有所作为。”在方励之夫妇策划下，王丹一年内主办了17次“民主沙龙”，传播大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4月17日，王丹最早策动北大一千多人上街游行。4月18日，他第一个抛出带有政治纲领性的九条要求。4月19日，他在北大率先成立团结学生会筹委会，5天后成为北京市临时学联的头头。5

月12日，王丹发起绝食运动。5月20日，北京地区实行戒严后，王丹发誓政府不垮台，就静坐到底，一日不冲突，一日不撤回。

北师大教育系一年级学生吾尔开希，上大学后第一学期成绩三门不及格。去年以来，他非法倒卖商品赔了数千元。今年3月，吾尔开希自荐竞选系、校学生会主席，因品学兼劣，被取消竞选资格。4月21日，以“主席吾尔开希”名义发出通告：废除现行学生会、研究生会的一切权利，宣布全校罢课，停止一切考试。5月4日，在非法游行集会上宣读《五·四宣言》。5月16日，吾尔开希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讲：“政府是一个由坏蛋和腐败分子组成的帮。党和政府是一回事。要反对政府就必定要反对党。”反革命暴乱后，吾尔开希在海外特务组织的掩护下偷渡出境，在国外发表反华反共宣言，建立反动组织。

“高自联”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邱军，因强奸女学生未遂，受到留校察看处分。

“高自联”骨干、特别联络组组长，清华大学学生熊炜，因学业太差，三年累计8门功课不及格，被取消本科生资格。

“高自联”骨干郭海峰，北大国政系硕士研究生。4月18日，参加人民大会堂前的静坐。在4月22日追悼大会结束后，人民大会堂前谣传李总理接见，三人下跪递呈“请愿书”，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郭是三个下跪者之一。6月4日凌晨，郭海峰带领一伙歹徒，疯狂地将一辆装有汽油桶和燃烧瓶的公共汽车，从天安门广场东北侧向金水桥突然开来，妄图烧毁军车，进而焚烧天安门城楼，当场被抓获。

“高自联”骨干柴玲（女），北师大儿童心理所研究生。柴是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参加起草“绝食宣言”。她在5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讲：“坚决反对军管、戒严、坚决反对镇压，尽快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总理职务。”在反革命暴乱中任“保卫首都总指挥”。在广场上她对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说：“同学们不断问我，我们下一步干什么。”“我不能告诉他们，下一步是流血。唯有血洗天安门，整个中国人民才能被唤醒。”

熊焱，“高自联”骨干，北大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在1988年6月学潮中，因书写反革命大字报，诬蔑“社会腐败”，攻击“政府无能”，认为“现实的中国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被开除出党。

无业人员刘刚，原北大物理系84届研究生。是自1985年以来学潮的活跃分子和骨干，今年参加组织北大民主沙龙，在三角地演讲，进行煽动，攻击政府和司法机关，声称要营救已被我司法机关判刑的张××，李××。刘刚是“高自联”的顾问、幕后策划者，从“高自联”的成立，常委组成，重大变动，事事插手，参加历次常委会，协调“高自联”与知识界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的关系。

“高自联”的头头们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们利用国内外的巨额捐款，任意挥霍。在北京饭店、香格里拉饭店、王府饭店等高级饭店都有包间，外出乘坐高级轿车。他们发动学生绝食，自己却在大吃大喝，煽动学生及群众围堵军车，他们自己早已溜号。他们暗地里早已得到外国敌对势力的许诺，提供留学和庇护，提供资金，掩护出逃。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地干到底。国外一位学者评论北京动乱时说：“悲剧中的悲剧是学生们太相信他们的领袖了。”

四、背后黑手

“高自联”背后有一批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知识界的“精英”，他们是“高自联”的智囊，幕后策划者，他们同党内、政府内的某些高层人物有密切的联系。王丹主持的“北大民主沙龙”，抛出的第一个“九条”纲领，都是方励之的导演结果。严家其说：“耀邦同志应当成为我们的旗帜。”以此来欺骗、煽动群众。4月18日，王丹在人民大会堂前传达了李淑娴一要坚持、二要把请愿书递交人大常委会的两点指示，李淑娴则马上在北大三角地贴出一式两份大字报“希望广大同学声援”天安门静坐。方励之对王丹讲：“闹得越大处理越轻，越没事，历来学潮的经验就是如此。”

4月下旬，有人对王丹说：以后需要的话，可以用绝食这招，这招最绝，学生一个个倒下，救护车乱叫，市民都到街上来，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置之不理。人民大会堂前“跪请激变”的场面，也是所谓“十五人智囊团”的阴谋。5月5日晚，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会的人在北大湖心亭举行研讨会，会上提出两个方案之一就是绝食，对政府施加压力，起煽动性作用。张显扬说：我们对4.26社论要照批不误，对赵紫阳的讲话要拥护赞扬。李淑娴等人出主意：广场是全国学运的中心，是旗帜，是精神支柱。只要广场这面大旗不倒，就能支援全国的斗争。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天安门绝对不能撤”。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提出有条件地撤出广场，“保存力量，投入长期的斗争，这样对赵紫阳有利”。刘晓波则指点他们：“不要各自为政”，“北京的学生和外地的学生不要闹矛盾，千万不要忘记最下层的人，包括飞虎

队的那些人”，“缺钱同我说一声就行。”

“高自联”所以能呼风唤雨，具有那么大的能量，除了他们煽动并借助“群众运动”的盲目力量外，更重要的是上面有党和国家机关中搞政治阴谋的人暗中支持，提供国家核心机密，社会上一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为它出谋划策，国外的反共反华势力从政治上、舆论上、物质上给予强大的声援和资助，他们还串联利用一批社会渣滓、地痞流氓充当敢死队和突击队。

五、主要非法活动

“高自联”是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它不断制造事端，挑起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使动乱不断升级，最后发展成反革命暴乱。

4月18日下午7时50分，人大常委委员刘延东、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在大会堂东门外从郭海峰等二人手里接过了“七点要求”。3小时后，马上发生了2000多人冲击新华门的事件。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后，许多善良的人认为事态可以告一段落了。可在广场上，“高自联”又演出一场跪递请愿书的丑剧，造成“哭跪求见，政府不理”的假相，使学生产生被政府“愚弄、欺骗”的错误心理，并对“高自联”马上提出“和平请愿，政府不理，统一罢课，通电全国”的口号作出强烈反映，造成北京高校6万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外地学生此后纷纷罢课，声援北京学潮。

5月2日，“高自联”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请愿书”，就对话提出12条要求：只能承认“高自联”的代表团；政府方面出席对话人员，应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双方发言均等；“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完全是一幅反对派的姿态。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提出对话要求，政府在4时答复同意。结果，当天下午5点，广场上打出了“绝食罢课，请求对话”的横幅。

5月13日开始的绝食，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震荡，舆论的倾斜，大规模的声援，使动乱进入高潮。这场历时七天，前后有三千人参加的大绝食，是“高自联”的又一重大罪行。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得到及时的救护和治疗，保证不能有一人因绝食而死亡。但是，“高自联”在绝食现场设立五道封锁线，设立纠察看守，没有“高自联”的通行证，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绝大多数参加绝食的善良学生成了人质和筹码。有些学生私下对允许看望他们的教师说，想回学校，可是不敢公开走。5月17日，“高自联”撕毁与市红十字会签订的协议，不准将绝食学生接到医院治疗。

5月18日，吾尔开希在同李鹏同志对话会前就商议，要让这次对话不成功。会上，吾尔开希别有用心地穿着病员服，吸着氧气，制造紧张空气。“高自联”的头头们态度异常蛮横，条件苛刻，要求越来越高。5月20日，戒严令公布后，“高自联”一面组织堵截军车，围攻部队，破坏戒严；一面占据天安门广场，他们说“只要占领天安门广场一天，电视、广播就得讲这个情况，就会得到各国的关注和舆论的支持。”“高自联”还向个体户梁亚权伸出敲诈之手，勒令、威胁其向“高自联”捐款。在广场上，他们声称开办“民主大学”，

并使广场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接着他们又演出了树立“民主女神像”的闹剧。

“高自联”利用各种宣传工具，不断进行反革命煽动，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高自联”广场广播站5月21日一天就广播了“李鹏要镇压20万学生，已把监狱腾出来了，”“江泽民宣布不承认李伪政府”，“外交部等10个部委不承认中央政府”，“广场断水”，“晚上飞机来投弹”等9个谣言。北大、师大、人大等校学生自治会的广播站不仅在校内广播，而且向校外广播，每天广播到深夜。人大的“北京之音”广播《话说劳改释放犯》，说“劳改释放犯爱国我们就欢迎，爱国不分先后”，大肆吹捧劳改释放犯。他们还煽动市民对抗政府。北大自治会的广播站直至6月4日反革命暴乱平息后仍在播音，6月7日戒严部队到海淀区巡逻，宣布“高自联”为非法组织，通缉其头头，广播才停止。

戒严后，“高自联”公开宣称要采取最激烈的手段进行斗争，组织“飞虎队”“敢死队”“义勇军”等暴力组织，要搞军事化、兵团建制。扬言要揭竿而起，攻打巴士底狱，联合几个方面军，让飞虎队充当冲击中南海的主力。派出5个宣传团到全国各地串联，准备搞全国统一行动。他们在小字报上号召：要联合党内的改革派、中国民联和国民党组织武装力量，同共产党作斗争。“高自联”组织人买匕首，发菜刀、铁棍，制作燃烧弹。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广播，告诉人们坦克、装甲车哪些部位最薄弱，怎样制作燃烧瓶。有的纠察队员从实验室偷出炸药，带到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们还组织人设路障，扎车胎，烧军车。许下高价，收买暴徒，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堵一天军车给30元，抓

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到6月3日早晨，“高自联”的头头都佩带上枪，柴玲、王丹、封从德等指挥广场上的人向解放军扔砖头、瓶子，用铁棍打解放军。3日上午，“高自联”在六部口抢了冲锋枪、步枪等枪支弹药，举办展览，并广播煽动学生参加敢死队，拿起武器对抗军警。下午5时，“高自联”同“工自联”一些人在广场上发菜刀、匕首、铁链等凶器。晚9时，吾尔开希还在师大煽动一些人走出校门，参加围堵戒严部队。

六、“高自联”勾结海外、国外反动势力

海外、国外的反动势力直接插手“高自联”，施加影响。“高自联”首先得到精神和舆论上的支持与纵容。美国国内朝野掀起“最狂暴”的一次反华浪潮：总统讲话，国会通过制裁中国措施，议员起哄，报界煽动。《美国之音》极尽造谣惑众之能事。国民党总统李登辉说：台湾不只是声援，其它方面我们也可以支援。台湾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一些别有用心的海外报刊、广播也突然一下活跃起来，他们把镜头对准“高自联”的头头们，不惜篇幅，大肆吹捧。

其次是“高自联”获得海外反华及反共势力物质上的直接资助。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5月28日，“香港声援团”自称带来了65万美元、200万港币。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带头发起“送爱心到天安门”活动，捐款10万新台币。国民党一位中央委员发起募捐1亿新台币活动，建立所谓“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刘晓波从美国带回8000多美元和万余元人民币，送给吾尔开希。有从香港

空运帐篷和其它物资的，有送通讯器材的，还有主动询问提供经费的。“高自联”一位副总指挥称他们有1000万元经费，其中现金300万元，维持广场的活动，每天需要10万元。“高自联”的头头潜逃时，每人身上都带有数万以至十几万的经费。“高自联”还通过国外势力给它的40多名骨干每人办了一份假护照。最后，“高自联”的头头吾尔开希等人在海外特务组织的掩护下潜逃出国。一些国家为其提供反华反共的各种条件。台湾、香港的一些反共组织和个人也为吾尔开希等提供了大批经费。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8月19日）

武汉长江大桥被堵截真相

张 扬

今年五、六月间，正当北京动乱急剧升温、最后发展为反革命暴乱的时候，武汉的动乱策划者们与此遥相呼应，接连制造了几起拦阻铁路列车的严重事件。国民经济大动脉一次又一次地在九省通衢受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和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

据武昌铁路分局统计，仅6月4日至6月8日五天内，京广线和武（汉）大（冶）线在武汉先后中断九次，累计达40小时24分，大量客货列车晚点，辖区内保留列车200多辆无法开出；损失客货周转量4.8亿吨（人）公里，直接经济损失140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难以计算。一时间，武钢告急，高炉缺煤被迫停产保温；电厂告急，缺煤危及华中电网；商业部门告急，市民生活用品难以运进，人心浮动。

武汉频频发生的冲击铁路事件，决非孤立和偶然，它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妄图搞乱全国阴谋的一部分。

动乱一开始，武汉地区少数人就积极活动，与北京一些非法组织的头头和“精英人物”密切联系，互相配合。4月上旬，一封来自北京的所谓《告全国大学生书》传到武汉，有人如获至宝，广为传播。从4月19日开始，武汉大学部分学生上街游行，先后五次到湖北省政府门前静坐，两次把省政府大院铁门冲开，要求湖北省委转告党中央，要正确评价

1986年学潮，为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平反。武汉大学校园内一张题为《救国五大纲领》的大字报，公开宣称要“改变一党专制，实现政治多元化”。这些内容与北京某些高校出现的大字报如出一辙。5月4日赵紫阳同志在“亚行”讲话发表以后，全国性动乱进一步升级，及至5月中旬，北京“高自联南下演讲团”公开亮出旗号，在武汉地区高校演讲和散发传单。武汉部分高校学生也成批赴京参加“声援”，有的人担任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助理”、“常务秘书”、“财务部长”、“财务部副部长”以及“外高联”常委等职务。动乱期间，北京“高自联”与武汉“高自联”通过固定电话联络点和电报、信件往来，一直保持着频繁联系。

5月16日，武大哲学系一名博士研究生联络了几个1986年学潮中的头面人物，向省政府递交请愿书，并扬言要封死长江大桥，切断京广线。5月17日，上万名不明真相的学生涌向长江大桥静坐示威，武汉三镇咽喉受阻。有人用电车做路障，并爬上车顶发表煽动性演说。当日15时左右，正当湖北省有关负责人同学生代表对话时，数百人翻过武昌桥头护栏，聚集在铁轨上。15时44分，一列从柳州开往西安的116次列车驶近武昌桥头。司机发现前方人头攒动，紧急刹车，列车在离人群仅几米处嘎然而停下了，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与此同时，由北向南行驶的1617次货车也被迫中止运行。

对于公然冲击铁路的严重违法事件和愈演愈烈的动乱，广大群众十分愤慨。而极少数蓄意制造动乱的幕后策划者却大肆鼓噪煽动，为之叫好。某大学一位自称“著名教育家”的人出来发表声明，表示对学生的行动“由衷地感到骄傲、

自豪和敬佩”，“毫不保留地支持”学生的行动。

武汉地区的动乱进一步升温，各种非法组织相继出笼，政治谣言四起，由一伙流氓地痞组成的“赤膊游击队”也出现在街头。此后几天，每天都有数千学生冲击武昌火车站，强行扒车北上，造成7列客车停开或晚点，严重干扰了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

面对这一局面，湖北省委、省政府旗帜鲜明，采取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省委书记关广富明确指出，冲击铁路交通是严重违法行为。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等负责人坐镇长江大桥，现场办公；公安干警、武警战士和铁路职工并肩战斗，加强铁路保卫工作。闹事者继而又转移目标，开始冲击工厂。5月21日，武汉地区一些高校的学生4000多人，分别前往武汉锅炉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昌车辆厂、武汉钢铁公司等大中型企业，鼓动工人罢工，均被护厂队挡在厂门外。

当日，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头头刘向阳主持召开武汉地区25所高校学生自治会联席会议，策划成立武汉地区“高自联”。会间，刘向阳宣布一个刚从匿名电话中得到的“最新消息”：“有军队到武钢实行军管，武钢工人决定从5月22日清晨6时半开始罢工，需要学生声援。”刘还造谣说，广州军区有两个师已开进了武钢。武汉“高自联”五所常委学校代表在会场外经过一番密谋，决定无条件声援武钢。

是日星夜，武汉地区20余所高校2万多名不明真相的学生相继从四面八方涌向武钢，凌晨6时许，即将十里钢城厂前道路全部堵塞，阻止工人上班。上午9时，数百名学生不顾护厂队阻止，冲进厂区游行，发表《致武钢工人书》，煽动工人罢工。

有觉悟的武钢工人以坚守工作岗位的实际行动，顶住外来冲击。此时，多数学生见武钢厂区生产正常，所谓军管纯属子虚乌有，连呼上当，纷纷离去，刘向阳等人不得不哀叹：这次行动失败了。

然而，他们并未罢休。23日上午，他们又鼓动一些人冲进武钢厂区，呼喊“武钢罢工，李鹏下台”，“只要武钢14万人带头，全市工人就会总罢工”等口号，要求公司领导和学生代表对话，宣布武钢不承认李鹏政府。

与此同时，他们向武汉地区的一些大中型企业全面出击，就连远离市区上百里的葛店化工厂也遭到冲击。

此时，武汉地区插手学生运动的人，又迫不及待地由幕后跳到幕前。有人策动了由300多名知识分子联名发出的《就当前形势致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为动乱呐喊助威。

北京反革命暴乱平息后，武汉地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孤注一掷。武汉“高自联”头头制定了新的行动方案：堵死武汉所有交通要道，包括铁路、长江大桥、过江轮渡码头等，使整个城市瘫痪，迫使工人罢工；采取过激行动，刺激军队开枪，造成流血事件。

破坏京广线成为他们发难的重要目标。6月4日凌晨，武汉地区1.3万多名学生涌向长江大桥。下午2时46分，600多人冲向武昌桥头铁轨，将铁路旁的5根备用铁轨横置在铁轨上，迫使1553、3128次两列货车停车。有人把花圈和横幅标语放在机车头上，一直闹腾到晚上7点多，才被公安干警强行驱散。

6月5日上午9时许，9000多名学生将长江大桥围得水泄不通。11时，近千名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冲上铁轨，设置

障碍，将277次旅客列车拦停，致使京广干线运输中断7小时。当日下午，100多人又在武昌大东门一带铁路上设置路障，拦堵列车。

6月6日13时20分，近2000名学生和围观群众将武昌桥头安全防护墙推倒，冲上铁路，迫使运行中的3105次旅客列车停车，京广干线再次中断。一些歹徒疯狂地向维持秩序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投石子，当场有10多名武警、公安人员负伤。

6月7日9时55分，数百名身份不明的人涌上武昌桥头铁路线，将3981次货物列车拦停。11时许，围观者越聚越多。这时一伙歹徒推翻一辆停在大桥上的交通车，并放火焚烧，接着又冲击列车。刹时间，砖头、石块象雨点般地投向机车。随后，歹徒们又将武昌桥头堡一、二楼的门窗、玻璃、灯具全部砸碎，将职工上下班用的24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扔入江中。

为了切断武钢，造成事实上的停工停产，6月9日晚10时许，200多名学生，将通往武钢的南环铁路线一段上的铆钉卸掉17个，挖松路基10多米，并准备用铁轨横在路中，迫使列车无法运行。

制造动乱的骨干分子还公然叫嚣：“抓住反动便衣，要往死里打”，“对学贼可采取暗杀、绑架、致残等手段惩罚，不可心慈手软”，“成立反恐怖组织，刺杀绑架邓、李、杨及其走狗，该杀的杀，不该杀的作人质”。一些暴徒大打出手，为所欲为。据不完全统计，动乱期间，湖北省省、地、市首脑机关先后24次被冲击，189辆公共电、汽车和7辆警用车被砸毁，214名公安武警人员被打伤，其中重伤51人，直接

经济损失达 2 亿元。

风风雨雨五十多天已经过去。如今南来北往的一列列火车从武汉长江大桥奔驰而过。作为这场动乱的历史见证，它已成为一本活教材，启迪人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

新学年开学以后，武汉地区大专院校在组织师生学习四中全会精神，反思五十多天动乱的教训中，联系武汉长江大桥被堵等事件，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展开了有力批判。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8月31日）

上海动乱真相

施岩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首都北京的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报纸上已作了详尽的介绍，其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而同一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严重的学潮、动乱和局部骚乱，还没有作过系统的披露，人们还不太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这里，我们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上海动乱的前前后后，意在帮助人们了解上海这场动乱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以进一步认清这场动乱的性质、根源和危害，从中引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来。

这场动乱是早有预谋的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场风波是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的结果。由于赵紫阳同志的纵容和支持，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一些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到处鼓吹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文化西方化。去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针对过去几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某些严重失误，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尤其是赵紫阳身边的一些智囊人物，凭借他们敏锐的嗅觉，预感形势不妙，便利用国内外、境内外的传播工具，竭力反对治理整顿方针，透露出“倒邓保

赵”的政治信息，为这次动乱作了一系列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与赵紫阳的智囊团关系极为密切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散布治理整顿必然导致经济“停滞”、改革“逆转”，并攻击李鹏同志在七届二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耸人听闻地提出所谓要防止改革“走回头路”，把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港台一些报纸也别有用心地称改革已走上绝路。今年年初，《世界经济导报》又异乎寻常地全文转载了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的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在这篇《对话》中毫不掩饰地说：“我觉得应当直截了当地把对中国前途的这种担忧说出来”，“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并说“这种苗头许多人已经感到了”。这篇重头文章显然是为了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期间，上海与北京的所谓“精英”人物频繁往返，南北奔走，又是召开研讨会，又是发表文章，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象1986年底、1987年初一样，极少数人把挑动动乱的主要目标放在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身上。今年年初以来，他们利用高校这块阵地，打着“理论研究”、“学术探讨”的幌子，散布了一系列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一些人在上海高校内偷偷地张贴“海报”，蛊惑人心地说什么“危机！危机！危机！信仰危机！体制危机！前途危机！历史责任感逼迫我们大学生站在时代之前”；公开号召要搞组织，“结成社团”，“共研现实社会”。一些人以诗歌、话剧、小说、大字报等形式，“纪念八六年学潮”，煽动“走上街头，为民

主、自由、人权而呐喊”。一些人则暗中串联，别有用心地在学生中传说“北京五四要上街”、“上海今年肯定要动”，“要用血来纪念五四”、“要大干一场”。当时上海高校有人曾洋洋得意地说：“现在全国好比一堆干柴，只要方励之等人出来领头，这堆干柴一点就燃。”

动乱的征兆果然在境内外的相互策应、紧密配合下悄悄地引发起来了。今年1月，海外和国外一些组织不断鼓噪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等一切政治犯”。“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复旦大学82级毕业生）与方励之、苏绍智、严家其、包遵信、张显扬、李洪林等人密谋把所谓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签名运动”引向上海。王若望闻风响应，声称“上海不能沉默，要奋起直追！”并伙同一批臭味相投者，企图在上海发起签名运动，“南北呼应”，向政府施加压力。王若望还亲自修改了征集签名稿，圈定了30多位知名人士的名单，研究了“先易后难、先分后合”的策略。并派人上门征集签名，准备发往香港登报。

“中国民联”也把黑手伸向上海。这个以“取消四个坚持，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为近期目标，并将“推进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作为“现阶段的工作重点”的反动组织，把上海作为他们今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早在年初就派遣汤光中等三人从美国潜入上海，携带胡平、王炳章等人给杨巍的亲笔信、祝贺卡，准备在杨巍刑满释放时去监狱门口迎接，以此扩大中国民联影响，实现其所谓“政治登陆”。后被我公安机关及时发现，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今年3月，上海不少高校陆续收到大量来自境外的“心战品”，有的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

放，提出“要迫使邓小平第四次不光荣地下台”；有的煽动大学生在五四期间搞全国性统一行动，“要以鲜血来纪念五四”。

鉴于上述种种迹象，上海高教系统很多同志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并采取了一系列预防的措施。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前两天，上海有一所高校的学生会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的《告全国大学生书》，鼓吹“没有小乱，就会出现文革那样的大乱；没有短乱，就会出现十年长乱。乱一点并没有什么可怕”，还蛊惑人心地提出：“全国大学生们，‘五四’即将来临，届时让我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制的大旗”。出人意料的是，胡耀邦同志恰在这个时候突然病逝，极少数人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旗号迫不及待地借题发挥，煽动学潮，制造动乱。因此，这场动乱在这个时候发生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其实是蓄之既久，早有预谋的。

学潮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

上海的这场学潮和动乱，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4月15日—4月26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为名，掀起一股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的浪头；从4月26日—5月20日，学潮由学校向社会扩散，出现以“声援北京高自联”，“声援《导报》”，反对4·26社论，要求承认非法组织，要求所谓“新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游行、静坐、绝食、请愿；从5月20日—6月4日，国务院发布戒严令后，继续出现矛头直指中央领导同志、明目张胆地反对戒严的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游行，继而发动“空校罢课”；从6月

4日——6月8日，在“高自联”策划下，几千学生和一批社会渣滓沆瀣一气，上街破坏车辆、堵塞交通，造成全市交通瘫痪。

这场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首先表现在学潮初期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就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动乱性质。其中一类是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4月15日，在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当夜，华东政法学院就有人贴出一条标语：“耀邦你死得太惨了，中国太惨了。”4月18日，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题为《警世钟》的大字报，公然喊出：“本死不死，除奸更待何时”；“让上帝把完成历史使命的人收留去吧，别只召去了耀邦”。4月18日张贴于华东师大内的一张大字报煽动说：“民主必须化，自由必须大，政府可以骂。”另一类是煽动学生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如“追查胡耀邦辞职、去世真相”；“重新评价耀邦”；“重新评价1986年的学潮，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恢复名誉，还我方、刘、王！”等等。还有一类是反对治理、整顿方针，煽动“倒邓保赵”的。4月22日，张贴在复旦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称李鹏同志今年3月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向改革派发出猛烈反击的檄文”；还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央领导同志称为“保守派”，而把消极对待四项基本原则，怂恿支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封为“改革派”，把四个坚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歪曲为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4月19日张贴于华东化工学院的一张题为“我们行动的檄文”的大字报说：“改革正处在危难之中，我们可以想象一旦保守派全面掌权，中国将导致何种局面”；“我们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支援改革派，象莫斯科市民支持叶利钦那样

支持我们的改革家。”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世界经济导报》抢在4月23日提前出版了第439期，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次动乱的两条政治纲领：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对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导报》提出这两个动乱的政治纲领，其目的正如钦本立自己所说的那样“就是要邓小平检讨”。这期报纸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严肃批评，并责令它停止发行。在这以后，《导报》某些人就不断出入于上海各主要高校，利用学潮制造动乱。许多高校的大小字报也都紧紧围绕这两个政治纲领大做文章。

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学生以及某些非法学生组织的背后，都有那么一些出谋划策的“智囊”，他们活跃于幕前幕后，诱引大批无知的学生，从成立非法组织、进行秘密集会、采取恐怖行动，直到大规模破坏交通、制造骚乱，一步步登上动乱的战车。

复旦大学有一个以“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教师叶茂强为首的七名教师组成的“智囊团”。他们公然对复旦各派学生组织宣布：“智囊团是最高决策机构，决定的事一定要执行”。在这次动乱中，复旦大学学生搞静坐、闹绝食、堵交通、设路障等活动，几乎都有这个“智囊团”在参与策划指挥。甚至复旦“自治会”和上海“高自联”在后期炮制的各种宣传品，不少也是他们起草或修改定稿的。5月26日，叶茂强还跑到上海“高自联”秘密召开的21所高校代表会议上，为学生头头们分析形势，指点下一步“行动方向”。他说，昨天下

午，我们理论界开了一次会，认为：“一是万一上面采取高压政策，学生要进行自我保护，‘高自联’和各校‘自治会’的财产应隐蔽起来，以备后用；二是要准备打持久战，不仅要进行游行、示威、绝食、静坐，还要深入群众”，“要把启蒙运动的种子埋下去，让他生根发芽”，并声称“这就是我们对形势的总体指导”。

华师大经济系副主任陈琦伟，在这次动乱中，一方面为学生出谋划策，充当“导师”，一方面多次向学生发表反政府演讲，公开煽动学生“打倒政府”，他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使李鹏戒严，现在，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我们是要把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李鹏官僚独裁政府拉下台”。他还“指点”学生说：“我们不应提打倒官倒的口号，因为官倒不是一种现象，它是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人发疯，全国跟着遭殃”；“这个政体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社会危机、信仰危机”。他的这些煽动性演讲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毒害了很多青年学生。

《世界经济导报》国内经济部主任陈乐波，也是上海动乱中直接操纵和利用学生的“智囊”人物。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他“建议”上海“高自联”和“中自联”（中等学校自治联合会）的学生代表“聚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方向”。他向学生提出了三条“行动纲领”：（1）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次取得了游行权，我们还应有其他的权。（2）争取高校学生自治会合法化。我们的做法是一个一个把阵地夺下来，报社，工会，党支部，民主党派，夺一个是一个，能改造一个就是一个。（3）要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新的启蒙。这次学潮是一次耕耘，我们应该多撒下一些民主权力的种子，还要有点剧烈

的行动，让后人有所收获。

与此同时，国外和港澳地区的敌对势力也有许多专线同上海“高自联”保持联络。“中国民联”频频插手上海的学潮。“民联”成员徐邦泰（原复旦大学学生）鼓动学生“建立独立的学生会”。“中国民联”总部还指派杨巍与上海“高自联”头头接触，对学潮予以“政策指导”。“中国民联”成员陈军，为了随时“与国内关系互通信息”，专门在其美国家中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和专用电话，由陈军24小时值班，对上海的学潮、动乱遥控指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动乱中，更是频频向上海投寄各种煽动性的“心战品”，指挥上海潜伏特务“把握现状，参加学运，汇报成果”，并伺机发展组织。总之，各种敌对势力和社会不满分子都千方百计伸手操纵和利用学生，策划和加剧动乱，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动乱自始至终呈现“南北呼应”的特点

这次动乱的中心和主战场在北京，上海是与之遥相呼应的分战场。京沪两地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通过北京“三所一会”（即赵紫阳的“智囊团”）、《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以及两地“高自联”组织和学生南下北上的频繁串连等多种渠道，策动上海“与北京联合行动”。在整个学潮和动乱过程中，“北京刮什么风，上海就下什么雨”。

学潮初期，北京高校出现许多“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上海高校也如法炮制，亦步亦趋。各校贴出的大字报有的咒骂我们的政府“是最腐朽的政府”，咒骂我们的党“是集权的党，是欺诈人民、靠不住的党”；有的要“打倒封建专制！打倒独夫民贼！”“推翻共产党，解散

政府，改组政府”。《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后，在方励之等人授意下，北京“高自联”立即发出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改成为“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上海在同一时间，也以“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名义，在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通告”，统一规定游行时多提物价、官倒，“绝对不提打倒官僚政府之类的口号”。

当这次“学潮”和动乱“风起于青萍之末”时，由于上海市委、市政府于4月17日就旗帜鲜明地发出“通告”，提出“要严防坏人借题发挥，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活动”；又由于全市50多所高校的干部、教师以及社会力量，全力以赴地做好稳定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得了主动。在5月4日以前，全市51所高校、13万大学生中，仅三所高校、四五百人上街，教学秩序基本正常。但是，5月4日以后，风云突变，赵紫阳同志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使形势急剧恶化。“学潮”和动乱以来，坚持上课的大多数学生和积极向学生做工作的大多数干部、教师感到泄气。如5月4日以前局面一直比较平静的交通大学，许多学生在收听了亚行讲话的当夜就议论纷纷：既然上街游行是“爱国运动”，那我们不上街的是不是就不爱国了？而那些搞动乱的人则从中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使动乱以更大的规模、更为嚣张的气焰越演越烈。

这一时期，上海的学潮出现了两大特点，一是紧跟北京、声援北京，二是学生与《导报》互相声援，共壮声势。市“高自联”的头头们在5月10日下午策划组建上海高校学生“赴京请愿团”，并为此于1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

请愿团主要任务是“质问国务院：《世界经济导报》错在哪里，什么叫总编负责制等等”。行前，同济大学的“高自联”头头打电话给“北大自治会”，要求派人迎候。请愿团到达北京后，立即同“北高联”头头王有才等接上了头。为了加强与“北高联”的联系，上海“高自联”向北京派出了联络员，每天把北京的情况传到上海，把上海的情况传到北京。从那以后，北大“三角地”广场就经常可以看到上海学生行动的海报。

5月15日，上海学生从赴京请愿的代表那里获悉北京学生于13日开始静坐绝食，立即采取了两项“策应”行动：一是请愿团派其中5个人立即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绝食，余下的人继续去北京各高校联络、演讲、递交请愿书。二是复旦、华师大、同济等校马上贴出倡议书，号召上海学生也进行绝食行动。赴京请愿学生还打电话给同济“学生自治会”头头，通报戈尔巴乔夫访沪的日程，要上海学生届时“有所动作”。5月16日下午，复旦、同济、上海工大等高校的数千名学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当晚，成立了“上海高校绝食团”，50余名学生在市政府门前宣布绝食。5月17、18、19日连续3天，参加绝食的学生最多时达300多人。

与此同时，上海高校又陆续有大批学生到北京去串连并参加天安门广场绝食。仅上海工大，这一时期进京串连学生就达102人。5月19日下午，上海高校有人在与北京“高自联”头目王有才电话联系中，获悉当天晚上李鹏要发表讲话，北京要实行戒严，“消息来自上面，绝对可靠”后，立即随着北京“高自联”这根指挥棒，开始作绝食“降温”的准备。

中央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使上海“高自联”极少数人感到靠绝食来加剧动乱的阴谋已彻底破产，于是一面通知绝食学生撤回，一面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激烈的对抗行动，在上海掀起了一股反对北京戒严和妄图推翻合法政府的反动浪潮，促使动乱进一步升级。

一是连续不断地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5月21、22日，上海高校的少数人连续在复兴公园聚会，密谋近期“要不断地、持续地交叉游行”，即组织各校轮流上街，学生也分批上街，保持声势，保存实力；提出“近期目标，要李鹏下台，远期目标，实行多党执政”；并决定正式成立“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

5月23日，华师大“学生自治会”头头在该校共青广场的千人集会上说：“北京的学生现在心力不济，我们上海学生要多分担一些，要把学运的重点转移到上海来。”就在这时，“北高联南下宣传团”、“特别行动队”等纷纷窜到上海。“南下宣传团”头头赵文利（女，西北政治学院法律系88级学生）于5月24日持“北高联”常委柴玲签发的联系证明信，携带北京各高校印刷的大量传单、照片、演讲稿等宣传材料，与其他十多人潜来上海，先后与上海“高自联”常委张才（即姚勇战，复旦大学学生）等有接触，并在张才等人安排下，先后在上海工大、铁道学院、复旦、交大作了多次煽动性演讲，谩骂中央领导同志，说“‘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希望上海的学生坚持到底，复课无疑是对北京同学最大的背叛！”，此后，这种说法便成为上海学生的“统一口号”，并连续组织了长达9天的游行示威。

二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策划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

议，妄图“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的阴谋，由复旦、华师大、同济、交大四所高校的“自治会”头头决定，5月25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大会。会议策划者供认，召开这次大会，是“要趁万里在上海之际，让万里知道上海学生不满，要求尽快召开全国人大和中央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为学生运动正名、定性”。当天晚上，交通大学“自治会”召开有2500人参加的大会，上海教育学院的一个教师（原非法组织成员）作了题为《万里回国后的形势和对策》的演讲，煽动学生“要围绕人大的召开，进行呼吁，形成广泛的政治力量”；“这次人大应有市民和学生等各阶层代表参加，这是他们应该争得的权利”；“学生要向人大常委作思想工作，让常委会了解学生运动真相”等等。同一时间，复旦有人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写信，鼓动各地“人大代表马上进京”，迫使“改组政府”。

三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阻拦戒严部队进城的阴谋活动，在上海堵塞交通、破坏经济。上海动乱的制造者们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多次秘密召开会议，商定“万一上海军管就上街堵交通，造成事实上的罢工”；并按“以就近学校为主”上街堵路的原则作了分工。在此期间，他们还派出大量人员，先后到铁路、码头、机场和驻军营房附近打听消息，察看有没有军队调动迹象。5月22日凌晨，华师大“自治会”头头以“今晨5时部队将进入上海实行军管”为由，紧急集合六七千名学生，于清晨4时分别占领了苏州河上的5个桥头，使市区5条南北主要干道被堵塞两个多小时。5月24日凌晨4时，复旦大学1500名学生也前往五角场地区的四平路、邯郸路、翔殷路、黄兴路、淞沪路等路段，以静坐方式堵塞交通，

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与此同时，“高自联”还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分头到全市各主要工厂企业进行煽动性宣传，企图挑动工人举行罢工。但全市各企业的干部、职工，坚定地响应市委、市府关于“稳定大局，稳定上海，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的号召，对这些煽动和挑唆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是组织“空校罢课”，对抗李鹏同志提出的“无条件复课”的要求。由于上海各高校坚决贯彻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的精神，对学生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各校大多数学生陆续返校上课，少数人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5月28日下午，上海“高自联”按照天安门学生游行指挥部的指令，又挑动数万名学生配合所谓“全球华人大游行”，在人民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北京“南下宣传团”成员在集会上分头发表演讲。上海“高自联”头头在会上宣布：上海高校学生从现在起“空校回家”，造成“事实上的罢课”。5月29日，“高自联”向全市51所高校发出“空校公告”，鼓吹“空校是最彻底的罢课”，“是对李鹏所说的‘无条件复课’的最强烈抗议和无声的否定”，“是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精彩插曲”；空校“将发扬播种机的作用，扩大这次民主运动的影响”。

短短几天内，市“高自联”发起的“空校罢课”活动迅即波及到大部分高校，给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上海高校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干扰。不少高校除毕业班外，其他年级的学生成群结队，匆匆离校。“高自联”的极少数人并不因此罢休，他们策划撕毁各校张贴的恢复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通告；抢夺校广播台或私设广播台；冲印刷厂，强行印

刷传播反革命谣言的传单；冲变电所，威胁学校安全；殴打公安保卫人员，抢劫报话设备；一些学生还到教工家属区哄闹，千方百计鼓动教师“罢教”；对一些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高校领导进行围攻、谩骂，甚至到领导干部宿舍进行威胁，扬言要抄领导同志的家。一些不愿“空校罢课”的学生被谩骂，不让进教室，甚至把他们的衣被用具扔出宿舍；他们还冲击考场，破坏正常教学秩序。他们这样做，实质上是把一代青年的命运和广大同学的自身前途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各种人物纷纷介入 动乱迅速向全社会扩散

上海的这场动乱源于学潮，很快演变成成为动乱，同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纷纷介入是分不开的。上海作为旧中国的“十里洋场”，作为“四人帮”的老窝，那些“静观待变”、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那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而又搞政治阴谋的人，他们从学潮一开始就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是可以改变当前情况的转机”，而迫不及待地介入进来。以4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的介入为标志，动乱便迅速向全社会扩散，演变成为一场社会动乱。

《世界经济导报》是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策源地”。他们声称“在学潮中，导报应作为运动的主角身份发挥作用，要将自己的旗帜打出来，研究怎么改变中国的制度”。为此，他们一方面利用439期导报事件，多次召开所谓“新闻发布会”，煽动学生和新闻界声援导报，以“保持长期的压力、推进的势头”；一方面利用该报驻京办事处，随时把北京动乱情况传回上海，如本阶段北京动乱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什么主要动向，严家其、方励之等发表了什么意见，中央领导对动乱

以及对《导报》的看法有什么不同等。然后，《导报》的一些人就通过翻印散发有关材料、到高校去演讲、与动乱的组织者个别串连等方式，把有关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导报》卷入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程度，从复旦大学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写信“感谢”《导报》老师的“宝贵指导”和上海“高自联”的“最新消息找《导报》，理论指导找《导报》”的自白中可见一斑。

上海理论、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战线，有那么极少数人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同国外的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北京参与策划、组织、指挥暴乱的幕前幕后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这次动乱中也上窜下跳，极为活跃。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王若望，在这次上海动乱中，几次三番上街游行。多次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还频频向境外报刊投寄支持动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学潮初期，他得意洋洋地对人说：“你们看，可有好戏看了，我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5月份尚未到，在4月份就掀起了这样的浪潮，比86年的学生运动更成熟了，这次事件肯定是全国性的，肯定会产生出一个新的转机”。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王若望急忙为香港一家杂志撰文，攻击社论是“中共领导层迈向自取灭亡的病危通知书”。5月中旬，北京和上海部分学生绝食，王若望煽动说，“我不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而且是绝食的老祖宗，一生绝食四次”。他参加游行时身披条幅，胸前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背后写着“救国救民，救救学生”。王若望还说，“有人担心，这一来共产党被打倒了，中国没有干部了，今后怎么办？其实这是多此

一举。严家其、方励之等都是政治家，现在又涌现多少象王丹这样年轻有为的接班人，还有赵紫阳这样的人嘛！”他还暗中排列组阁名单，提出“学生运动胜利后，要同知识分子组成集团，召开国家会议，修改宪法，组织联合政府”，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

以王若望为代表的极少数长期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挑动和裹胁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多次走上街头，为学潮和动乱火上添油，推波助澜。一些新闻单位、理论研究部门、群众团体以至个别党政机关的少数人，也打着横幅上街。各种“呼吁书”、“公开信”也频频出台。上海作协也有那么几个人，在王若望的蛊惑和策动下，着手起草《向世界各国笔会的呼吁书》、《给全国作协及人民的通电》，企图用国外舆论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一时间，种种极端反动的观点公开散布，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广为传播，各式各样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到处蔓延。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次动乱中，上海还有几个身居党政机关要职的共产党员，公开同中央对抗。在5月19日中央党政军负责干部大会之后，他们策划起草了所谓上海市的共产党员《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收回李鹏5·19讲话”、“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立即解除新闻封锁”，同北京“三所一会”的活动遥相呼应。这份《公开信》复印数百份散发至本市新闻、理论、文化、高校、企业广泛征集签名。它一出笼就受到上海广大共产党员的抵制，指责这种行径是唯恐天下不乱。但策划者们还是急不可待地通过香港报纸发表了消息，并公布了部分签名名单，在海内外造

成恶劣的影响。

在这次社会动乱中，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也是一支极为活跃的队伍，其头头是“高自联”常委之一。这批人几乎参与了上海“高自联”中后期的所有的破坏活动。就在动乱期间，他们还举办了所谓“当前中国政治和思想热点”系列讲座，企图把动乱扩散到更广的范围。从6月4日开始，他们还在淮海中路闹市区社科院门口梧桐树上安上高音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的反动叫嚣。直到6月10日上午，他们还纠集了四五十人，到康平路市委机关外面游行示威，喊叫一些非常反动、恶毒的口号。

动乱期间，一些“四人帮”残余分子得意忘形。他们私下里议论说：看到“现在这种形势，我们‘造’字头心里不晓得有多高兴！”“这次搞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相互庆贺“要改朝换代了”，“出头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还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煽动闹事，妄图“出来撑一下局面”。据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本市“四人帮”残余分子在动乱期间乘机公开活动的就有35名，其中，公然跳出来煽动工潮的就有11名。

上海的一些社会渣滓在动乱中先后拼凑了14个非法组织，后来凑合成所谓“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提出了所谓“组织工人罢工，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李鹏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纲领”，并与上海“高自联”勾结在一起，纠集社会上的一些乌合之众，游行、演讲、发传单、造谣言，进一步煽动和制造动乱。

北京“平暴”铲除动乱根源 上海人民一举稳定大局

6月3日晚，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消息传来，上海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们乱了阵脚，躲的躲，逃的逃，也有的象输光了的赌徒那样孤注一掷，疯狂进行各种破坏，将上海这场动乱推向极端。

他们首先利用平暴初期北京有几天信息不畅的机会，大造反革命舆论，歪曲北京平暴事件的真相，搞乱人们的思想。从6月4日凌晨起，各种传单、小字报充斥街头，特别是通过港报复印件传播所谓“北京镇压真相”。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复印设备，竟被一些人用来大量复印歪曲北京平暴真相的香港报纸，并四处散发。《世界经济导报》在社科院门前的阅报栏里也连篇累牍地张贴、复印港台及西方一些新闻机构编造的“血洗天安门”、“军队内部火并”、“38军倒戈”等谣言的报刊及图片。在极少数人策动下，上海高校一些学生组织了所谓的宣传队走上街头，用自制广播台和手提喇叭传送各种谣言。复旦大学“自治会”还组织一批学生到市政府和一些新闻单位门口用高音喇叭放哀乐。有个自称是刚从北京回来的人向围观者歪曲地介绍北京情况，呼吁市民进行“三罢”，呼吁其他国家立即与中国断交，撤回驻华大使，进行经济制裁；并叫喊“党员要退党，团员要退团”，“军人家属要挂白色挽联进行抗议”等等。同济等高校甚至在马路上拉出广播喇叭公开播送“美国之音”和台湾“自由之声”等电台的反华反共广播。

上海动乱的极少数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在绝望中加紧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策动堵塞大小交通，造成事实上的停

工、停市，搞瘫经济，搞乱上海。6月4日下午和晚上，“高自联”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6月5日凌晨4时统一行动，驱使成批学生和一些社会渣滓配合下，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据不完全统计，在6月4日至8日的5天内，全市共有234个马路道口被反复堵塞979次，有六千多辆机动车被强行拦停用作路障，其中有16辆被掀翻、砸毁、烧坏，有1223辆（市内公交车1017辆）被戳破轮胎或砸坏。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市内许多铁路道口卧轨，拦截火车，破坏铁路运输。光新路等十一个铁路道口被反复占据、堵塞，沪宁、沪杭线铁路运输中断近50个小时，共有281列客货列车无法到发。6月6日晚，在铁路光新路道口还发生了焚烧列车、殴打司机和公安干警的严重骚乱事件。在这次骚乱中，共烧毁了9节列车车厢，殴打170多位民警和铁路职工，直接经济损失达570万元，骇人听闻，影响极坏。

极少数人策划的堵塞全市交通的卑劣行径激起全市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原先的如意算盘是，经过3天的强制性的停工、停市，加上他们的反动宣传，就可以引发上海工人自觉的罢工、罢市，谁知结果适得其反。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北京平暴真相的教育和感召下，日益坚定地站到了党和政府的一边，对动乱制造者的怨愤越来越强烈。极少数动乱策划者担心再这样搞下去“会激起民愤”，经开会研究，决定改变策略，组织多路小分队冲击工厂，迫使工人罢工。因为他们认为“工人一天罢工的压力，等于学生十天静坐的压力”。从6月7日起，成批学生小分队便来到了江南造船厂、上钢五厂、大中华橡胶厂、宝钢等一批大厂以及上海柴油机厂等“文革”中的“重灾区”煽动工人罢工，遭到这

些工厂党政组织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抵制。

这段时间里，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还铤而走险，大搞恐怖活动。他们煽动大学生“制造、购买武器”，同党和政府进行“武装斗争”。6月5日至6日，在复旦大学、上海科大、华东化工学院分别贴出鼓动恐怖活动的大字报，煽动学生“抛弃一切幻想，拿起各种武器同伪政府战斗到底”；“自制各种化学、机械武器，自发组织各种行动小组，破坏官僚豪华汽车，打伤甚至杀掉伪军、伪警和各级高级官员，破坏军方设施”；还扬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前进，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前进”。复旦、同济、交大、华师大、外贸学院的一些人甚至公然煽动学生自制燃烧瓶、手榴弹，“搞化学武器”、“爆炸加油站、化工厂”，企图制造大乱。在他们的挑唆下，同济一些学生购置了一批水果刀和西瓜刀。一些学生头脑发热，干出了一系列打、砸、抢、烧活动：6月5日，工大部分学生将公交六场一辆抢修车拦住，砸碎玻璃，砸坏发动机，抢走工具，最后将车身掀翻。6月7日，在江湾五角场，一些学生和社会不法分子将一辆公交75路公共汽车放火燃烧。6月10日，复旦、同济约100多名学生还在“高自联”头头张才等人策划下，组织了所谓“英雄敢死队”，到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示威，“抗议”公安局逮捕上海“工自联”成员。

6月初在上海出现的连续几天强烈的动乱，虽然其势汹汹，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起不了多大作用。6月4日、5日，“高自联”还能先后动员3500到7000学生上街，到7日、8日，要动员几百人都已困难。6月9日，“高自联”在人民广场召开的所谓“悼念北京死难同胞追悼会”，事前他们在

各校作了七八个小时连续动员，才勉强拼凑到4000人。会后，一群人窜到《解放日报》社门口呼口号、烧报纸，并冲击黄浦区政府，用油漆肆意涂抹区党政机构的招牌，群众称这些人的暴行是最后的蹦跳。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北京平暴以后，上海与北京的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曾经企图搞动乱“中心南移”，在上海成立所谓“全国高自联”，继续负隅顽抗。6月3日，上海“高自联”头头张才曾到北京找到了北京“高自联”秘书长王有才，密谋“成立全国高校自治联合会”。王有才说：现在“北京‘高自联’一部分人撤了，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躲了，‘北高联’已没有力量搞‘全国高自联’了，还是把‘全国高自联’设在上海。”6月9日，张才返回上海，原来还想大干一番，当他看到形势剧变，发现上海“高自联”也不行了，便想一溜了之，跑到香港去成立所谓“全国高自联”筹委会。6月11日下午，他公然抗拒市政府6月10日发出的关于取缔非法组织上海“高自联”的通告，拒不向公安机关登记，并在某国驻华使、领馆官员的“陪同”下前往虹桥机场，企图逃往香港，被我公安机关当场扣押。6月10日晚上海“高自联”召开常委会，哀叹“鉴于目前时局”，“我们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华师大“学生自治会”当晚贴出题为“别了，师大人”的大字报，宣布即日起“自行解散”。6月11日，复旦、同济、华东化工等高校“自治会”也纷纷以布告或广播形式，自行宣布“解散”。在这以后几天，上海“高自联”的头头或自首，或转移，或逃窜，至此，上海持续近两个月的学潮至动乱才逐渐平息。

在平息上海这场动乱中，工人阶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6月8日，朱镕基市长发表关于“稳定大局、稳定上海”的电视讲话以后，当天晚上，10万工人和上海干部、市民一起走上街头，清理路障，6月9日清晨，被阻断了几天的市内交通一举恢复，浦江两岸重又展现出一派和平劳动的景象。

上海的动乱之所以能依靠工人阶级而一举得到平息，其决定性因素是北京果断地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从根本上铲除了制造全国动乱的策源地，端掉了他们的“老窝”，也给上海极少数制造动乱的分子以极大的威慑。北京暴乱的真相，特别是一小撮暴徒疯狂残害人民子弟兵的惨象，给了全市干部、职工以极大的教育。上海在处理学潮和稳定社会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时的指示和支持。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没有北京的果断行动，上海的动乱是平息不了的，要求得上海局势的稳定也是很难想象的。

上海动乱已经平息了。这次动乱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五个不能低估”，即：第一，对上海动乱的严重性决不能低估；第二，对上海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严重程度决不能低估；第三，对上海动乱的社会基础决不能低估；第四，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在动乱中对上海的种种渗透破坏决不能低估；第五，对赵紫阳淡化党的领导给上海党组织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决不能低估。我们要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市委第五届八次全会精神指引下，深入开展清查清理工作，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要认真地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继续努力奋斗。

（原载《文汇报》1989年9月21日）

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与山西省城的政治动乱

秦 越

今年5月4日，赵紫阳同志在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这篇讲话的发表，成了动乱急剧升级的转折点。从山西省城的政治动乱发展来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赵紫阳“亚行”讲话发表之前，山西省城的政治形势基本上是稳定的。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以后，受北京的影响，山西省部分高等院校出现了一些大小字报、传单、条幅和挽联，内容主要是悼念胡耀邦同志，也有一些是造谣惑众、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悼念活动结束后，部分高校的个别学生互相串联，传抄、张贴北京的传单和大小字报，还有个别人发表“声明”和演说，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煽动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但是，这些活动只在学校内，并没有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4月26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的发表，揭露了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阴谋，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也教育了广大青年学生。山西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全省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讨论社论精神，澄清认识，统一思想。在这一期间，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制止动乱，稳

定局势成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极少数人为了继续蒙蔽广大青年学生，也改变策略，打出了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惩治腐败、打倒官倒的旗帜。他们散布政治谣言，煽动举行“五四”大游行，声援北京。5月3日晚，太原工业大学部分学生不听劝阻，冲出校园，串联山西医学院、山西财经学院和山西大学的部分学生，于5月4日凌晨游行到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学生的这些行动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多大的响应，反而遭到省城广大工人和市民的斥责。据当时了解，学生的这一举动，仅仅是不愿保持沉默，声援北京学生。当省政府工作人员与学生代表达成对话协议之后，游行的学生即行散去。这一切都表明，在赵紫阳“亚行”讲话发表之前，山西省城出现的张贴大小字报、互相串联和游行示威，是受北京影响诱发产生的。参加这些活动的仅仅是部分高校少数学生，省城的广大工人、市民、机关干部和绝大多数学生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山西省城的事态是平缓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是正常的，整个政治局面是安定的。

5月4日晚，当赵紫阳同志会见亚行代表的讲话通过广播电视发表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从“讲话”中看到了中央内部的态度不一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他们摸到了气候，找到了后台，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山西省城的整个社会舆论和群众心理发生了较大反复和倾斜，高校中迅速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绝大多数学生在“不游行就是不爱国”的思想支配下，纷纷上街游行；少数不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受到耻笑、围攻和孤立，被讥讽为“学贼”；在学潮第一线做工作的政

工干部和教师感到被出卖了，认为再不能站到学生的对立面，做学生运动的“绊脚石”了；各级党委和许多领导干部从中看到中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感到迷惘和不解，许多制止学生游行的措施也难以出手。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已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学潮逐步发展成为政治动乱。其特点是：（一）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从5月5日开始到5月19日，在省城几乎每天都有数起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声援活动，参加的人数从几百人到几千人，最多时达数万人。参加的人员由大专院校的学生扩展到中专、中学生，由学生扩展到文艺界、新闻界、理论界。（二）各种攻击、谩骂中央和省委领导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大量增加，内容更加恶毒、反动，政治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邪。（三）各种非法组织相继出现，学潮向着统一纲领、统一口号、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的方向发展。从5月5日到5月19日，省城陆续出现了“山西高校自治联合会”、“学工会”、“省城工自筹”、“工人党”和“山西一把火”等60多个非法组织。200余名社会渣滓和不法之徒组织了“鸡毛掸子队”，他们扛着门旗、彩旗和鸡毛掸子，喊着口号招摇过市。这些非法组织互相串联，统一步骤，提出了行动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四）行为越来越激烈。部分高校的非法组织抢占校广播站，公开播放“美国之音”，大肆传播政治谣言；连续几次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省城重要新闻单位，挤掉省委、省政府的牌子，挤伤公安干警，向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投掷馒头和标语牌，在省政府门前升白旗；5月16日，部分高校的400余名学生到省委、省政府门前绝食请愿；部分学生卧轨断道，强行登车进京声援，前后进京的学生达5000人；省城13所院校

14000名学生和少数教师在太原市五一广场设置灵堂，为北京绝食“英烈”召开追悼会；在极少数人的带动下，部分高校学生分别到太钢、太重等大型企业进行蛊惑煽动，叫嚷“要把华北地区的电网、煤炭、交通搞瘫痪，逼李鹏政府下台”。（五）极少数不法之徒乘机扰乱社会治安，搞打砸抢活动。5月17、18、19日连续3天，极少数不法分子混在游行队伍和围观群众中，丧心病狂地向值勤干警投掷汽水瓶、砖头、瓦片，疯狂地砸汽车，砸商店和附近居民的玻璃，肆无忌惮地在人群中公开侮辱公安干警，调戏妇女，破坏交通隔离墩。3天中打伤公安干警92人，砸坏各种车辆63辆，使省城的治安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更为严重的是，在5月10日发生了冲击第二届“两会一节”开幕式的严重政治事件。山西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and 民间艺术节（简称“两会一节”）是山西省两年一度的大型涉外活动，是把经济技术洽谈、对外经济贸易和民间艺术节结合在一起，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合作的有益尝试。经过几年的实践，已成为山西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渠道，对山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为办好今年的“两会一节”，山西省委、省政府以及各地、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作了周密的计划和精心准备。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还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多次向学生打招呼，指出“两会一节”是重大的涉外活动，届时将有千名外商、外宾前来参加，务请同学们从山西大局出发，确保“两会一节”的正常举行。但是，受赵紫阳五四“亚行”讲话的影响，极少数人有恃无恐。在他们的煽动下，4000多名学生不听劝阻，强行冲开三

道防线，冲入“两会一节”开幕式的文艺表演队伍中，高呼“一节两会，官倒聚会”、“一节两会，浪费浪费”等口号，在数十万围观群众中来回穿梭，致使隆重的开幕仪式中途被冲散。中午，数千名学生冲破武警防线，挤伤十几名武警战士，强行冲入“两会一节”的主会场迎泽宾馆院内，要求面见省长。随后又多次冲击迎泽宾馆大厅。部分学生向公安干警扔面包、馒头、鸡蛋，把宾馆院内搞得污秽不堪。有的学生甚至高喊“打倒洋倒”、“两会两会，行贿受贿”的口号，在接待外宾、外商的迎泽宾馆、山西大酒店外游行示威，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当天下午，就有部分外商中断谈判离开太原；没有离开的也感到恐慌，心理压力较大，对山西的投资环境产生怀疑，洽谈的项目和进出口商品交易都受到了一定影响；一些港台和国外记者，在迎泽宾馆楼上拍摄冲击的现场照片和录像，发往海外，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对学生冲击“两会一节”开幕式的行为，山西省城广大群众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痛心。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学生游行队伍的冲击和干扰，今年的“两会一节”将会收到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赵紫阳同志在“亚行”讲话发表后，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山西省委、省政府虽一度感到困惑，但没有从“四·二六”社论的原则立场后退。一是组织党员、干部和公安干警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用社论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站稳立场，顶住逆流，明辨是非，自觉做到不游行，不围观，不听信和传播谣言。二是深入各高校积极主动地做争取广大青年学生的工作，揭露和孤立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三是充分发挥宣传

舆论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四是狠抓廉政建设，表明省委、省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五是深入到省城重点工矿企业，组织“护厂队”，稳定工厂和工人队伍。六是抽调力量，加强对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的保卫工作。七是采取坚决措施，严厉打击搞打砸抢的不法分子。5月17、18、19三日，连续三次封闭现场，集中抓捕打击300余名不法分子，刹住了暴徒的嚣张气焰。通过这些工作，较早地制止了省城的动乱，稳定了全省的大局。在后来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时，山西的局势已经基本稳定。

以上分析表明，赵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是山西省城由学潮到政治动乱的转折点。它在客观上起到了使事态逐步升级的恶劣作用。完全有理由说，没有这篇讲话，就不会有山西省城的政治动乱。要不是省委、省政府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动乱，山西省城必然会出现更大的动乱。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8月29日）

一场闹剧

——“浙江省政府降半旗”事件真相

钱崇芳

今年6月初，北京刚刚平息反革命暴乱之时，“美国之音”多次广播了杭州一个学生的电话录音，广为散播所谓“浙江省政府降半旗”的谣言，一时间迷惑了不少人。那些动乱制造者们立即据此散布浙江省和中央意见不一的谣言，企图挑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在全国各地煽起更大规模的动乱。

(一)

6月6日下午，浙江美术学院85级国画系学生张伟平打长途电话给“美国之音”，根据道听途说，胡乱谈了一通所谓“杭州目前（事态）的最新发展”。其中最后一点（第五点）称：“6月4日早晨，浙江美术学院游行队伍越过被阻的道路，游行到浙江省人民政府，强烈要求省政府站在人民一边，并强行使省政府下半旗，以哀悼在北京死难的爱国同胞。”

正在加班加点进行反华宣传的“美国之音”，对张伟平的所谓“报道”如获至宝，当即录了音；并于当天晚上连续多次播放。

但实际上，所谓“降半旗”完全是极少数人搞的一场丑

恶闹剧。

(二)

最近，记者走访了几位当时现场的目击者——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王柏荣、信访局副局长张素琴以及省委、省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用铁的事实揭穿了“美国之音”传播的谣言。

当天始终都在现场的王柏荣说：“在动乱期间，省委、省政府机关大楼，是高校学生冲击的主要目标之一。浙大、杭大、美院等校学生，经常到这里来‘游行请愿’，但都被劝阻在大院门外。6月5日中午11时左右，浙江美院的一批学生，大约有300多人，来到大楼大门口，还有尾随的不少围观者。学生队伍前头有一辆三轮车，装着扩音器，一些人正搞什么‘抗议’、‘演讲’，还带来十多米见方的几块白布，其中一块写有煽动性标语的白布上，有许多红色的签名，一些学生声称这是‘血书’，是割破自己的手指用血签的名（据有关部门化验，绝大部分是用红墨水写的）。当时，学生受到了大楼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的劝阻。为保证机关正常的办公秩序，有关人员被迫暂时关上了铁栅大门。学生进不了大院，就聚集在大门前哄闹。有几个学生爬上了铁栅大门，去吊挂那块所谓用‘血’签了名的白布。这时，人群中有人看到了门楼旗杆上挂着的国旗，就大声叫喊：‘下半旗，下半旗！’其中浙江美院一个身穿白色短袖T恤衫的学生，翻爬到门楼顶部旗杆旁，动手解开升旗绳索。省政府所在地的国旗是24小时固定悬挂的，扎得很牢，那个学生猛力地去拉，只把国旗扯下一截，斜歪在旗杆上。在场的警卫和工作人员

都对这种污损国旗的违法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为了避免发生伤亡流血事件，没有立即强行制止。学生在这里闹了一个来小时离去以后，我们立即使国旗恢复正常。”

这就是所谓“降半旗”的真相。

(三)

这一事件虽然只是这场动乱的一个插曲，但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思考，吸取教训：

——“美国之音”自我标榜“客观、真实”，完全是欺人之谈。所谓“降半旗”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之音”收到张伟平生造的所谓“报道”，不经核实，迅即广播，显然妄图在中国煽起更大的动乱，这哪有什么“客观、真实”的影子？

——某些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的大学生，竟头脑发昏到连对国旗都不知道尊重，实在可悲。难怪人们谈及此事便连连呼吁：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加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

——制造谣言的张伟平出生在工人家庭，他在浙江美院的学习成绩也不错，是应届毕业生，按初步分配方案将到一所大学任教。但是，他却干出了为“美国之音”的反华宣传效劳的勾当，走上了犯罪道路。现在，张伟平已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为什么张伟平会在政治上走上邪路，不也值得人们深思吗？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8月31日)

一起“最轰动”的谣言制 造者自曝内幕

· 诸 炎

在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每天谣言蜂起。人们当还记得，当时最有“轰动效应”的一起政治谣言，就是所谓“邓死、李伤”。这股恶浊之风究竟起穴何处呢？

香港的《百姓》杂志，在7月1日刊出一篇报道，透露了造谣者的部分真情。

这篇报道说，“6月8日，刚由北京归来的哈佛大学博士生黄靖，在华盛顿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新闻节目访问时，突然‘自曝内幕’，透露了他和他的朋友是制造李鹏被刺及邓小平死的谣言的‘始作俑者’。”

“据此间（按：指美国）中文报章报道，当时节目主持人一脸惊异，插嘴追问黄靖：‘你制造的这个谣言？’”

“黄靖答说：‘一点不错，在两天后，便有李鹏的消息。现在李鹏已露面。同时，我们和另外一些人也制造了邓小平生病或死亡的谣言……’”

“节目主持人又追问：‘我们都把这两项消息当成新情势的发展来报道，结果这都是你们造的谣言？’”

“黄靖说：‘不错……’”

《百姓》杂志的这位作者找到了黄靖，听“黄靖叙述事

件始末”。原来，黄靖于5月23日在美国与北京“高自联”建立了“热线电话”。5月29日，黄靖飞到北京，“即和朋友取得联系”。“有人征求黄靖的意见，是不是造一个谣，就说李鹏被他的卫士打伤了。黄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李鹏再次亮相。所以他表示赞同。当时是5月30日。”黄靖又对作者说：“至6月1日，这个谣言已迅速传遍北京城，而且越传越走样。有的传闻甚至说李鹏死了或已遭邓小平扣留。由此可见造谣者不止一人。”黄靖又说：“从客观效果来说，这条谣言的确已达到目的”。

看得出，黄靖在讲述他们的这段造谣“胜绩”时，是颇为坦率而又自鸣得意的。可是，当他们“自曝内幕”的新闻刊布出来后，他又感到“无限的懊恼”了。他懊恼什么呢？

黄靖对《百姓》的那位作者说：“从大处着想，此举使今后从学生内部传出的消息，其可靠性将受到传播媒介的怀疑，这是一个最致命伤。”

黄靖认为“自曝”造谣内幕是“犯了个错误”。他说：“我认为我的错误是没有很好地控制场合。当他（美国电视记者）谈到北京的情况很复杂，各种谣言都有时，问及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就举例说：我的朋友和我曾经制造过一个谣言……后来他又问了一句：你想承担这个责任吗？我就答了一句‘YES’。这是非常致命的。”

YES，这的确是“非常致命”的。他们袭用戈培尔的老谱，以造谣为能事，把谣言当石头，漫天乱飞。如今内幕一经曝光，人们便一切恍然了。谣言他们还要造的，可是——还灵吗？

（原载《北京晚报》1989年8月16日）

煽动动乱和暴乱的“北京之音”

——看！人民大学非法学生 组织广播站干了些什么

郑 义

在动乱走向反革命暴乱的这段不平静的日子里，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人们充分领教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北京之音”广播站的丑恶表演。这个自诩“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北京之音”与万里之外的“美国之音”遥相呼应，不仅在造谣手法上如出一辙，就连它的呼号“北京之音”都是效仿“美国之音”而出现的。实际上它从开始就已堕落为“美国之音”的传播站了。这个自封为“民主”的电台，一点也不讲民主，不仅盗用了人民大学的名义，而且盗用了北京人民的名义。请看他们是如何假借民主之名来践踏民主和法制的吧。

5月初，“北京之音”强占了中国人民大学临街的学生宿舍三楼，在楼顶外非法安装了9个高音喇叭，每天以最大音量广播数小时至十几个小时。在“北京之音”的鼓噪声中，每天招引了成百上千人聚集在人大校门周围收听，严重地堵塞了交通，吵得附近居民昼夜不得安宁。

“北京之音”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颠倒黑白、造谣

惑众，起到了指挥、煽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5月19日至21日，“北京之音”连续广播50多个小时，先是造谣说北京将实行“军管”，继而煽动各界“罢工、罢市、罢课、罢教”，“进行最后的斗争”，为反革命暴乱大造舆论准备。接着，它又指挥调动所谓的“纠察队”到万寿路、双井、公主坟等地拦截军车。在“北京之音”的煽动和指挥下，5月20日凌晨1时左右，煽动者在人大校门口强行拦截十几辆卡车和面包车载着“纠察队员”开往一些路口拦截军车。他们还制造谣言说，“人民大学要被军管”，煽动人们堵住校门，保护“北京之音”这个了不起的“宝贝”。在戒严令发布后的5月21日夜，“北京之音”又造谣说，“政府”将“腾出北京所有的监狱，抓20万人”；煽动一些人“收集棍棒”，对付执行戒严任务的人民解放军；指挥所谓“纠察队员”“随时检查过往车辆，包括救护车”也不放过，公然煽动一些人抗拒、破坏政府戒严法令的实施。

6月3日凌晨2时，“北京之音”造谣说，一辆警车在木樨地撞倒“四位学生”，声称“市区军车调动频繁”，“要求人大的同学和周围群众提高警惕”，煽动不法之徒掀起反革命暴乱。直到当日深夜，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不断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首都发生反革命暴乱的《紧急通告》以后，“北京之音”仍在煽动人们前去阻拦军车，“欢送”一批批“勇士”开往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人民大学死亡的6名学生，与“北京之音”的不断煽动是分不开的，“北京之音”罪责难逃。

6月4日早晨，在“北京之音”的煽动下，聚集在人民大学校门前的一些不法歹徒，在半小时之内，拦截了两辆军

用车辆，其中一辆某建筑科研单位借用的面包车被拦截后，司机遭受殴打，另一辆第二炮兵某部的小轿车上的解放军干部也遭受殴打。之后，歹徒放火烧毁了这两辆车，以发泄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军队的刻骨仇恨。

“北京之音”在进行反革命造谣煽动时，作贼心虚，常常加上“未经核实，供参考”，或“我们将加以核实”等说明，妄图推脱罪责。有时，它又明目张胆地直接播放“美国之音”，时而声称“刚刚接到香港人士的来电”，时而又声称“来自美国加州的电传”。然而谣言毕竟是谣言，有的谣言连一分钟的寿命都没有。5月19日夜，“北京之音”先是广播：“人大西门开进数十辆军车”，紧急调集“纠察队员”立即增援西门，在余音未消之时，“北京之音”就不打自招地说：“刚才播出的消息纯属谣传”。这些不攻自破的谣言，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正直人们的强烈反对，就连曾受到“北京之音”蒙骗的学生都感到无法忍受“北京之音”撒下的瞒天大谎。5月23日早晨，一个曾是“学生敢死队员”的同学向校党委打电话，强烈要求“制止“北京之音”不负责任的煽动性播音”。这位学生说：“过去支持他们，但现在发现他们不再是爱国的，而是煽动社会动乱。”也有人曾找到“北京之音”的造谣者，向他们严正地指出，你们这样公开造谣煽动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而造谣者竟厚颜无耻地说：“这是斗争的需要，发动群众的需要。”这就如实暴露了这伙“民主自由斗士”的真正面目。

“北京之音”也是那些指挥煽动反革命暴乱者的重要据点之一。一些“神秘人物”不断出入于“北京之音”的编辑室，还有一些人直接上阵，组成黑班子为这架造谣机器编撰

谣言。5月19日21时58分，一个自称中央某机关的人更是直接出面广播说：“22时中央在某地开会”，“祖国已经到了最危急时刻”，煽动人们“进行一切合法形式的斗争”。5月22日夜，“北京之音”广播了包遵信、严家其、苏晓康等12个所谓“精英”的公开信，煽动人们去参加第二天的“知识分子大游行”，不断升温，使动乱升级，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北京之音”不断地变换花样，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用不堪入耳的语言疯狂地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格，谩骂政府。在整个动乱和暴乱期间，“北京之音”始终把攻击矛头指向党中央，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5月24日下午，“北京之音”竟然公开煽动浙江籍、安徽籍在京人士去围攻两省驻京办事处，“抗议各省、市拥护李鹏5月19日的讲话”，妄图挑动地方人民政府反对中央。

“北京之音”也是反动组织“北高联”的一个重要宣传鼓动中心，它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北京之音’对‘北高联’负责，受‘北高联’指挥，同时为附近数所高校广播站提供稿件”。在他们非法占领的楼内设置多重岗哨，非法查验进入楼内人员的证件，每天多次查验楼内人员的身份。这也充分表现了他们色厉内荏的虚弱本性。

6月4日下午，操纵“北京之音”这架造谣机器的一些不法分子，在声嘶力竭地播出决意与人民对抗到底的“誓词”后，仓皇逃窜。这个肆意践踏民主与法制的造谣机器就此土崩瓦解了。

从他们在动乱和暴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表演中，人们可

以清清楚楚看到这些要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主斗士”，如何无法无天地肆意妄为，如何煽动、制造思想混乱，如何造成一时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分清是非、提高警惕，再也不能听任这种破坏民主法制的极端民主化的破坏行径再度发生了。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7月15日）

“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对外广播站” 在暴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名知识分子

《北京日报》编者按 下面发表的是一名知识分子写给市有关部门的信。他说，作为一名“听众”和目击者，有责任公开揭露所谓“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对外广播站”的真实面目。

我是一名知识分子，住在北师大附近。自5月初“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对外广播站”非法建立以来，我们这些附近的住户都成了被广播噪音折磨的受害者。这个广播站是“高自联”的一个重要宣传鼓动站，谣言制造所。他们用多个高音喇叭，每天多次向外广播，经常播放到深夜12时以后，有一次竟然广播到凌晨3时多。他们完全不顾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管制噪音、加强城市环境保护的规定，肆意践踏附近居民住户享受安静生活的权利，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攻击党和政府，用造谣的手段中伤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广播站口口声声要争取“民主”的权利，但却完全不尊重居民平静生活的权利。其广播噪音之大，不但使附近居民当时无法休息，就是在他们停止广播后的两三个小时内由于神经紧张还是难以入睡。

这些播音员们由于罢课，尽可以白天睡大觉，把精神养

足以备晚上有足够的力气广播，附近居民们当然无法和他们相比。

他们经常广播一些据说出自“美联社”、“路透社”以及“美国之音”的消息，且不说为什么总是援引这些外国人的新闻而以为荣，而广播内容之荒诞，只要有一些基本知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诸如“国际上已有30多个国家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中国外交部已宣布脱离中央政府”之类。这个广播站的主持者们，不能说连这样浅近的政治常识都不懂，那么他们广播这些“最新消息”是什么居心？有时还发表些惊人之笔，什么“某某地方的工人已进行罢工支援学生”之类，以煽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心理，但这些都一一被证明不过是些恶意造谣而已。他们宣传格调之低下，也令人难以接受。他们用十分污秽的语言谩骂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十分下流的人身攻击和人格污辱。他们攻击政府是“腐败政府”、“反动政府”、“伪政府”。但就是这个被攻击得一无是处的政府，总是以大局为重，从爱护绝大多数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出发，在一些人绝食的时候提供了大量医护工作和成百辆为他们遮蔽风雨的大客车，以至在长达六七天的绝食中没有一个人死去。在他们静坐示威时，又提供了食水被服。执行戒严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受到不明真相的人殴打侮辱时，在发展到发生大量焚烧军车和公共汽车、残害指战员、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反革命暴乱之前，始终坚持不予还击。这些都说明了什么问题，不值得深思吗？

6月3日晨至6月4日下午6时余，反革命暴乱期间，这个广播站连续不停地广播了36个小时，狂妄嚣张到了极点，但也正好暴露了这个所谓的“广播站”是个什么角色。

从6月3日上午开始，广播中不断发出号召，指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去堵截军车，阻拦戒严部队行动，并告诉人们把军车的轮胎扎破使之不能开动。下午不断播出在某某地点有多少辆军车被包围，有多少军人被打，以鼓动围观群众的激动情绪。所有驶过北师大门口的车辆都被强行检查，军车被扣押，以致造成交通阻塞。

入夜以后，成千的人被吸引聚集在北师大门前。在市区情况逐渐紧张后，吾尔开希俨然以“英雄”的面目登场了，他声嘶力竭地叫嚣要和政府血战到底。不久传来天安门广场情况紧急的消息，广播站又煽动群众去天安门支援，由吾尔开希带队前往。广播站指使围观群众堵抓和强迫过往车辆运送人去天安门。接着，又煽动人们去北太平庄强夺22路公共汽车，大约有四五辆公共汽车被抢开回来。

当他们得知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戒严部队在强行前进中对暴徒进行反击时，广播站立即造谣说已有7000人被打死。反应之快，数字之肯定，令人吃惊。头脑清醒的人不难看出他们造谣的企图。这时有一个自称是“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长”的人，气急败坏、咬牙切齿地大声喊叫“对解放军要见一个杀一个”，并说要“全市都罢课、罢工、罢市”。接着，一个个所谓“惨案的目击者”纷纷登台表演，在他们的描述下，西长安街已经是血流成河，尸横遍地。他们极力鼓动人们去参加这场反革命暴乱。天安门广场清场后，他们又大量播发了所谓有多少学生惨死枪弹之下，坦克一下子就轧死了十多名学生之类的消息。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想拉响北师大主楼顶上的防空警报器，增加全市的混乱，但终未得逞。他们征集各种玻璃瓶，征集汽油、柴油、煤油甚至油漆去制

造燃烧瓶。他们详细讲解了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还指出坦克和装甲车的薄弱部位。他们还提出如果有戒严部队的大队来到，就要疏散隐蔽到宿舍里去化整为零，如果是小股部队，就把他们消灭掉。那个女广播员忽而咬牙切齿地咒骂，忽而语音呜咽，表演得淋漓尽致。

大约在第二天凌晨4时左右，忽然传来“有一队警察开向北师大”的消息，他们立刻部署让人们把砖运上屋顶准备迎击。后来又改变策略，将人们撤向校园内，紧闭校门，但人们始终未见所谓警察的踪影。他们还播了他们的“英雄”吾尔开希和4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布“有限定期绝食”的人已经平安脱险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有枪！因为广播中清楚地播出“现在还有三支手枪没有交回来，要马上交回来”。

自6月4日清晨开始，他们还播出了他们的要求：实行多党制；实行议会制。从这两点不难看出他们要求的实质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宪法，反对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到下午5时多，他们突然偃旗息鼓地停止了广播，连夜拆除了喇叭。这个以造谣蛊惑为手段，以煽动制造暴乱为目的的广播站就此寿终正寝了。但是，这个所谓的广播站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不是已昭然若揭了吗？

（原载《北京日报》1989年6月17日）

看“谣言政治”是怎样害人的

——“清华人之声”广播台的拙劣表演

时 录

一场以学潮开始的动乱，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如此快的速度，是与谣言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在此期间，那些非法组织设立在一些高校的非法广播台不断地传播各种谣言，宣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种种谬论，甚至直接发号施令，指挥青年学生参与非法活动，为动乱和暴乱推波助澜。非法组织设立在清华大学第十饭厅前的所谓“清华人之声”广播台所起的作用就是如此。

(一)

“清华人之声”广播台从4月24日设立起，就呼喊着“要民主”、“要自由”、“要重新评价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口号，并不断地用所谓“4·20新华门血案”、“4·22天安门广场的欺骗”、“××下台”等谎言和鼓噪来煽动青年学生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5月13日，广播台的负责人之一、“高自联”常委周峰锁得到了某些公司的资助，为“清华人之声”安装了成套的广播器材，并将两个高音大喇叭架在了大饭厅屋顶之上，每天不分昼夜，有稿即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5月20日以后，“清华人之声”更加露骨地挑唆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清华学生大都意识到事情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纷纷返回了学校。“清华人之声”却喋喋不休地传播各种谣言，什么“××政府不惜以20万学生的生命来巩固其权力”、“北京监狱已经腾空”、“各大医院外科病房已空出”，什么“徐帅、聂帅写信给中央，反对戒严”、“邓颖超写信给中央，反对戒严”；还有什么“采访赵紫阳子女，赵的儿子说：‘我可能被捕，有生命危险。’”等等。在他们的蛊惑下，清华园里顿时出现了新的紧张空气，一些刚刚冷静下来的学生又被“激怒”了，人们围在广播站附近议论纷纷。

继而，“清华人之声”开始调兵遣将，煽动学生们去堵截部队、拦阻军车了。大喇叭一会儿叫喊：“部队已开到××地”，一会儿又惊呼：“运兵的火车已到了五道口”。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一些学生蜂拥而出，扯起了“反对戒严”的大旗。

一支学生纠察队赶到了五道口铁道口，不由分说，就把守道口的老工人一把推开，强行拉开了红灯，一辆正在正常行驶的客车见状马上紧急刹车。这些“纠察队员”们又无理地要求查车，遭到列车长的严厉拒绝。他们不顾司机和列车长的一再反对，就是堵在铁道上不让列车行驶。十几个“纠察队员”还不顾一切地强行爬上火车，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非法搜查，结果不仅没看到一个军人，还受到了旅客们的责骂。由于这辆列车意外被截，停驶近半个小时，造成了北京沿线一连串的火车误点、改点。

拦截火车的学生们刚刚回校，“清华人之声”又故技重演，将谣言从地下造到了天上，胡说什么：“解放军已乘飞

机抵达沙河机场。”

在“清华人之声”的煽动下，另一批同学又被欺骗，赶到沙河机场，结果又扑了空。

(二)

随着戒严令发布后北京局势日趋平稳，清华大学毕业班的学生90%都恢复了毕业设计，一些低年级学生也开始准备复课。天安门广场上，清华大学的旗子下只剩下了十几个人。

眼看人心思定，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便跳到了前台，公开煽动、指挥动乱升级。“清华人之声”也随之发起了一个新的“宣传攻势”，连篇累牍地广播起《首都知识界告全国同胞书》、《高自联常委会决议》、《工自联告全国工人书》等，公然诬蔑现政府是“伪政府”，煽动人们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李鹏政府的军管阴谋”。“清华人之声”还选中了两篇内容极其反动、恶毒的大字报反复播放。这两篇大字报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贬义词，社会主义这个词不能永远性地把它当作褒义词来看待了。”并公开宣布：“我们曾指望党内斗争分化，以赵为首的改革派占上风。但事与愿违，反动势力暂时领先了。”于是他们干脆大喊：“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及其政府”，“废除一党专政”、“打倒军阀政府”。甚至鼓动“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界其他爱国力量”，“组成人民军的武装”，还可以“去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力量在内的各种力量”来进行斗争。“一点一滴地破坏，加速政府的垮台”。

“清华人之声”就这样成了极少数阴谋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策划者的舆论工具，它不仅搅乱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还

将他们推上了违法之途。5月25日，“清华人之声”广播了一个“招聘书”：招聘“有志者、有勇者、有能者”组成宣传队，到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去宣传、大串联，并许诺给予“津贴”。6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审了反动组织“工自联”的头头以及流氓团伙“飞虎队”的一些成员。“清华人之声”居然播出了“十万火急”的通知，鼓动学生“紧急行动起来”，“到公安局去抗议静坐”，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跑去冲击了市公安局。

(三)

6月3日，这场风波的性质已转为反革命暴乱。在此前后，“清华人之声”的煽动更加疯狂，指挥更加频繁具体，完全成了敌对势力向党和政府进攻的一个黑据点。

6月2日午夜，“清华人之声”的广播打破了校园的沉静，大喇叭一遍遍地高声造谣：“一辆开路的武警吉普在木悻地要闯入市区，压死了4人。”整个校园沸腾了，学生们仨一群俩一伙地往校外奔。3日中午，“清华人之声”又突然发出了“紧急报告”，说是“在西单劫持了一辆军车”，又造谣说“解放军化装成了地痞流氓”，“带着菜刀、钢丝绳等”，“是为了制造事端，嫁祸于学生”。在这些谣言的蛊惑下，从中午开始，许多学生纷纷奔向了通往城区的各个路口去拦阻进城的戒严部队。

3日晚，“清华人之声”的反革命煽动到了顶点，从11时开始，声嘶力竭的呼号彻夜不断：“他们（政府）动手了”，“向人民开枪了”，“大学生流血了”……不明真相的学生再也呆不住了，数千人一下子涌出了校门，有的拆下

铁床栏杆上的铁棍，有的抄起带铁齿的木杈，还有的举着玻璃瓶，冲动地向木樨地、西单、天安门等地奔去。在这次暴乱中死去的4名清华学生，可以说都与这些广播有直接关系。事后，不少学生气愤地说，现在真正知道了什么叫舆论杀人。

(四)

“清华人之声”能影响一批听众，原因之一是它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自称代表民众之声，并定时转播“美国之音”。事实上，“清华人之声”并没有反映广大清华师生的意愿，更不允许任何自由。

“清华人之声”只允许有一种声音，那就是鼓动动乱。它对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稿件，对各种非法组织的消息，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谓“精英”人物的讲话等有闻必录；而对党和政府的声音却恨之入骨，学校广播台播放人民的呼声，他们就数十次地剪断学校广播系统的线路，并几次冲砸了学校广播台。他们任意造谣，随便乱说，却不允许任何人批评，有的教师前来劝导学生复课，他们破口即骂“说的不是人话”。有一名学生堵军车回来后想谈谈想法，他们立刻请他坐在喇叭前直播，但当听到这个学生说“希望大家不要再去堵军车了”时，便暴怒起来，将这个同学连带推赶了出去。

一场惊心动魄的学潮——动乱——暴乱结束了。经过这场斗争的首都大学生们对一些人宣扬的所谓“新闻自由”有了切身的感受。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类似“清华人之声”广播的俘虏，难道这不应该深刻地进行反思吗？

(原载《北京日报》1989年8月31日)

动乱中的大漩涡

——北京大学50天素描

北京大学 严仲文

在刚刚过去的这次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北京大学的极少数人充当了非同一般的角色。尽管北大广大共产党员、不少干部、教师和学生对动乱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但是由于各种敌对势力纷纷插手北大，使北大成为动乱中的大漩涡。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北京大学50天来发展变化的轨迹，把动乱制造者及其幕后策划者的拙劣表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下午2时左右，北大就有人在消息正式公布之前抢先贴出挽联和大小字报，搞了一个突然袭击。

形势发展得非常快。短短几个小时，贴出的挽联和大小字报就超过100份，其中不少根本不是为了悼念，而是借题发挥，借机发难。如有的大字报写道：“政府无能，社会腐败，政治专制”，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另有一张《呼吁》提出“对加在胡耀邦同志身上的夸大不实之辞应予以公开澄清”。矛头所向，一目了然。一时间，校内外

到北大三角地看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外国记者、港台记者也纷纷来到北大。

4月16日到17日，大小字报的数量仍在急剧增加，攻击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也明显增多。有的公然提出要“实行大选，确立议会民主，实行三权分立”，有的用十分恶毒的语言攻击说：“中国的人们是生活在幽灵的俯瞰下，一只看不见的手攫住我们的咽喉，消灭我们的视听，摆布我们的命运”，有的胡说：“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狂叫：“中央政治局五人及总理滚蛋”，气焰十分嚣张。

4月17日上午11时25分，王丹在三角地为购置花圈募捐，11时50分，李淑娴也出现在三角地，给王丹捐了款。还有人暗地里提供410元经费，制作了一面长十几米、整幅布宽的挽幛，上面写着“中国魂”三个大字。临近午夜时分，“中国魂”突然在三角地附近的28楼挂出，顿时引起群众一阵情绪上的骚动。午夜，王丹带领千余名学生，以“中国魂”为前导，呼喊“要民主、要自由”、“推翻一党专制”、“打倒独裁”、“打倒官僚政府”等口号去天安门游行。

4月18日凌晨5时多，游行的学生到达天安门广场，6时20分，王丹带领100多人到大会堂东门外静坐，郭海峰等3人作为代表要求全国人大负责人出来接见，提出七条要求，其核心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彻底否定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平反在两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参加静坐的学生由于步行了几个小时，此时又饿又累，有点坚持不住了。王丹见此情景，赶忙于7时半给李淑娴汇报情况，并要求招呼一些学生去天安

门声援。李淑娴要王丹“一定坚持住”，并匆忙把王丹等人提出的“七条要求”等内容抄成大字报贴到三角地，并鼓动学生前去增援。据李淑娴自己说，这一天她和天安门广场通了三次电话，其中两次是她与王丹的通话。

值得注意的还有，4月17日下午，在三角地贴出一份题为《强烈要求》的大字报，要求中共中央“为胡耀邦公开平反昭雪，作出公正的评价”，“公开纠正反精神污染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4月20日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宣读的11条基本纲领，也是把这两点作为第1条和第2条的内容。

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死死抓住“评价胡耀邦是非功过”和“否定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大作文章呢？他们是把这两条作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突破口和这次行动的第一步骤，最终实现“多元政体”和“精英政治”（王丹语），“实行多党制”（熊森语）。

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学潮从一开始就非同往常，是有预谋、有纲领、有幕后指挥的。

王丹在3月初就曾与人议论，认为今年会乱起来。4月5日，他在“民主沙龙”上说：“今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形势非常有利，整个知识界都感到会有事情发生。”4月21日，北大一名学生贴出《原来是个阴谋》的大字报，大字报揭发说：“原来，运动早有安排。第一步悼念胡耀邦，顺便提出政治要求。李淑娴老师说，要把为胡平反放在第一条，这样他们就不好说什么了。第二条也别提为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受挫、受批判的知识分子平反，那样太脱离群众，也易引起误解，好像方励之老师参与了。再有群

众最恨腐败，就用这一点攻击他们，别直接提反四条。第二步，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才能唤起同情心，特别是女生，心软。就说警察专打女生，也能引起男生的‘汉子感’。第三步，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更大了，还能推向全国。第四步，五四达到最高潮。”

(二)

王丹之流很清楚，要想达到他们的既定目标，必须建立组织，这样，从近期看，可以壮大队伍，形成力量；从长远看，可以为实现“多元政体”奠定基础。他们还总结了以往学潮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组织”，因此，从4月19日到4月25日，把活动的重点放在筹建组织上。

早在4月17、18日，就有人贴出大字报，提出“各校要成立学生自治会，全国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体”，还有人出谋划策：“要搞臭团委和学生会，这样他们就没有帮手了”，金观涛也有三点建议：一是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成立组织非常有利，二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应当首先联合起来，三是必须成立组织。

这些建议正中王丹之流的下怀。4月19日晚，王丹主持了第16次“民主沙龙”，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讨论成立组织问题。说是讨论，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其实他们早已定好人选，当场就端出了由丁小平、杨涛、王丹、杨丹涛、熊焱、封从德、常劲等7人组成的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并决定，从4月20日起由“筹委会”领导一切学生运动。会上，有人提出“北大筹委会应扩大为北大清华联合学生运动

筹委会”，封从德、熊焱等人当即作为北大代表与清华大学联系。次日中午，熊焱打着“高校青年联合起来”的牌子来到清华进行宣传煽动。成立“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北大在首都高校中是第一家。此后，各校纷纷效仿，进而成立了非法组织“高自联”。

“筹委会”成立以后，所属的各部竞相招兵买马，一些系相继成立“分筹委”，乱哄哄闹得不亦乐乎。

为了使“筹委会”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又于4月24日擅自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结果由于发生内讧不得不匆忙宣布“筹委会”接管校学生会、研究生会的职权而草草收场。

王丹是一个留级生，只是由于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才被国内外敌对势力看中。在学潮前，他与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就频繁接触，并且多次接受海外记者的采访。在这次学潮中，他更是上窜下跳，十分活跃。他以为，“筹委会”的成立，为实现其当“学运领袖”的野心创造了条件，于是在19日的“沙龙”上公然声称要领导全市以至于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当天晚上，他就给外地大学发电报，说什么全国学运的指挥中心在北大，通报4月22日要在北京举行游行，要求全国大学声援，当天罢课一天。

“北大筹委会”成立后，学潮立即升级。

4月20日，王丹等人利用所谓“新华门血案”大作文章，进一步煽动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所谓“新华门血案”完全是他们蓄意炮制出来的谎言。一个学生曾问王丹：“我亲眼所见没有血案，为什么要说谎呢？”王丹毫不隐讳地说：“这是斗争艺术”。另一个行动的中坚分子也说：“新华门前最来情绪的就是拱起警察的火，只要警察无奈，一动手我

们就有了借口，把事情搞大。”他还说：“只有这样才能号召同学。”

4月22日，他们又演出“跪递请愿书”的闹剧（3名下跪者中有2名是北大的），同样是为了扩大事态，蒙骗煽动群众。

4月24日晨，“北大筹委会”号召全校无限期罢课，派人把守在教室门口，阻止前去上课的学生和教师。

4月27日、5月4日，“北大筹委会”连续参与策划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把动乱推向高潮。

对“北大筹委会”这些倒行逆施，北大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和师生非常愤慨。有的老师和学生谴责说：“你们不上课，有什么权利剥夺别人上课的自由？”某系领导明确表示不同意学生上街游行，当学生到该系借系旗时，当场遭到严厉拒绝：“你们根本不能代表我们系。”后来发现学生偷偷把系旗拿走，系领导硬是追到师范大学把系旗追了回来。学校也于4月26日反复广播通告，劝阻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全校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工作秩序。学校还深入做一些骨干分子的工作。以王丹为例，在学潮和动乱期间，历史系1次找他谈话。4月25日，学校又安排一位教授与他谈话一个多小时。真是做到仁至义尽。但王丹之流仍一意孤行。

“筹委会”十分重视利用宣传工具制造舆论。在几次企图“借用”校广播台遭到拒绝后，于4月23日在北京高校中第一家成立了“筹委会广播台”，开始规模较小，后得到海内外敌对势力的资助，规模越来越大，六七个高音喇叭整天鼓噪不止。这个广播台除播送通知和传递信息外，还公开播放“美国之音”等外台广播，造了大量谣言。它还开辟了“自

由论坛”节目，为“精英”们和校内外一些人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煽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提供了讲坛。4月29日，“筹委会”又非法出版了《新闻导报》。一“台”一“报”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发挥了十分恶劣的作用。“筹委会”还大量印制、散发反革命传单，组织演讲团四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并且连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利用海内外新闻媒介扩大影响，仅4月24日至5月4日，就举行5次之多。

(三)

5月4日游行后，宣布5月5日复课。北大也继4月26日之后于5月4日再次发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通告，得到许多同学的响应。据统计，自5月5日到绝食前一天的5月12日，北大开课教室均达50%以上，各开课教室到课率也在1/2至4/5不等。其他院校都宣布结束罢课，有的学校的“筹委会”自行解散。但赵紫阳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公布以后，有人煽动说：“政府软下来了，学运刚兴起，不能停下来”，王丹之流更坚定了顽固到底的决心。“北大筹委会”置校规和广大同学的正当要求于不顾，始终不肯宣布复课，并且加紧活动，蓄意再次掀起动乱高潮。

从5月5日到5月11日，“北大筹委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大肆压制不同意见，为继续罢课制造舆论，胡说什么“全国看北京，北京看高校，高校看北大”，现在的北大“是中国最后一块根据地”，“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根钉子。”他们还威胁复课的同学说：“假如我们这颗火种最终熄灭的话，率先复课的同学应该对我们的失败负责。”这

期间，他们还讨论了行动的策略，提出“表面上准备对话，实际上准备游行，以迷惑当局。”有人叫嚷走“以城市包围中南海”的道路，搞什么“星火计划”，发动学生到全国各地开办“民主”讲习班，煽动动乱，有人提出“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一个民主广场，变成中国的海德公园。”甚至有人公然提出“成立反对派政治组织”，声言要“破除对共产党的迷信”。王丹也竭尽其煽动之能事，说什么“现在进行的确实是一场非常庄重、非常有深远意义的事业。这个时候坚持一分钟，就是对整个民主化进程作出一份贡献。”

为了刺激学生情绪，度过所谓“学运低潮”，“北大筹委会”除制造舆论外，还不断玩弄花招，不时制造一些行动。

5月5日，连续组织两次在校园和教师住宅区的游行，呼吁学生继续罢课，呼吁教师支持学生罢课。

5月6日搞了所谓关于复课的“民意调查”，看似民主，实际是欺骗群众的一个把戏。调查以宿舍为单位每个房间委派1人投票。一个宿舍住4至6名学生，哪怕有1人赞成继续罢课，就有可能投赞成票。而不少赞成复课的同学在宿舍里遭到围攻。何况全校有2700多间学生宿舍，参加投票的只有1300人。即使这仅占学生宿舍半数的1300多人中，仍有1/3投入反对继续罢课和弃权票。但王丹等人仍宣布投票表决结果，继续罢课。有的同学了解到事情真相后忿然说：“这伙人口口声声高喊民主，都是假的。”联系后来8位教授呼吁学生复课的意见发表后遭受到人身攻击、漫骂，甚至恫吓的事实，更能看出王丹之流的真实嘴脸。

此后几天，他们又两次组织自行车队游行，搞了邀请戈尔巴乔夫到北大讲演的征集签名活动，派人到其他院校串联，

并且倒打一耙，诬蔑“政府一拖再拖、无对话诚意”，激化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那些极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也纷纷到北大发表演讲，肉麻地吹捧“4·27”游行，给王丹之流打了一点点“强心剂”。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动乱失去热情，动乱处于进退维谷的地步。于是，王丹之流终于铤而走险，推出一个更大的阴谋。

(四)

5月12日，形势急转直下。中午，王丹、王有才（被通缉的“高自联”骨干）等3人贴出绝食倡议，熊焱等带头签名，当天签名的仅有60人左右。是日晚，王丹、封从德、柴玲、丁小平等人在“筹委会广播台”轮番演讲，动员更多的人参加绝食。王丹说：“绝食是最后一招，破釜沉舟。为什么这么早把这一招打出来？就是对政府重新施加压力。”封从德扬言要把绝食的消息“通知每个绝食者的家长，并向全国各省市、向香港台湾人民通报，向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通报。”还有人说：“绝食首先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斗争。绝食一旦进行，就能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声势。政府最怕我们联合工农大众一起同他们战斗。打蛇应该打七寸，敌人怕那，我们就打那。”他们演讲时，一些骨干分子在人群中拼命鼓掌、狂叫，煽动群众情绪。大约10时多，一个青年教师发表演说：“为有这样的弟子感到自豪”，宣布第二天上午10时半用“青年教工”捐的钱为绝食勇士壮行。至此，三角地情绪达到高潮，报名参加绝食的人数迅速增加。

5月13日上午10时半，绝食团全体成员头戴白色布条进行绝食宣誓，随后到北大燕春园饭馆吃壮行饭，喝壮行酒。

有人逐桌用收录机播放“壮行诗”和“送别”歌曲，还有人写了“壮士已去，盼归来”的横幅，立在饭馆大厅，一批批绝食者在横幅前照像。十几名学生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贴在南校门两侧，派专人守护。组织者故意把气氛渲染得很悲壮，目的是取得同情。

中午12时20分，绝食队伍400余人出发，其中绝食者160多人。许多人前去送行。不少干部教师前去阻拦，有的女教师甚至一边哭一边抱住绝食的学生不放，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均无济于事。见此情景，许多干部教师非常气愤，他们说，绝食的组织者和鼓动、支持学生绝食的人，把青年学生往绝境上推，干的是伤天害理的事。

绝食这招棋是早就定下的，只不过何时打出而已。

4月下旬，有人对王丹说：“以后需要的话可以用绝食这一招。这个招最绝。学生一个个倒下去，救护车哇哇乱叫，市民都拥到街上，任何政府都不会置之不理。”王丹对其女友也说过：“方（励之）先生说了，绝食只要坚持两天，政府就会投降。”4月20日，“北大筹委会”发出的《告北京高校书》中也提出绝食。5月4日，王丹不同意复课时，也曾说要通过绝食掀起高潮。5月5日，“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会”的人在北大钟亭开会也提出，方案之一是绝食。5月11日，部分研究生贴出一份《紧急建议》，共两项内容，一是要集体绝食，二是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游行进驻天安门。“高自联”关于5月13日绝食的决定也是在5月11日作出的。至于为什么选择5月13日开始绝食，王丹说：“正好利用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

前后3000人参加的长达七天的绝食，再一次使动乱升级。

绝食期间，北大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教师忧心如焚。他们一次次到现场说服学生停止绝食，并从爱护学生健康出发，努力做好物资供应和救护工作。然而也有些人唯恐天下乱得不够。有那么几个青年教工表现得异常活跃。5月16日，他们非法发起并组织召开了所谓全校职工大会，成立了所谓“北大教工后援团”。5月18日，几个青年党员教师背着校党委发起召开了所谓全校共产党员大会，起草并散发了《致全国中共基层支部的公开信》，号召开展一场“救党护党运动”。“北大教工后援团”成立后，与学生的“筹委会”串通一气，紧密联系。“后援团”组织了教工绝食、游行，煽动教师到工厂、农村演讲宣传等一系列活动。

(五)

形势发展得非常严峻，斗争十分尖锐。前景只有两个，要么政府作出退让，使极少数人的阴谋得逞，伟大祖国重陷黑暗；要么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后者。

5月20日，李鹏总理下达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敲响了极少数组织、策划动乱的人的丧钟。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他们决不甘心失败，仍在施展阴谋，负隅顽抗。

宣布戒严的当天，王丹就放出谣言，说什么“按国际惯例，戒严令如24小时未发生效力，政府就会倒台。”“筹委会”广播台反复播放这个谣言，煽动学生四处拦堵军车，争取“反戒严的胜利”。

此后几天，“筹委会”大打宣传战、心理战，不断在校

园里制造紧张空气。一会说：“军队要开进北大，实行军管”，一会宣布“全校处于紧急状态”，一会又让学生“紧急待命，保卫校园”，妄图造成人们的恐慌感，与政府、军队对立。

“筹委会”还不惜捡起戈培尔的破烂，把开展谣言攻势当成一根救命稻草，一时间，校园里谣言蜂起，什么“老师反对戒严”，什么“李鹏已经下台，由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等等，真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此时，攻击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调子急剧升级，诬蔑人民政府是“伪政府”，声言要戳穿“反革命政变阴谋”，至于“打倒”的叫喊更是不绝于耳。

有人还煽动对政府采取“不承认、不理睬、不合作”的“三不方针”，重点开展“不合作”运动，具体形式是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教师罢教，拒绝认购国库券，提取银行存款。

王丹、封从德等人也不断发表演说，以稳住军心。封从德色厉内荏地说：“必须坚持住，广场大旗不能倒。”王丹也宣布，要在广场成立什么“民主大学”，并说：“现在进行的确实是一场应该感到非常庄重、非常有深远意义的事业。”

校内外敌对势力也加紧勾结，一个个小道消息传进校园。5月19日上午，就传出当晚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5月25日，一个自称是国家机关干部的人跑到“筹委会”广播台广播说：“赵紫阳已被免除党内外一切职务。”6月3日傍晚，连续广播所谓有关领导机关人士透露的消息，鼓动学生上街堵砸军车。

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这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孤注一掷，扬言要进行暴力斗争。有人狂叫：“在非常时期，兵变是最有效的合法斗争。”“筹委会”广播台于6月3日反复广播：“我们对解放军的政策，应改安抚政策为胡萝卜加大棒，以大棒为主的政策”，“要以革命的暴力对待反革命的暴力”。有人建议，“筹委会”的建制要军事化。5月26日，广播宣布，“筹委会”要改组，按各大行政区成立若干个组，以便撤离回老家时，采取军事化行动，有消息说，“筹委会”所在地28楼、29楼已编制为“28军”、“29军”。他们还派人购买石灰，给骨干分子发了匕首，还曾到化学系药品库索要防催泪弹用的化学药品，遭到拒绝。他们还成立了“敢死队”，招募了“义勇军”。最终使动乱发展到一场反革命暴乱，把青年学生推向祭坛。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加紧策划，布置退却，以便东山再起。6月2日，封从德说：“这次学运失败以后，我们完全可以成立一个合法的研究学运的社团，为下一次学运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王丹也在5月30日广播说：“今后要把斗争的注意力放在校园的民主建设上，要使学生自治组织合法化，继续办好民主沙龙，还要成立新的社团。学生要到社会上去宣传，发动各界都成立自己的组织，要成立知识分子同盟，独立工会、农会，”要寻找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丁小平则说：“要进行长期斗争。我们都隐藏起来，秘密工作，继续民主运动。”但是，社会主义大业的车轮，不是几只蟑螂就能阻挡得住的。不管王丹之流玩弄什么伎俩，终究没能逃脱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9月16日）

南京动乱中的一场闹剧

——江苏“高自联”导演的 “北上民主长征”真相

鸣 泉

在北京发生政治动乱期间，南京相继出现了游行、罢课、静坐、绝食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南京“高自联”策划和组织的16所在宁高校800余名学生参加的所谓“北上民主长征”。“长征队”自6月1日上午9时从南京市鼓楼广场出发，历时4天，共行进70多公里，最后经劝阻全部返回。其间，苏皖两省的教育、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及学校的领导、干部、教师出动近1200人次，随队做了大量的劝阻工作，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沿途工厂、市镇、学校的正常工作、学习和交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一)

5月下旬，正当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静坐示威难以为继之时，北京“高自联”派遣所谓“精英”南下，以推动南方的“运动”，企图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向政府施加压力。“精英”们来宁后，到处煽风点火，并和南京“高自联”头头们精心策划了“北上民主长征”的计划，成立“北上指挥部”，物色了指挥部一、二把手。

5月31日，在宁高校分别接到通知，要求各校“高自联”

迅速组织报名，确定人选，并尽快做好长征的一切准备。

当日晚，在一所大学的运动场上，一位“高自联”的头头向大家进行动员：我们这次徒步赴京请愿，是响应“北高联”的号召、“空校运动”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为了沿途唤起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的觉醒，发动他们起来和现政府作斗争……

与此同时，一所大学的运动场上正在举行送行仪式，“长征队员”一一上台戴大红花，接着在一片掌声和鞭炮声中集体宣誓。就这样，几百名学生被推上去了。

6月1日上午8时以后，各校参加“民主长征”的学生陆续来到鼓楼广场，等待编队出发。广场上交通中断，人车混杂，聚集了数万人。“高自联”架设的高音喇叭里不时传来谣言公司“美国之音”、“BBC”的“最新消息”和“高自联”头头们声嘶力竭的演讲声。9时许，队伍沿中山北路向大桥方向行进。

此时，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一面向有关部门和高校部署劝阻工作；一面与安徽省委、省政府联系，如果队伍进入安徽境内，请协助做好工作。

(二)

“长征队”过了大桥，在泰山新村的航空专科学校停下了。摆在队伍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向北的宁六公路，一是向西的苏皖公路。“指挥部”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队伍沿西线前行时，“指挥部”的头头却乘出租轿车返校了，第二天上午竟坐在考场上参加毕业考试。

头头甩了队伍去考试，而队伍中的800名学生于当晚11时

左右到了浦镇郊外的珍珠泉，算算路程，总共才走了20多华里，一个个就累得七歪八倒，不少人就在湿漉漉的地上躺下了。这时，各校做劝阻工作的干部、教师和一些学生家长陆续赶来了，他们抓紧时机，耐心劝说。不多久，一部分学生因对“指挥部”愚弄同学表示愤慨，毅然决定离队返校。

“长征队”头头怕其队伍被分化瓦解，决定在凌晨1时集中队伍继续向前。在黑暗中，他们强行拦乘西行的汽车，半数人在天亮之前就“走”完了30多里，在安徽乌衣镇住下了；而步行的，直到上午10时左右才抵达乌衣。小小的乌衣镇一时人满为患，到处可见疲惫不堪的学生。

省委、省政府再次要求各校抓住时机做工作，迅速增派人员、车辆做好劝说工作，接运学生返校。从中午一直劝到下午5时，终于有90人被说服返校了，其中有两所学校的学生全部返回。此时，“长征队”军心动摇，头头们大伤脑筋，无奈之下，只得强行催促队伍快速向滁州城区行进。

(三)

队伍于傍晚7时左右到达了滁州城区，在数千名滁州师专学生的欢迎之下，600多人的队伍开进了滁州师专，刚刚复课三天的校园顿时一片混乱。该校部分学生不顾校方一再劝阻，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引进了自己的宿舍，并安排食宿。这样，就为“长征队”加了油，鼓了劲，头头们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当晚，“长征指挥部”便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并重新编队。在会上，头头们得意地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冲出了江苏，我们不但得到了安徽、上海高校的支持，

而且香港有四万美金在支持我们。”

与此同时，在南京一所大学校园里又闹开了。南京“高自联后勤部”几个头头正通过广播，造谣惑众，说什么“由于政府方面的刁难和破坏，北上队伍正面临着缺水、缺粮的困难，不少同学生病，处境危险”，并组织了数百名不明真相的学生冲击校长办公室，围攻校长，要求校长从人道主义出发，提供食品、药物，派医生和车辆前往护送，并给予经费支持。从晚上11点多一直闹到凌晨1点半才散去。

6月3日清晨，“长征队”部分学生打着旗子，上街进行演讲和募捐，引起群众围观，使滁州市区交通秩序再一次受到干扰。滁州师专校园内外人来人往，到处停放着牌号为“江苏01——”的各种车辆，宿舍楼的阳台上挂了许多“长征队”的旗子。在房前屋后、宿舍内外、走廊上、树荫下，到处可以见到干部、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劝说的情景，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尽快劝学生回去，一个也不留下！

“长征指挥部”又一次开会，两个纠察把门，谁也不让进去。经过一天休整，“长征队”傍晚又扯旗上路了。

(四)

“长征队”刚离开滁州，天就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气温亦由32℃陡降到18℃。由于雨具、衣服准备不足，不少学生身上都湿透了，有的只穿着短裤，冻得全身直打哆嗦。才走几公里，队伍就被迫在沙河集停下了，并分宿各处。

全体劝说人员不顾疲劳，在大雨滂沱中赶到了沙河集。4日早上，当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消息传来后，全体劝说人员为之振奋，立即冒雨分头到各住宿点，向学生进行宣传，

并要求学生无条件地返校。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长征”的学生们感到震惊，有的站着发愣，不知如何是好。而这时“长征队”的头头和少数骨干分子情绪更加激动，说：“死活只有一条路，坚决干到底。”天亮以后，有一批学生准备返校。“长征队”头头不甘就此罢休，他们威胁说：“谁走了就是叛徒，北京学生在流血，我们不能回。”某校校长对该校几十名学生集中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劝说，学生都答应跟校长回校，可是在头头们的胁迫下，就是无人敢离队上车。老师们气愤地说：“究竟是学校对你们负责，还是‘高自联’对你们负责。”一些原来上了车的同学，有的又要下车，只见一位上了年纪的院长，一会儿用自己的身体堵住车门，一会儿用双手和肩膀顶住从车窗向外爬的学生的脚。当时，个别学生竟无礼地要院长少管，这位院长大声说道：“我是你们的院长，你们是我的学生，我要对你们负责，我有权利管你们。”许多围观的群众对此情此景实在看不下去了，有的说：“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好的老师，如此相劝，你们都不听，太过分了。”有的青年人说：“我们想读书，可上不了大学，你们上了大学可又不想读书，你们这样，哪里还像学生啊。”有的群众看到几个学生东躲西藏，便主动帮助查找和劝说。

最“精彩”的一幕是，上午7时左右，参加考试后返队的“长征队”头头正在仓库里召开指挥部会议。校领导把他叫了出来，大门口站着的有他的父母和一些要好朋友，校领导当即严厉地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你们再‘北上’性质就变了！再往前走一步，你的错误就越严重！立即跟我们回南京去！”这时，他的父母和其他同志一拥而上，将其连推带拉上了面包车。在场的学生连忙大叫“绑架！绑架！”

有的拉车门，有的爬上车，有的用自行车挡道，最后在在场群众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汽车关上门呼啸而去。从车上传出阵阵的大声嚎叫：“我对不起同学，我临阵脱逃！……”

(五)

“不能让学生再走了，必须坚决堵住”，这是全体劝说人员的愿望。所以，当“长征队”300名学生上午11时冲出沙河集以后，大家便紧随其后，不少同志还下车跟学生一道步行，边走边劝，劝通了就送上车。

在一块不大的广场空地上，一边是“长征队”头头用喇叭喊叫，催促学生归队集中；一边是干部、教师在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有的学生被几个教师簇拥着上车；有的学生在教师的劝说下面壁而泣，也有个别学生却说：“再拉我就要动武了。”

“长征队”头头看到队伍难以控制，怕再拖下去会导致全军覆没，便改变策略，命令队伍立即出发，想以“人流”来裹挟零星散失者。但是，最后上路的只有60来个坚定分子。这时，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全体劝说人员又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艰苦劝说，连推带拉把最后60来个人都送上了车。

汽车在夜色中向南京急驶，车上的同学，有的默默无语，陷入沉思；有的和老师一一握手，连声说“感谢！感谢”；有的拿出笔记本要老师、领导签名。一位经过痛苦思考、深感内疚的学生说：“这哪里是什么‘民主长征’，分明是拿我们身体开玩笑！在沙河的那天凌晨本来决定集体扒火车的，不少同学都不敢睡觉，怕丢下。后来你们来了，我们才……”另一位学生说：“我们被利用了，痛定思痛，我们应该认识

自己走过的错误之路，认真解剖自我，从错误中走出来。”

“北上民主长征”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这场闹剧虽已过去，但给人留下了一连串值得思考的问题。除了少数别有用心者之外，上当受骗的广大学生难道不应该好好想一想吗？从中究竟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9月21日）

毒化校园的舆论 煽动动乱的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大字报见闻录

关 清

《中国教育报》编者按 在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学潮、动乱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卷入其中，这是许多同学在学习和反思中都在思考的问题。今天发表的这篇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大字报见闻录，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篇很好的材料。

为什么一些人明目张胆地鼓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大学生毫不觉察，或者有所觉察而没有警觉？要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毒害了不少青年学生。如果通过学习和反思，广大青年学生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起而控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毒害，那就说明我们的学习真正有了收获，思想觉悟也就提高了。

在春夏之交发生的这场风波中，那些动乱的策划者和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充分利用不受宪法保护的大、小字报，混淆黑白，挑拨是非，造谣惑众，毒化舆论，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颠覆政权。许多不明真相的大学生因之被蒙蔽，被欺骗，以至逐渐卷入漩涡之中。现在该是对这些大、小字报有一个清醒正确认识的时候了。为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大小字报在这场动乱中所起的恶劣作用。

一、悼念是名，鼓动动乱是实

4月15日下午2时，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贴出第一张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条幅。人们都知道，这个时间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公布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要早四个小时左右。这种灵通的消息和迅速的反映，本身就是一种异常现象。当天下午人大校园内的条幅、大小字报迅速增多，诸如“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已去”，“中华希望毁于一旦”等含沙射影的条幅、挽联开始出现。第二天，校园内借悼念表达对现实不满、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大小字报处处可见。在学八楼对面墙上几十种舞文弄墨的对联、条幅放肆地渲染这种不满情绪。当时一幅署名“麻派子弟哀挽”的对联用“开西风杠”、“停红中碰”、“杠出白板”、“碰了四条”等麻将用语，影射攻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幅对联居然被一些学生誉为“京城第一联”，在高校广为流传。随后，以桥牌、扑克、围棋等用语编写的此种内容的条幅、对联四处皆是。当时，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看出，这些诗词、挽联所表达已不是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而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上，煽动人们反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一幅“提千条道万条不如碰了四条，悼胡公论赵公哪及倒了李公”的对联，彻底暴露了阴谋制造动乱者的政治野心。自4月20日

起，校园内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矛头集中指向李鹏同志，从人身攻击到对治理整顿方针攻击谩骂无所不有。与此同时，以“民主”、“自由”、“廉政”为幌子的，有组织政治斗争的大小字报开始出现。有一张以北大、清华、人大部分师生名义落款的大字报，借建议之名，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的功过，要求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的秩序；要求当局对改革十年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作出检讨，主要责任者应引咎辞职或罢黜……。在这份大字报上竟有人用小字写了如下“建议”：“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上述的演变过程在人大校园内仅仅三天时间。遍及校园的诗词、条幅、对联、大小字报几乎都突出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从校园里第一张所谓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大字报开始，就深深地埋下了政治动乱的种子。

二、反革命舆论的强化宣传

在人大校园内观看过大字报的人也许能回想起，从4月18日起的一周内，集中出现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小字报。这些大小字报从标题到内容，都与悼念胡耀邦同志毫不沾边。其反革命言论之公开露骨，彻底暴露了阴谋制造动乱者的罪恶目的。发人深思的是，对这种肆无忌惮的反革命宣传，不少人却丧失了识别和抵制的能力，麻木不仁、听之任之。这使制造动乱者感到，明火执仗地跳出来宣扬他们策划已久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时候到了。

《共产党素描》和《对中共历史的反思》的大字报宣称

“中共之历史肯定地告诉我们，它不愧是一代奸党”，咬牙切齿地咒骂党的领袖、党的干部，攻击党性是“被阉割的，丧失独立思考性的奴役和愚忠”，党籍“摧残了国民的人格”，中国共产党“除了耽误了中国四十年青春外，并未给中国带来什么。”并预言“国之大乱立至”，要大家“拭目以待之”。校园内还贴出一份以共产党员、人大部分教师名义落款的大字报，公然提出“退出共产党，筹建‘中国民主运动促进会’的倡议”，煽动中国知识分子“分期分批”集体退党，叫嚣“当务之急，是筹组一个与中共分庭抗礼的党派组织。”

与此同时，《中国的前途—私有制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政治制度—传统与现实》、《亡了罢，中国》等一批大字报中，公然声称“共产制度（现行的所谓公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公有制“只能带来专制、独裁”，污蔑“共产制度带来民不聊生，一穷二白”；咒骂四项基本原则，叫嚣要“修改宪法，根本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幕后策划者在这些反动的大小字报中，用心险恶地点拨“民主青年”说“既然要求恢复私有制，就不要嫉妒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既然民主、自由是以私有制经济为社会基础的，就应当保护这一新兴阶层，否则又会转到专政计划的原地”：“不要反对官员亲属从商”，“没有他们带头经商，中国商品经济就不可能搞下去”。再三提醒制造和参与动乱的人们，为了保证私有制社会的真正实现，现在提出的民主思想，“要结合工农兵商关心的法制、物价问题”“广泛宣传”，“当前走上街头要以悼念耀邦为主，否则让人抓住小辫子，得不偿失”。

但是，我们一些天真的同学，缺乏基本的阶级分析头脑，对这场充满火药味的阶级斗争不仅毫无所察，反而跃跃欲试，

以在动乱中出风头为荣。不少学生对4月22日天安门广场静坐的人大学生数量少，影响小感到脸上无光，而对4月27日大游行人大学生带头在前，津津乐道，称“4·27是人大再生之日”。这种缺乏政治头脑、政治是非不分，幼稚的自我表现欲，为那些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造谣惑众、制造混乱的人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处心积虑，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阴谋家，想尽一切办法，把挑动起来的不满情绪加以强化，煞费苦心地将青年学生的过激言行纳入他们实现反动政治目的的行动轨道。用一些幕后策划者的话说，就是让人大这所“党校”“从旧营垒爆发出有力之一击”。

三、动乱升级的策略指导

人们注意到，动乱掀起后，在人大校园就出现了很多使动乱升级的各种策略指导性的“大小字报”。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阴谋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法诱骗青年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个人善良愿望的反面。利用谣言进行蛊惑煽动，是动乱策划者使动乱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策略。人大学生第一次大的行动是在4月18日晚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冲击中南海。此前三天，人大校园内充耳皆是胡耀邦同志“是被气死的”谣言。所谓揭发死因的“内幕”、“真相”的“大小字报”吸引了众多学生。4月17日一张《悼念活动建议》的大字报，用煽动性语言胡说耀邦同志“死得如此凄惨，竟没人送终”，并建议“人大学生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于4月18日开追悼大会”，要求中央“给予各院校学生代表参加追悼会的权利，以及22日学生自发在长安街为耀邦灵柩送行的权利。”随即，校园内贴出学生准备18日19时在本校举行隆重悼念活动的通

知。然而，第二天在学校有关方面已经为学生们的各种悼念活动提供了方便的情况下，下午在校园的十几处忽然同时贴出相同内容的《特告》，造谣说“本日举行的耀邦悼念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因而改为“前往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以喻我愿”。结果一下子煽动起一两千学生。他们在一片对校方的指责叫骂声中，汇集起来，奔向天安门广场。然而到了天安门广场后，许多学生又被队伍莫名其妙地带到了新华门前，稀里糊涂地参与了冲击新华门事件。事后不少学生感到不大对劲，一些学生私下议论：“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怎么上了新华门？做得未免有些出格。”但是还容不得学生多思考几个为什么，校园内各种所谓“惨案真相”、“血案”、“讨还血债”等造谣的大小字报，就将一些学生刚刚产生的几点疑问和不安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与对立。

从4月21日早晨开始，人大校园四处可见所谓“四·二〇”血案“真相”的大字报。造谣说4月20日晚警察与学生发生冲突，有学生被警察打伤，并拘捕二百余名学生。还造谣说，北师大一女生在冲突中被警车撞死。这几份大字报很快把学生的不满情绪搅动起来。许多课堂无法正常上课，要求罢课罢教的大字报开始出现。到下午3点10分，学生食堂前贴出“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大字报提出，“为悼念耀邦，推进民主进程，抗议4月20日惨案的法西斯暴行，决定当晚10时在北师大召开全市高校誓师大会。”不少同学立即响应。事实上，当晚北京市高校学生的这次行动是前往天安门广场。动乱的策划者用欺骗的手法组织了这次学生游行，并公然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强占了天安门广场。

4月22日极少数人又策划了一场3个学生在大会堂东门

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的闹剧。于是23日人大校园内到处贴满“跪地请愿，政府不理”的大小字报。同时另一些大字报则别有用心地恶毒咒骂说“自从党棍站起之日，就是知识分子下跪之始，我们已经跪了四十年，我们不能再跪了”。他们煽动学生说“我们不能再幻想，政府已使我们彻底绝望，民主不能乞求，必须用斗争来争取。团结起来，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把学生中的不满、激愤之情引向反对共产党、反对现政府的行动。果然人民大学当天就成立了非法组织“学生临时自治会”，第二天全校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罢课。

人们不会忘记，几乎每次大的行动之前，这种策略指导性的大字报总是以不同形式出现在校园内。胡耀邦同志逝世第四天，4月19日人大学生食堂门前，一张大字报就告诫学生“当务之急是扩大宣传效果，不再是悼文”，要“集中在民主上大造舆论”，认为这样做才可以“加快统一各方认识”为五·四“酿成新的大游行做准备”。4月21日，在校内气氛已十分紧张的形势下，下午5时，所谓知识界“精英”包遵信、吴祖湘、严家其等43人《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公开信》的大字报，就在人大亮相。《公开信》将学生们的行动肯定为“推进民主进程”的“积极的、建设性的”运动。它绝口不提18日、19日两天，部分学生冲击中南海的严重违法行径，却要求党和政府“直接与学生平等对话”，并用“置之不理容易引起学生们的过激反映”的所谓忠告向政府施加压力。既把学生“过激行为”的责任推到政府身上，同时又暗示学生继续用这种“过激行为”与政府作斗争。这张大字报对调动人大学生参加21日晚的游行、静坐，使更多

的学生卷入动乱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4月23日人大非法的“学生临时自治会”成立后，人大《博士生宣言》就以大字报形式贴在学生食堂旁。以后，在一周内连续发表了三个《博士生宣言》。这些《宣言》紧步知识界“精英”的后尘，将制造动乱者的反动政治纲领再一次做了强化宣传，并对非法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具体策略指导。在这些具体详尽的策略指导下，动乱的水平越来越“高”。4月27日人大学生在“人大研究生”的大旗带领下走出校门上街游行。在全市高校学生游行队伍中人大队伍打头，出尽风头。在“高自联”筹组“北京高校对话团”时，一个20余人的名单中，人大学生就有9名。

不失时机地利用大字报挑动学生与政府的对立也是各种幕后人物的策略方法之一。如假借“小平手谕”的大字报造谣说政府“镇压的时候，先打人民大学的学生”，以挑拨政夺与人大学生之间的对立。“4·26”社论发表后，动乱策划者不遗余力用各种挑动性语言，极力煽动“政府反对动乱的矛头是对准学生的”，以图进一步激化学生与政府的矛盾。在“4·29”政府与学生对话后，各种幕后人物纷纷出场，指点学生拉开政治谈判的架势，教唆他们只有政府答应他们提出的苛刻条件，才与政府对话。一份名为《教授宣言》的大字报公然叫嚣：“我们长胡子的人不再怕垂死之人的胡诌”，“我们支持学生自己推选的自治会”，诬蔑政府的对话“是对一群精心挑选的孩子的训话。”使很多原来并没有多少不满的学生也被煽动起来，与政府对立。

5月13日在动乱制造者的策划下，一部分学生去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为适应新的动乱形势，校园内的大小字报逐

渐由“学生自治会”的“北京之音”造谣广播所代替。

四、应当反思什么？

50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许多同学在反思。对学潮初起人大校园内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也进行了回顾与反思。

从反思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同学对当时校园内隐含在悼念大字报背后的不正常现象并没有察觉，或者有所察觉而没有警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的同学说：“我们给自己戴上了为民请命的高帽子，躁动不安的情绪弥漫着校园，难以让人进行冷静的思考。”也有的同学说：“现在看来，以往我们接受了许多西方思想，自由化的论调在社会各个角落响起，共产主义信念被人嗤之以鼻，学生中以谈论自由，谈论西方为时髦，从言论到思想上都以西方世界为标准，却忘记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

这些同学说的是有道理的。今年3月，人民大学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当时有相当多数的本科生、研究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去是指导理论，现已过时”、“根本不是科学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不存在，仅是人们给贴的一种标签”；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其性质等同于宗教信仰”；认为“国家改革前途未卜”，甚至“对国家前途失望”，主张中国理想的政治格局是“多党多派”。对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持肯定态度的学生仅占少数。没有一名被调查的学生认为学潮会阻碍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只有少数人认为学潮“虽有积极因素但以消极为主”。这说明，50天政治风波中，在人大校园内，各种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的大小字报，之所以能够有那么多同学发生思想共鸣，甚至由此被导向动乱的深渊，绝不是偶然的，是有思想基础的。由于长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潜移默化的影响，许多同学不懂得或根本排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自觉或不自觉的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毒害。其结果，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同学们的善良愿望被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阴谋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策划者所利用。现在该是同学们认真反思、控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毒害的时候了。

（原载《中国教育报》1989年9月21日）

一幕“追悼”闹剧

第一 场

时间：1989年6月5日下午5时许

地点：武汉某高校

非法组织的“自由之声”广播台，高音喇叭的音量开到了最大限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呼喊：同学们，据刚从北京返校的××系的一名同学说，“反动政府”血洗天安门广场，“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我校有部分同学在天安门广场遇难……下面播送哀乐。

瞬间，非理性的冲动再次在一些大学生的周身激起。成群的学生冲出宿舍，围聚在一个个喇叭下。此起彼伏地呼喊： “讨还血债。”

策划者通过“自由之声”播出紧急通知：今晚9点，全校师生在校电影场举行追悼暨誓师大会。

第二 场

时间：当晚9时许

地点：校电影场内

椭圆形的露天电影院内聚集着数千人，四周漆黑，没有照明，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攒动。高音喇叭里重复播着一个临时性通知：管电影场的工人师傅，恳请你马上来一下推上电

闹。一分钟，两分钟，一刻钟过去了，管照明电源的工人仍未来，大会只好推迟进行。

黑幕中，大会组织者决定用无线电话筒通过“自由之声”广播台向全校作实况转播。一个个出格的发言通过电波传向夜空，自称“从子弹缝里逃出来”的一个学生的发言，竟然声泪俱下——血洗天安门广场我在现场，——我们一起去北京的同学，也有好多人遇难。同学们，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死难的校友报仇！”大会组织者在发疯似的吼叫，乱哄哄的会场顿时传出一片恶毒的咒骂声。

第三场

时间：当晚10点多

地点：校图书馆门前

“追悼暨誓师大会”刚结束，广播里突然又传出喊声：下面播送重要新闻。据“可靠”消息，在血洗天安门广场中，华中师大有16人遇难，武汉大学有14人遇难……

刚刚散场的学生再次被这些谎言所激怒。数千人聚集在校图书馆门前，振臂狂喊。数千不明真相的学生，在校内奔走呼号，直到深夜。

第四场

时间：第二天

地点：校园内

受校领导委托，专程到北京劝导学生回汉的两名老师，带着一批学生从京返校。这些四肢灵活，身体健壮的学生中，

不少人都是昨晚被迫悼的“遇难者”。

追悼者在校园内遇到被迫悼者，几乎疑为鬼魂再现。稍一细叙，双方尴尬万分！一位从北京回来的年轻教师说：“我们就住在前门附近，亲眼看见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的撤退情况，部队根本没开枪，更没有用坦克车轧死学生。我们学校的学生我基本上都见到了，并未发现有人死亡。”

对于这个真正重要的新闻。“自由之声”广播台却不予播音的自由，校领导为了澄清事实，稳定秩序，在全校干部会上郑重宣布：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确凿的消息证明我校有学生在北京死亡。

第五场

时间：第三天

地点：校园内

鱼肚白刚刚泛出天际，被所谓“血洗天安门广场”谣言搞得通宵未眠，已经头昏目眩的大学生，一夜之间仿佛明白了许多，自感被愚弄的学生们悄悄离校了。

一位参加过“追悼会”的理科学生气愤地说，“自由之声”整天播美国之音和谣言，害得我们为大活人开“追悼会”，我们被愚弄了，真想找这帮自治会的头头算帐！

幕外音：据有关主管部门透露，截至目前止，武汉地区的几十所高校尚未发现有大学生在北京死亡。

（原载《武汉晚报》1989年6月19日）

为活人佩黑纱

首都发生反革命暴乱期间，传到杭州的谣言特别多，其中所谓“浙大三学生殉难”，还曾一度引起许多学生的感情冲动。不少学生佩着黑纱，抬着花圈上街。有的学生甚至嚎啕大哭。

然而谣言毕竟是谣言，这三名进京学生都安然无恙。在事实面前，原先为之激动的许多同学感到受了谣言的骗，上了当。浙江农业大学的杨荪写信给浙江日报说，小道消息的虚假性暴露了某些人想以此来蛊惑单纯的青年学生，进而利用学生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我们过去受了骗，今天清醒了。

（原载《北京晚报》1989年7月18日）

在美、台、港反动势力庇护 支持下叛逃分子猖狂进 行颠覆我国政府活动

据“美国之音”和西方通讯社报道，叛逃在外的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近日由巴黎到达美国后，在美、台、港反动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下，继续猖狂进行颠覆我国政府的活动。他们在美国芝加哥参加上演了一个所谓“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的闹剧。

“美国之音”为这个为时三天已于7月30日收场的“会议”大肆宣传捧场。它在7月31日以每次近半小时的时间反复播出这个会议的情况。据称，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名叫“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的组织，并通过了一个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宣言”。“会议”还“呼吁对中国进行选择性的经济制裁”。据报道，不久前在巴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推翻北京政府”的严家其，在会上讲话时再次咒骂“现政权必然要垮台”。吾尔开希讲话时则叫喊“有朝一日将把民主女神竖立在天安门广场”。据报道，万润南和通缉犯、“高自联”头头李录也参加了这个会。

台湾《联合报》特派记者在7月28日自芝加哥发出的报道中说，这次“会议”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是由亲台湾的“侨

领”资助的。这家报纸说，“现在大陆在海外的反对势力都明白，做事要钱，而台湾是长期可靠的经费来源之一”，“大陆民运人士没有理由不接受亲台湾华侨的捐款，可是他们当然了解接受这种捐款的政治影响”。

台湾《联合报》7月28日还报道，“吾尔开希25日自巴黎飞抵芝加哥后，和中国国民党海工会（按：即‘海外工作会’）主任郑心雄见了面，并一起照了相。这事在大陆留学生群中引起广泛议论”。该报说，“据悉，安排这次见面的，是芝加哥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吴英毅。……吴英毅对这次大陆学生召开的大会（首届全美中国学生学者代表大会）捐献不少经费，因此获得大会负责同学信任”。

另据报道，早些时候，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刘宾雁等人于7月20日在巴黎发表了一项成立所谓“民主中国阵线”的倡议书，鼓吹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民主中国阵线”“对于如何与台湾政治势力接触，有过深入讨论，打算以谨慎而渐进的步骤进行，基本上是承认只要是支助中国民主运动，都是共同伙伴，因此，亲台湾侨领的钱可以接受。”所谓“民主中国阵线”的秘书长万润南还对台湾《联合报》记者说，他不排除近期访台的可能性。

香港《东方日报》7月30日报道，香港一个名叫“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机构已给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拨了120万港元，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

在公开支持叛逃分子推翻中国政府的活动中最卖力的是“美国之音”。这一个时期，严家其、吾尔开希等的反政府言论和活动，成了“美国之音”华语节目的主要内容。最近，“美

国之音”就先后两次播送了吾尔开希的长篇采访录音，继续宣传“血洗天安门”的谎言。它借吾尔开希之口又说什么天安门广场死了三千人，整个北京市死了几万人，还说什么“天安门广场上‘工自联’的纠察队员几乎全部被打死了，好几十人”。但是这个信誓旦旦地说什么他以“人格担保”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死了人的吾尔开希，却不得不附加说明，“当然不是我亲眼看到的。”

此间人士指出，严家其、吾尔开希等叛逃分子，在美、台、港等反对新中国的势力的支持下不论如何猖狂蹦跳，不论成立什么闹剧班子，只不过是多几个“中国民联”和多几个胡平、王炳章之流的跳梁小丑而已。他们的阴谋已经在国内以惨败告终，现在靠美、台、港反动势力，企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是不能得逞的。至于作为美国官方宣传机关的“美国之音”，竟然利用这些叛逃者肆无忌惮地鼓吹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严重损害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美国之音”这样做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反革命颠覆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成立

严家其、吾尔开希等将到台湾活动

新华社巴黎9月24日电在法国政府的纵容下，最近三天巴黎上演了一场成立所谓“民主中国阵线”的闹剧。

这场闹剧9月24日收场时通过的“民主中国阵线章程”，以从国外来颠覆中国政府为宗旨。这次北京反政府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严家其、吾尔开希被宣布为这个“阵线”的“主席”和“副主席”，万润南为“总书记”。

参与巴黎这场闹剧的约有150人，来自北美、西欧和港台等地区，其中除这次北京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策划者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谔、苏晓康等人外，还有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文人刘宾雁等。这伙人在这次“成立会”上一再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要推翻中国政府，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们还把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在国外进行的分裂祖国活动说成是“正义之举”，并一再要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他们公开要求台湾国民党向他们提供资助，甚至帮助和领导他们的反政府活动。台湾国民党派人参加了这次“成立会”，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李胜峰在会上的讲话中声言要和这伙人一

起“迎接光明”。

据宣布，这个反动组织的总部将设在法国首都巴黎。自从北京平息旨在推翻中国政府的反革命暴乱以来，法国政府一直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收容、包庇潜逃的中国反政府分子包括遭到中国政府通缉的刑事犯罪分子，并纵容他们在法国领土上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据台湾报纸报道，叛逃在外的严家其、吾尔开希等人将于12月中旬到台湾活动。

报道说，严家其、吾尔开希等在台湾除参加一个“‘台湾经验的黑箱子’综合研讨会”外，还将在台湾作系列巡回演讲。

据报道，严家其、吾尔开希等叛逃以后，在海外曾和台湾当局多次联系、接触。吾尔开希最近接受台湾报纸采访时还公开声称“争取民运最直接的帮助即是希望得自台湾”，台湾对大陆的所谓“民运”“责无旁贷”。

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以后，台湾“行政院”曾通过了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措施草案”，台湾“行政院长”李焕最近在“立法院”的“施政报告”中也声言要“透过各种途径，提供大陆民运人士精神与物质的援助”。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作出了资助“海外大陆民运人士”300万美元的决定；台湾“内政部”也表示要允许“大陆民运人士”来台访问、定居。

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报》是国家教委主办的全国性教育专业报纸，对开四版，周三刊（二、四、六出版）。

《中国教育报》立足教育界，面向全社会，以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教育工作者、大学生和关心教育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为服务对象。

《中国教育报》宣传国家教育方针政策，传播国内外教育信息，促进教育改革开放，倡导尊师重教风尚，颂扬人民教师功德，反映师生员工愿望。

《中国教育报》在全国20余个省、市设有记者站，除在北京印刷出版外，在上海、成都、长沙设有分印点。

邮局代号：1—10 国外代号：D 739 定价每月2.30元
每份0.18元

欢迎订阅 欢迎刊登广告